

帮学堂课堂配套讲义

17 基础阶段

《中国教育史》

目录

第一篇中国古代教育.....	5
第一章 官学制度的建立和“六艺”教育的形成.....	5
第一节 教育起源与学校萌芽的传说.....	5
第二节 西周的教育制度.....	6
第三节 “六艺”教育.....	7
第二章 私人讲学的兴起和传统思想的奠基.....	7
第一节 私人讲学的兴起.....	7
第二节 诸子百家私学的发展.....	9
第三节 齐国的稷下学宫.....	10
第四节 孔子的教育思想.....	11
第五节 孟子的教育思想.....	18
第六节 荀子的教育思想.....	23
第七节 墨家的教育思想.....	26
第八节 道家的教育思想.....	28
第九节 法家的教育思想.....	30
第十节 战国后期的教育论著.....	32
第三章 儒学独尊与读书做官教育模式的形成.....	36
第二节 汉代学校.....	38
第四节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40
第五节 王充的教育思想.....	43
第四章 封建国家教育体制的完善.....	44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官学与选士制度的变革.....	44
第二节 隋唐时期教育体制的完备.....	46
第三节 科举制度建立.....	48
第四节 中外教育交流开辟.....	51
第五节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52
第六节 韩愈的教育思想.....	53
第五章 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学校的改革与发展.....	55
第一节 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学校教育的改革.....	55
第二节 宋朝书院的发展.....	59
第三节 私塾与蒙学教材.....	62
第四节 朱熹与理学教育思想.....	63
第五节 王守仁与心学教育思想.....	66
第六章 早期启蒙教育思想的产生.....	68

第一节 早期启蒙思想.....	68
第二节 颜元的教育思想.....	69
第七章 洋务教育的兴起与近代教育的起步.....	72
第一节 封建教育的衰败与改革派的教育主张.....	72
第二节 教会学校的举办.....	73
第三节 洋务学堂的兴办.....	73
第四节 留学教育的起步.....	75
第五节 “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与张之洞的《劝学篇》.....	77
第三篇中国近代教育.....	79
第八章 普及教育思想的提出与近代学制的建立.....	79
第一节 早期改良派的教育主张.....	79
第四节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81
第四节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82
第五节 严复的教育思想.....	83
第六节 清末教育新政与近代学制的初步建立.....	84
第九章 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的建立.....	87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87
第二节 蔡元培与近代资产阶级教育.....	88
第五节 新文化运动与教育变革.....	92
第四节 新文化运动时期和 20 年代的教育思潮与教育改革运动.....	93
第五节 1922 年新学制.....	96
第三篇中国现代教育.....	97
第十章 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建设.....	97
第一节 教育宗旨与教育方针的变迁.....	97
第二节 教育制度改革.....	98
第六节 学校教育发展.....	99
第四节 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加强.....	100
第十一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教育.....	101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形成.....	101
第二节 干部教育.....	102
第三节 群众教育.....	104
第四节 普通教育.....	104
第五节 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基本经验.....	105
第十二章 现在教育家的教育理论与实践.....	106
第一节 杨贤江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106

第二节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108
第七节 晏阳初的教育思想.....	109
第四节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建设.....	110
第五节 陈鹤琴的“活教育”探索.....	111
第六节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	112



第一篇中国古代教育

第一章 官学制度的建立和“六艺”教育的形成

第一节 教育起源与学校萌芽的传说

一、教育的起源

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及人类自身身心发展的需要。原始社会教育的特点有：

第一、教育不是专门的社会活动。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教育还不可能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活动，也没有专门的场所和人员来进行教育。人类最早的教育都是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实施的，传授生产经验、技能、社会生活的知识、能力及行为规范，完全是自然状态下的教育。

第二、教育的社会性和无阶级性。原始社会的的教育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进行教育也是社会公众的事情。同时，原始社会财产公有，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抗，原始教育也就没有阶级性，只有因为分工、年龄及性别不同所形成的差别。

第三、教育内容十分简单。基本上局限于一些原始的生产劳动、社会生活和原始宗教活动方面的教育。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原始社会的教育内容也呈现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

第四、教育以口耳相传和行为模仿为主要手段。原始社会尚未出现文字，教育的手段主要是口耳相传和行为的观察模仿。原始人通过这些形式，来接受知识、技能、道德行为等方面的教育。

原始社会进入氏族公社末期之后，由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以上的各种特点逐渐为许多新的因素所取代，开始滋生了学校的萌芽。

二、古代学校的萌芽

（一）时间与历史条件：

我国的学校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初期。学校产生的历史条件是：

1. 由于青铜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劳动生产有了剩余，贫富差别、脑力劳动分工初步出现，使一部分人得以脱离生产劳动专门办教育；
2. 社会事务日渐复杂，需要培养专门人员进行管理；——社会需要
3. 文字的产生为日益繁复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积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造成了产生学校的现实需要。

（二）原始学校的形态

1. 五帝时期：成均（大学）和庠：原养老场所
2. 夏朝：序：教射的场所；校：驯马的场所

夏代是最早的奴隶制王朝。夏代的学校，有“序”、“校”两种，都非常重视军事教育。“序”是射的意思。金文的“序”字，象人在“个”中射箭的样子，以表示习射之所。至于“校”，《说文》的解释是：“从木，交声。”其原义为“木囚”，即用木头或竹子围成栏格做为养马之所，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习武和比武的场所。在这里，贵族子弟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

3. 商朝——发展时期，较为完备——庠、序、大学、小学、瞽宗（商代大学的特有名称：学习礼乐）

商代是我国奴隶制的发展时期，已有了成熟系统的文字以及成文的典册，在甲骨卜辞中发现有“教”、“学”、“大学”等字样，是商代已经有学校教育的明证。商代还出现了“瞽宗”这种学校形式。习礼、习武是商代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习礼的内容主要是学习祭祀和乐歌，习武的内容主要是习射，也学习其他综合性的礼仪行为。商代在天文、历法方面已有很大进步。它们都离不开数学，甲骨文中出现的数字，最大的已达到三万。出土文物还表明，商代已能进行一般的算术运算，并能绘制较复杂的几何图形，所以算学必然也成为学校教学的内容。

第二节 西周的教育制度

官学机构与政治机构联系在一起，没有分离独立，历史上称这种现象为“学在官府”。西周，政教一体，官师合一，以“明人伦”为教育宗旨，培养治术人才。

“学在官府”

是西周教育制度的主要特征。主要体现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国家有文字记录的法制规章、典籍文献以及祭祀典礼用的礼器全都掌握在官府，普通百姓根本无缘接触到。学在官府具体表现为官师不分和政教合一。官吏既负行政职责，也有教学的任务在“学在官府”体制下，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较为完善的学校教育体制以及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主体的教育内容。

西周建立了两大系统的学校，即国学和乡学。“国学”是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设在天子、诸侯所在的都城；“乡学”是按照地方行政区域为一般奴隶主和部分庶民子弟设立的。

“国学”又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级。“小学”设在王宫内。“大学”设在都城过郊。

教育内容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而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基本内容。

家庭教育：父母就是幼儿最初的教师。当时重男轻女的现象非常严重。女子在社会上和家庭里都没有地位，也没有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从小进行基本的生活技能和习惯的教育，7岁进行男女有别的教育。

第三节 “六艺”教育

六艺：夏、商、西周时期教育的基本内容。“**礼**”，后世称之为周礼，包括周代的典章制度和以孝、悌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以及各种礼仪。“**乐**”包括歌咏、舞蹈和演奏乐器等。“礼”和“乐”密切配合，“礼”是外在的政治原则、道德行为规范，是其思想行为准则，具有强制性。“乐”则陶冶人的感情，使强制性的礼转化为人们内在的道德和精神的需求。“**射**”即拉弓射箭的技术。“**御**”即驾驭战车的技能。“**书**”是读书、写字。“**数**”是计数。“六艺”体现了文武兼备、诸育兼顾的特点，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早期的辉煌。

第二章 私人讲学的兴起和传统思想的奠基

第一节 私人讲学的兴起

一、私学兴起的条件与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丧失了数百年来经营的关中统治基地，实为寄人篱下，丧失了控制天下的能力。于是列国纷争，大国称霸，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兼并战争和各国内部的政治斗争都十分激烈。旧有的统治秩序被彻底打乱，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都在发生深刻变革。“学在官府”的教育走向衰落，而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新教育形式——私学开始兴起。

造成官学衰废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天下动乱。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诸侯国内部争夺统治权的内乱，连年不断。各国统治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维护生存、扩大势力，无暇顾及教育，不论国学或乡学都难于维持，日趋衰废。

官学衰废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旧有的教育失去了价值。由于周王室已无力控制天下，“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后来，甚至诸侯国君也大权旁落，而出现“陪臣

执国命”的现象。原有的等级制度的崩溃使传统的礼制也受到了破坏。既然这些礼制规范已不再得到严格遵守，以礼乐为核心的教学内容也就缺少了实用价值，自然很少有人愿意去学了。于是天子的辟雍，诸侯的泮宫，地方的乡校，逐渐消亡。

官学教育的衰废，反映了“学在官府”的旧教育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权力的频繁转换，对新型的人才及文化教育的需求更为强烈。以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就以新的办学形式，聚徒讲学，从而成为创办私学、传播学术文化的先驱。

私学产生的原因，除了上述社会需求外，还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即有可教学的内容和有从事教学的人。在“学在官府”时代，民间根本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因此不可能有学，而到了春秋时期，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是学术的扩散与下移。在统治阶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被迫流亡他处，这些没落贵族的流亡导致了学术的扩散。例如周惠王、周襄王间争夺王位的内讧，使世代掌管周史的太史离周去晋。周景王死后，王子朝争夺王位失败，率领一批贵族及百工，携带王室所藏文献典籍逃到楚国，至于其他小规模 of 贵族流亡事件则层出不穷，造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这些没落贵族往往沦落民间，他们的流亡，不仅导致学术扩散到四方，而且使学术下移到民间，从而使民间有了从事教学活动的条件。

二是新兴的“士”阶层的出现。“士”在西周以前就有。按当时的社会等级序列：天子、诸侯、大夫、士和庶人，前三类都是贵族，而士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很难升到统治集团上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一批旧贵族在政治斗争中垮台了，沦落为士。他们一般都受过教育，熟悉各种典章制度，并且有操持各种礼仪的实际技能，正是他们将学术文化带到了民间。一些平民因有条件接触到学术文化，而上升为士。这样，士的队伍大大扩展，成为一个影响很大的社会阶层。

士与工、商、农并称“四民”。士一般不务农、做工、经商，脱离一般生产劳动，而是凭借掌握的学术文化及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专长，来为权贵服务。所以，士虽为民，穷困潦倒时可能连一般农、工、商都不如；而一旦被统治者看中，又可能获得高官厚禄。士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作官从政、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从政是主要目标，从事教学和研究则是打好基础，以提高学术水平和社会知名度。而要想成为一个士人，也必须从拜师学艺开始，学而优则仕“士”阶层正好为私学提供了师生双方的办学可能性。

二、私学兴起的意义

首先，它冲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学校教育为官府垄断的局面，扩大了教育对象。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并在私学中付诸实践，教育对象由少数贵族扩大到平民，为学术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其次，私学是专门的教育场所，这就打破了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旧官学教育体制，使教育成为一种独立的活动。私学的教师以具有知识技能的贤士为师，开始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职业。教师可以自由讲学，学生也可以自由择师，私学当时已有竞争出现，相传连孔子的私学也曾经历“三盈三虚”。

其三，私学使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得到新的发展。在教育内容上，突破了西周的“六艺”范围，各家各派可以自由传授自己的政治、道德观点和新的知识、技能。在教育方式上，私学可以没有固定的教育场所，而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生主动求学为动力基础，办学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其四，私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促进了先秦教育理论的发展。私学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卓有建树的教育思想家，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等，而且还出现了如《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商君书》、《韩非子》等记载了大量教育思想的典籍以及《大学》、《学记》等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

总之，私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教育制度上一次历史性的变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私学依靠自由办学、自由就学、自由讲学、自由竞争来发展教育事业，不仅符合历史潮流，也开辟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

第二节 诸子百家私学的发展

一、养士之风盛行

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大量奴隶的人身得到解放，扩大了士阶层的来源。诸侯国之间争雄加剧，士阶层成为各方争相利用的重要力量，因之养士之风大盛。想成为士就要拜师求学，这就促进了私学的发展。

在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实力和谋略是致胜的根本，而人才又是增强实力和采取正确策略的关键。当时各国具有眼光的统治者都大开招贤纳士之门。早期的齐桓公用管仲，秦穆公用百里奚，乃至后来的商鞅、孙臧、吴起、苏秦、张仪，都是由“士”出身的显赫一时的权臣。

起初统治者只是发现贤士才予以任用，到后来则预先养士以供需要时派上用场。到了战国，先是公室养士，随后私门也养士。所养之士称门客、宾客、门人、食客等，魏文侯、齐宣王、齐缙王、燕昭王等都是诸侯中养士的代表。高官贵族也致力于养士，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每人养士数千，凡有一技之长者就可能被网罗，连鸡鸣狗盗之徒也用。秦国吕不韦养士多达3千人。

养士之风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进一步繁荣。养士的公室或私门，都像是一所私学或一些私学的集合体，而影响巨大的当属齐国的稷下学宫。

二、百家争鸣

私学在教学时各自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社会理想、伦理观念等，形成不同的思想体系，发展成为不同的学派，各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常称之为“诸子百家”。

各家各派之间因立场和解决社会问题上方法的不同，相互斗争，相互批评，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百家争鸣”中教育始终是中心问题之一。不同的学派往往就是不同的教育团体；各家各派又因对教育在社会改造和人性改造等方面作用的不同认识而相互辩论。因此，“百家争鸣”必然推动教育实践的活跃、教育思想的繁荣、教育理论的发展。

三、私学发展

战国时期，各家各派都重视教育活动，都不同程度的开展教育活动。在各家之中，儒、墨、道、法影响最大。四家之中，儒、墨更被称为“显学”，这不仅因为这两家的学说影响大，也因为这两家教育活动的规模大。道家和法家虽然在理论上不重视教育，但为了扩大学说的影响，也都有授徒讲学活动。

第三节 齐国的稷下学宫

一、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的一所著名的学府，因位于齐国都城稷下而得名，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与缩影，也是当时教育史上的重要创造，对中国古代教育和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

（一）性质

1. 稷下学宫是一所由官家操办而由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学校。
2. 稷下学宫是一所集讲学、著述、育才活动为一体并兼有咨政、议政作用的高等学府。
3. 齐国官方出资举办，始终不改变养士、用士的基本目的。从主办者和办学目的来看，稷下学宫是官学。稷下学宫是由养士制度发展演变而成的教育机构，它保持了充分尊重士人之讲学，不加干涉与限制的风范，其教学与学术自由，体现出私学的性质。

（二）特点：

其一，“不治而议论”，即士人并不担任具体的官职，一般不承担行政事务，以备统治者咨询，日常则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因此，稷下学宫实际

上起到的是“智囊团”的作用。

其二，自由辩论。稷下学宫采取的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政策，各家学派在稷下学宫都占据了一定地位，他们要使自己的学说得到公认，不得不通过公开的辩论，以理服人，这就活跃了思想，繁荣了学术。在学宫所召开的“期会”中，不仅全校教师和四方游士可自由参加，学生也可参加驳难辩论，这种在学术上师生之间的民主平等，有助于扩大眼界，也有利于人才的成长，并对解放和活跃学生思想起了极大的作用。

其三，学无常师。稷下学宫的教学方式十分特殊，在教学中，学生们可以自由听讲，实行游学自由的方针。当时前来稷下学宫的，既有个别游学，也有集团游学的情况。可以随时请求加入，也随时可以告退，不受任何限制。学生来到稷下学宫后，则不限于跟一个先生，其它先生讲学也可以听讲请教，这种灵活的教学制度，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学说，打破了学术流派的局限，各家各派在稷下学宫相互批评，又相互吸收，促进了学术发展。

其四，在学生管理上，稷下学宫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学生守则——《弟子职》，全文载于《管子》，从尊敬师长到敬德修业，从饮食起居到衣着仪表，从课堂授课到课后复习均有严格规定。从《弟子职》可以看出稷下学宫对学生管理的总体特点，体现了教学的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这一学则流传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五，待遇优厚。包括学者的政治待遇与经济待遇。

二、历史意义

（一）促进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的发展。

（二）显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创造精神。

（三）稷下学宫创造了一个出色的教育典范。它所独创的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办学形式，集讲学、著述、育才与咨政为一体的职能模式，自由讲学和自由听讲的教学方式、学术自由和鼓励争鸣的办学方针，尊重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都显示了它的成功之处。

（四）留给后人的思考：稷下学宫尊重贤士，尊重学术，其思想学术、文化教育成功却未带来齐国政治的成功。

第四节 孔子的教育思想

一、孔子的生平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者。他出身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先祖为

宋国大夫，由于贵族内部的纷争，逃到鲁国，到他的父亲叔梁纥时，家族已没落为下级武官。孔子3岁丧父，家境贫寒，故他自称“吾少也贱”。但他自幼勤学好问，经常做习礼的游戏。长大后曾做过管仓库的“委吏”和管牛羊的“乘田”等小官。大约自30岁左右，孔子开始私人讲学，向他请教的人越来越多，在鲁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50岁左右，孔子当上了鲁国的“中都宰”，不久又升为“司寇”。但鲁国的政局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他只作了3个月的司寇，便被迫离开了鲁国，带着他的学生周游列国，度过了14年的流亡生活。晚年时重返鲁国，专门从事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直至去世。

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的人，在文化教育上的贡献主要有两个：第一，编定六经，整理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典集；第二，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成为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奠基人。

二、孔子论教育的作用

（一）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孔子认为教育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工作，因为通过教育可以把社会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传播到民众之中，这样就会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就是说，通过教育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风气传播开来，就会影响政治。

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来看，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有了众多的人口，就要努力发展经济，使它富足起来，还要加强教育，这就是“庶、富、教”思想。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话说明孔子把众多的人口，富裕的生活和发达的教育，当作立国的三个要素，人口是最基本的，然后就要使之富裕起来，有了物质生活的基础，还要发展教育，创建精神方面的文明。

从教育与法律的关系来看，孔子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政令、刑律，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教育比政令、刑律更加重要和有效。

（二）教育在人的成长中的作用

出自《论语·阳货》，孔子是第一个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上论述教育的作用的思想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是人的本性即先天素质本是很接近的，不同的人之所以有较大的差别，是后天之“习”的结果。这一观点肯定了人不论等级贵贱，生来的天赋素质应该是平等的。这种立足于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论，在西周以前以天生的血缘来决定人的高低贵贱的观念支配下是不可能有的，也为他

实施“有教无类”提供了理论依据。孔子认为个性差别主要是由于人们的后天环境习染各不相同之故，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环境影响，力量更大，这就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

三、论教育对象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平民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孔子创办私学后，实行“有教无类”，就是说在教育对象上，没有身份和地域的限制。孔子宣布：“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有求学的志向并行拜师手续的，他都原意教诲。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其它有关史料记载，孔门弟子之中，有贵族家庭出身的孟懿子、南宫敬叔、司马牛等人，也有贫贱家庭出身的原宪、颜路、颜渊、曾皙、曾参、闵子骞、子张、仲弓等人，商人出身的子贡，甚至还有“大盗”出身的颜涿聚。除鲁国本地的以外，还有从卫、齐、晋、陈、宋、吴、楚、秦等国远道而来的学生。

孔子“有教无类”的招生原则，打破了贵族垄断学术的格局，使教育活动扩展到了民间，适应了“士”阶层的兴起，文化下移的历史潮流，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这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四、论教育目的

孔子虽然也主张通过教育培养官吏，但是已与西周以前对必然作官的贵族子弟进行为官的预备训练不同，孔门私学的教育对象是士人，只有学有所长才可能被选拔为官。《论语·子张》所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虽出自子夏之口，但也是反映孔子的主张，将学习和作官紧密联系，对后世的学校教育和选士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孔子从“为政在人”的政治主张出发，致力于通过教育来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士”和君子。一方面，“士”必须做到立志为道，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他极力称赞颜渊：“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另一方面，士人必须有才能，能处理实际政务，他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说明，在孔子心目中的“士”必须是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

“君子”原是上流社会人士的专称。孔子把它发展成为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孔子多次将君子与小人对照而言，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君子总是追求道义，而小人总是追求功利。二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即君子总是要求自己，而小人总是要求别人。强调了君子在修养内容上，将道德标准置于首位，在修养方法上，则首先是严于律己。

五、孔子的教学思想

（一）教学内容

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六艺”教育的传统，吸收选择了有用学科，又根据现实需要创设了一些新学科，充实了教育的内容。

在孔子的教育内容体系中，包含两大部分，即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而以前者为重心。《论语·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后三项都是道德教育的要求，他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首先要求做一个品行符合道德标准的社会成员，其次才是文化知识的学习，所以在孔子的教育内容中，道德教育占首位，文化知识的学习则是为道德修养服务。

孔子在教学中所用的教材，主要是经过他亲自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即后世所称的“六经”，而事实上，由于《乐》的失传，后世的儒家教育便只剩下了“五经”。“六经”在汉代以后也常被称为“六艺”，孔子传授“六经”，是想借此来传递儒家的修己治人之道，但其中保存了中国古代大量的文化资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诗》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传说古诗本来有三千篇，经孔子删订，存留三百零五篇，概称三百篇。即流传至今的《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孔子对《诗》的教育作用评价很高，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书》即《尚书》，是中国最古的一部史料总集，上自尧舜，下至春秋初期。相传孔子共搜访到三千多篇，他去其虚妄，删其重复，将余下的百篇编纂成书。孔子编辑和传授《书》的目的就在于宣扬文武之政，使后人得到精辟的历史借鉴。

《礼》为孔子选取“士”必须学习的各种礼制，共十七篇，就是流传至今的“三礼”之一的《仪礼》。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孔子认为“立于礼”必须从自我修养上下功夫，能从心理上克制自己不符合礼的不正当欲望，即“克己复礼”，在言行上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才能不越礼。

相传孔子曾编过《乐经》，但后人从未见过。孔子爱好音乐，也很重视音乐之教。孔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把礼教和乐教视为政治的重要手段，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他指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强调礼乐是政治和刑罚的基础。

《易》本是一部占卜的书，由阴阳组成八卦，两两相叠，又构成64卦和384爻，孔子十分喜欢《易》，读到“韦编三绝”的地步。他对《易》经作了传，撰

弃了其卜筮内容和神秘色彩，而将其作为哲学和政治伦理思想来传授，使《易》成为儒家的一部经典著作。

《春秋》是迄今流传下来的第一部编年史，由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整理而成，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 年）共 242 年的大事。《春秋》记载简略，而寓意深刻，所谓“微言大义”。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正名分”，“寓褒贬”，“明善恶”，所以学习《春秋》主要是以史为鉴，培养政治道德观点。后人屡有为《春秋》作传的，成为经典教材的有“三传”，其中《公羊传》和《谷梁传》主要是阐发《春秋》的义理，而《左传》则以叙述史实为主。

局限：忽视了自然知识的传播，鄙视生产劳动的知识技能。

（二）教学方法论

孔子认识到教学过程不仅是教师教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学生学的过程，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教学三个过程：学——思——行

1. 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孔子教学特色的一个体现。《论语·述而》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弟子有的长于“德行”，有的长于“言语”，有的长于“政事”，有的长于“文学”。这就是所谓孔门四科。朱熹对此的注释是：“夫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是有了“因材施教”的说法。

因材施教的前提在于对学生要有准确、全面的了解。孔子十分注意观察、了解学生，对学生的个性、特长、优缺点了如指掌，比如他指出，子路有治兵之才，冉有有做邑宰之才，公西华有外交才能等。他曾概括地指出他的几个学生的个性特点：《论语·雍也》云：“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即子路坚决果断，子贡通情达理，冉有多才多艺。

在对学生了解的基础上，孔子注意从学生的具体实际出发进行教育。例如冉有与子路都分别问过“闻斯行诸？”即听到一个道理是不是要马上去实行呢？孔子的回答不同，由于冉求个性过于“退”，即办事不果断，他就设法以“进之”，让他马上实行，而子路个性过于“兼人”，即争强好胜，他就设法以“退之”。让他先请示父兄再说。所以孔子的弟子都能充分发挥所长，克服所短，取得长足的进步。

2. 启发诱导

孔子教学的基本方法是启发诱导，他认为掌握知识应该是一个主动探索领会的过程，因此他在教学实践中特别重视学生的主动性问题。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启发一词即从此而来。意思是说：在

教学中必须让学生认真思考，心求通但未得，然后可以启发他；经过思考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辞表达，此时可以开导他。要求学生开动脑筋，做到“举一反三”。《论语·八佾》中有一个例子：当子夏读《诗》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时，问孔子什么意思，孔子启发说：“绘事后素。”子夏就领会到孔子是说礼须建立在仁的基础上，但不确定，就再进一步问：“礼后乎？”孔子很高兴，说：“能够阐明我的意思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跟你谈论诗经了！”孔子善于启发诱导，获得弟子对他的称赞：“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3. 学思并重

学与思是进修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环节，孔子对二者都是很重视的。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强调学的重要性，反对思而不学，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有一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求实事求是，不要不懂装懂。他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即能够虚心向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人请教。他本人就非常谦虚好问，做到“每事问”。另一方面，孔子又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反对学而不思，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他还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不经考虑就随便将听来的乱传，也是违背道德修养准则的。

4. 由博返约

解决学习的广度和深度的矛盾，或者说解决知识的广博与专一的矛盾。知识要广，但必须有一个中心加以统帅。

六、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

（一）道德教育内容

“仁”是最高的道德概念。其道德教育思想体系大体是以“孝悌”为本，以“礼”为规范，以“忠恕”为一贯。此外还提倡智、勇、信、义等道德。

（二）道德教育原则

道德教育原则：

1. 立志：“立志”就是要确立人生的远大理想和宏伟目标，找到前进的动力。孔子强调了立志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认为连普通人都有其志向，不可被强制改变，作为士、君子，更要确立崇高的志向。

孔子认为立志是重要的起点，但要实现志向，并非易事，这就需要有恒心与百折不挠的精神。他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教育学生要磨炼自己的意志，如他所说的“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意思是说，最坚硬的东西，是磨不薄的，最白的东西，是染不黑的。孔子曾经自述他的为学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以少年立志求学上进为起点，要经过终生发展，才能达到高度的道

德精神境界。

2. 克己：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主张重在严格要求自己，约束和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道德规范，他把这称之为“克己”。道德修养归根结蒂是自己的事，因此，孔子特别强调要从自我做起。在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原则。应该说这是一种主观与客观完善结合的道德行为方式，当然也会出现自己坚持错误、也容许别人同样的错误的问题，但总比那些要求别人是一套、要求自己又是一套的卑劣小人要强。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道德修养必须以克己为前提，不为利己而损人以至损害社会利益，也才能达到“仁”这一最高道德水准。孔子还认为，道德准则和规范是公共利益的体现，对个人起着约束作用，因此，需要个人克制自我。善于自克才是道德修养的标志。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是复礼的基本条件，只有克制自己非分的欲望，才能使自己的言行回复到“礼”的道德规范上来，才能限制对私利的追求，不为利己而损人以至损害社会利益，也才能使道德达到“仁”这一最高道德水准。

3. 力行：道德的认识与道德行为问题。孔子强调的是道德的行动，他提倡身体力行，言行一致。

4. 改过：在处理过失和改过的关系方面，孔子强调改过，他把道德修养过程也看作是改过迁善的过程。孔子认为社会现实中不存在不犯过错的圣人，人非圣人，难免要犯错误，关键是对待错误的态度，孔子把道德修养的过程也看作是一个不断改过的过程。孔子认为，对待过错，首先要认识错误而不要掩饰错误。他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他承认自己也曾犯有过错，并认为，过错被别人发现，是自己的幸运。他还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的过错，就好比日月之蚀，人人都看得到，但只是一时短暂的现象，不会影响日月的光辉；君子改过后，仍然会受到人们敬仰。而“小人之过也必文”，即文过饰非。所以孔子强调：“过则勿惮改”只有“过而不改，是为过矣”。犯了过错，且不能改正，这才真正的过错。

5. 中庸：人的行为最好是恰到好处，过分与不及都不好。

6. 内省：积极开展主观的思想分析活动，强调自觉地进行思想监督，把被动遵守变成为内在的自觉要求，而不受外来强加的限制，他把这种主观的思想活动，称之为内省。孔子要求学生要积极进行自我省察，这就是内省的修养方法。他的学生曾参就坚持一日三省吾身的作法：“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随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避免继续犯错误。

7. “乐道”就是要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政治信心心甘情愿为之奉献。教育学生正确处理远大理想与眼前利益的关系，政治理想与物质享受的关系。

七、作为教师的条件

(一) 学而不厌：学而不厌，即学习永不满足，这样才能保持教学的永久活力。孔子自己就是终生好学的典范，“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而且是广泛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孔子将学与教联系在一起，作为对教师的基本要求，是抓住了为师之道的根本的。

(二) 教学相长：教学在与学生交流切磋中进行。

(三) 诲人不倦：出自对学生的爱，对事业的忠，使孔子能诲人不倦。甚至在颠沛流离的困境中，他都一如既往地开展教学。在宋国，“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在陈国被困断粮，“孔子讲诵弦歌不衰”。曲阜师大校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四) 以身作则：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身作则是为师之道的又一根本所在，因为学生对教师也会“听其言而观其行”。道理是否正确，是否当行，不在能否讲得娓娓动听，而在讲的人能否身体力行。孔子对弟子的人格感召力，首先是体现在他的“身正”上。北师大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五) 温故知新：“温故知新，可以为师矣”借鉴历史经验，认识当下问题；巩固旧知的过程中，得新知

(六) 爱护学生：顾明远：“没有爱教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爱——教育——师生情深

八、历史影响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和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许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教育思想和经验，大多可以追溯到孔子。他的贡献有：创立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促进文化学术的下移；他提出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重视教育；他提倡“学而优则仕”，为封建官僚的政治体制准备了条件；他重视古代文化的继承和整理，进行了教材建设，奠定了后世儒家经典教育体系的基础；他总结了教育实践经验，对教育教学方法有新的创造，他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原则等都揭示了许多教育教学规律；倡导尊师爱生，提出了作为一个理想教师的要求；总之，孔子的教育思想为中国古代教育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教育遗产，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第五节 孟子的教育思想

孟子，名轲，战国中叶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人，出身于贵族家庭，父亲早

逝，其母仉氏教子有方，为教育孟子，为他选择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曾三迁其居，为后世留下了“孟母三迁”的美谈。孟子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徒，子思、孟子之学，后世称为思孟学派。作为孔子思想的嫡传，孟子被后世统治者尊称为“亚圣”。

孟子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事业，他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人生三大乐趣之一。四十岁以后，他带领弟子游历各国，往来于诸侯之间，处处受到礼遇，度过了二十年的时光。晚年回故乡专事教学与著述。他的弟子很多，著名者如万章、公孙丑、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孟子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思想经验。《孟子》七篇是研究其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该书一般被认为是他的弟子对孟子言行的记述，也有人说是孟子本人的著作。

一、教育的理论基础：性善论

孟子认为人性生来就是善的，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君子和庶人的区别就在于使保存还是丧失这种“善性”，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就发源于先天就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但是由于后天接触的环境不同，有人因各种物欲影响，失去其善性，从而为恶。

二、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一）教育的作用

孟子论教育作用，是以其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一方面强调教育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在政治上，孟子主张“施仁政”，其中心是“民本”思想。认为仁政的根本在“得民心”，而教育又是“得民心”的最有效的手段。他认为好的行政管理还不如好的教育。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仁政必须辅以善教，善教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在哲学上，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人性是先天所固有的，是至纯至善的，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是因为人有善性。不过孟子所说的性本善，并不是说人性中具有纯粹的完全的道德，只是说人性中具有“善端”，即善的因素或萌芽。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要做一个完善的人，仅有同情心、正义感、礼让态度和道德判断能力这四个善端是不够的。人之贤愚，还取决于对这种先天的善端能否存而养之，扩而充之。如果自暴自弃，或者受到不良的社会环境、教育的影响，就会失掉这种善端，这就是他所说的“陷溺其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找回散失的善的本性，保存和发扬天赋的善端，因此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谓“放心”，指的就是人在后天所丧失了的善端。孟

子认为，任何人只要肯接受教育，肯于学习，就可以把先天的善端充分发挥，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这就是圣人，他曾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其理由就在于人人都有善端，普通人与圣人在先天本质上并无区别。由此可见，孟子很看重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二）教育的目的

孟子主张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君子”、“圣贤”及“大丈夫”。同孔子一样，孟子也要求“君子”、“圣贤”、“大丈夫”以德为主、德才兼备。他有一句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就是说，一个人格高尚的人，一定要经得起富贵、贫贱、暴力的考验，把道德意识转化为自己的坚定信念。孟子指出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这种人格理想对后世的影响十分巨大。

从教育对社会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孟子明确概括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目的——“明人伦”。他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主张兴办庠、序、校等教育机构来培养学生，庠是培养之意，校是教育之意，序是习射之所，无论是夏代的校、商代的序、周代的庠，还是三代共同的学，其目的都是为了阐明人际之间的各种关系及掌握社会生活准则，具体来说，所谓“明人伦”，就是“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后世亦称为“五伦”，代表着五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目的在于维护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

三、理想人格

孟子，他提出“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首先，“大丈夫”有高尚的气节。

其次，“大丈夫”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浩然之气。

培养理想人格的途径主要靠内心修养，大致有以下几条：

（一）持志养气。

孟子十分重视立志，认为道德教育的首要问题便是“尚志”、“持志”，即坚持崇高的志向。他提出“舍生取义”的理想境界：“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在立志问题上，与孔子不同的是，孟子提出了立志与养气的关系。孟子提出为修身而养气的观点，他认为气是充满全身的能够反作用于心志、道德的东西，一个人有了志向与追求，他就会有相应的“气”——精神状态。志与气是密切相联、互为因果的：“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

孟子认为，普通的人只要注意“养气”，经过量的积累就能形成所谓“浩然之气”，通俗地说就是正直豪迈的心理或精神状态。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正大刚直的，“集义而生”的，所谓集义即指积善，这就是说，浩然之气是靠“养”出来的，是靠一件件平常的善言善行积累起来的。

（二）反求诸己。孟子继承了孔子“君子求诸己”的修养方法，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同时，他又提出面对超过自己的人，不能怨恨，也同样应当反躬自问，孟子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

在道德修养方面如同比赛射箭一样，射箭时要先端正姿态而后放箭，如果没有射中，不要埋怨那些胜过自己的人，要从自身找原因。总之，凡事须严于律己，时时反思。

（三）改过迁善：一方面鼓励人改过自新，一方面积极学习别人的善行。赞扬闻过则喜，见善则迁，与人为善。

（四）刻苦锻炼：

孟子非常强调意志锻炼的重要性，尤其是主张在逆境中得到磨砺。他有一段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他认为，人的成才得之于艰苦的磨炼，环境越是恶劣，对人的造就就可能越大。孟子在此虽然打着天命的旗号，但强调的是个人奋发努力，在艰苦和患难中，提高承受力，不断磨练意志。

（五）存心养性。虽然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的善端，但善端要形成实在的善性要靠存养和扩充。孟子认为，存养的障碍来自于人的耳目之欲。所以孟子主张寡欲，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一个人欲望很少，那善性虽有所丧失，但也很少；反之，如果一个人欲望很多，那善性虽有保存，但也很少。

四、教学思想

孟子把认识看作是一种对内心世界的探索，是对内在善性的发掘。因此在学与思的关系上更为强调“思”的作用，他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其教学思想更具内倾性。

（一）深造自得

孟子强调学习、修身的关键在于自得。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左右逢其源。”

他认为君子深造要有正确的方法，这就是要求他自觉追求而得到。自觉追求而得到的，掌握得会比较牢固，牢固地掌握了，就会积蓄得很深，积蓄的深了，就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据此，孟子主张，学习的深化，必须要有自己的收获和见解。尤其是学习中要有独立思考精神，读书是必要的，但应求理解，而不能

书云亦云，对前代的文献典籍，不要轻信，不能盲从。

（二）循序渐进——盈科（水洼）而进

这是指学习和教学过程中要循序渐进。孟子说：“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又说：“其进锐者，其退速。”进程过于迅速，势必影响实际效果，致使退步也快。正确的进程应当象流水一样，注满了一个洼坎之后再往下流，这就是“盈科而后进”的道理。孟子还以“揠苗助长”的寓言来说明循序渐进的重要性，学习知识如同作物生长一样，是一个自然有序的过程，有自己的规律，人们应当关注并促进教学过程的实现，但决不能用拔苗的方法去助长，结果是适得其反。

（三）教亦多术（因材施教）

学习主要靠学生深造自得、专心有恒，但教师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教师的作用在于积极引导，启发学生思维，因此，教学方法不能千篇一律，而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又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对学生，有的应及时指点，有的应成就其德行，有的要发展其才能，有的可答其所问，不能及门者可以间接地进行教育，甚至拒绝教诲，足以成为人的警策，本身也是一种教导之法。总之，教法很多，要因人而异。

（四）专心有恒

孟子认为，学习必须专心致志，不能三心二意，孟子举例说：“今夫奕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奕秋，通国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两个人同时跟一个围棋国手学习下棋，但结果大不相同，这决非由于其智力差异，而是由于专心与不专心的缘故。因此，孟子认为，学习必须专心致志，集中注意力，这是孟子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科学原则。孟子主张专心致志的同时，还提出了持之以恒的思想。他告诫学生说：“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山间小道经常去走就变成了一条路，如果有一段时间不走，便会被茅草所堵塞。学习亦然。如果停下一个时期不用心学习，学到的知识也会遗忘。因此，学习要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他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有所作为的人做一件事如同掘井，掘到六七丈深还不见水，就停止挖掘，结果等于没挖，这说明有为者必须有恒心，不能半途而废。学习也是如此，必须坚持到底，不能功亏一篑。孟子反对“一曝十寒”的学习态度，他说：“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即使是最容易生长的植物，如果晒它一天，冻它十天，也不可能得到生长。都是反复强调学习要持之以恒。

第六节 荀子的教育思想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年赵国人，儒学大师。也曾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他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长期执教，成为资望最高的“老师”，齐襄王时，三次任学宫“祭酒”，影响很大。

荀子对当时诸子各家的观点都予以批评，包括儒家的子游、子夏、子张、子思、孟子各派。同时他又批判地吸取了各家学说，特别是法家思想，因此被誉为先秦集大成的思想家。他的学生中，李斯、韩非都是著名的法家代表，而浮邱伯、张苍均是当世名儒。荀子学派与思孟学派是先秦儒家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

现存《荀子》一书，共 32 篇，大部分为荀子本人所作，也有他的弟子后学撰写的内容。

一、性恶论与教育作用

（一）“性伪之分”

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它完全排除任何后天人为的因素。与生俱来的本能是“性”，而后天习得者为“伪”。人的本性是恶的，而人的善德是后天习得的。

（二）“性伪之合”

性与伪是有区别甚至对立的，但是二者也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通过化性起伪实现性伪之合。

（三）“化性起伪”

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化性起伪”的作用。教育作用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是环境的作用，因而，化性起伪是环境、教育和个体努力的共同结果。

二、教育目的

荀子在《劝学》篇中明确地提出了教育目的与内容。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在荀子看来，教育目的就是将士最终培养成圣人。荀子对“学而优则仕”思想作了更为深刻的阐述：“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治学并非一定要作官，但作官的必须先治学。

荀子把当时的儒者划分为几个层次，即俗儒、雅儒、大儒。俗儒是最低一等的儒，这类人徒然学得儒者的外表，宽衣博带，但对“先王”之道仅会作教条诵读而已，全然不知其用；雅儒不侈谈什么“先王”，却懂得取法“后王”，他们虽不能理解“法典”所未载和自己所未见的问题，却能承认无知，显得光明而坦荡；大儒是最理想的一类人才，他们不仅知识广博，且能以已知推知未知，自如地应

付新事物，新问题，这才是教育所要培养的理想人才。

三、教育内容

在教育内容方面，荀子特别强调学习《诗》、《书》、《礼》、《乐》、《春秋》和《易》等儒家经籍，而尤重礼乐。他认为礼是自然与社会的最高法则，所以说：“学至于《礼》而止矣。”他曾写《乐论》一文，认为，乐则是表现情感的重要方式，“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的教育作用很大，“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他认为礼可使上下有别，乐可使上下和谐，礼乐并施就能“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善美相乐。”

荀子重视以儒家经籍为内容的文化知识传授，对经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由于荀子的传经，使先秦儒家经籍得以保存，这就使后世中国封建社会教育有了经典的教科书，为文化、思想定于一尊提供了物质基础。

四、教学思想

荀子认为教育是“化性起伪”的过程，是不断地积累知识、培养道德的过程，因此，在教学思想上，与孟子“内省”的思路相反，他更强调“外积”。在学与思的关系上，更侧重于“学”，其教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积”“渐”

荀子通过教育可以改变自己的恶性，从而成为君子乃至圣人，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君子，因为人性是随着环境和教育而向多种途径发展变化的，其关键在于人本身的主观努力，这就是所说的“积”。在荀子看来，无论是知识还是道德，都是由于积累而成的。他说：“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

“注错习俗”即指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与教育。他还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这说明知识和道德是一个不断积累和提高的过程。

荀子在重视主观上“积”的同时，也重视环境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这就是他所说的“渐”。他认为，通过主观的“积”和环境的“渐”，能够使人的本性发生根本的变化。

（二）闻、见、知、行的教学过程

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这段话表达了学习过程中阶段与过程的统一，学习初级阶段必然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思想。

闻、见是学习的起点、基础，也是知识的来源。人的学习开始通过耳、目、鼻、口、形等感官对外物的接触，形成不同的感觉，使进一步的学习活动成为可

能，故云：“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但是，闻、见只能分别反映事物的一个方面，无法把握事物的整体与规律。

知的阶段实际上是思维的过程。荀子说：“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学习而善于运用思维的功能去把握事物的规律，就能自如地应付各种新事物。这实际上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然而，仅有理性认识而不去实行，虽有广博的知识，也仍然不是终结，还存在更高水平的“知道”，即“行”。行是学习必不可少的也是最高的阶段，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

在他看来，由学、思而得的知识还带有假设的成份，是否切实可靠，唯有通过“行”才能得到验证，只有这样，“知”才能称得上“明”。这是教与学不可违背的“法则”。

（三）解蔽救偏，兼陈中衡

荀子特别重视良好的思想方法和学习心态。他看到在学习过程中人们容易因片面性而妨碍认识事物的全貌。因此他提出了解蔽救偏、兼陈中衡的原则。所谓“蔽”，就是片面性，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或只被事物的一个方面所支配，从而对复杂的事物和现象缺乏全面了解。只有解除其蔽，以救其偏，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因此，荀子提出了“解蔽”之法，这便是“兼陈中衡”，也就是说，把所有事物都展示出来，摆列在一起，不偏执于某一事物和事物的某一方面，对事物作全面、广泛的比较、分析、综合，择其所是而弃其所非，以求如实地把握事物及其关系。

这一思想方法含有辩证法的因素，当然，荀子并不知道揭示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他权衡事物的标准不是客观实践而“道”或“礼义”，这就削弱了这种思想方法的积极意义。

（四）虚壹而静，专心有恒

荀子教学特别重视对学习态度的培养，他把学习态度归结为“虚壹而静”，特别强调专心有恒。所谓“虚”，即“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就是不要先入为主，不以已有的知识或见解阻碍对新知识的认识和接受。所谓“壹”，即“不以夫一害此一”，就是不一心二用，不以另一项注意妨害这一项注意。所谓“静”，即“不以梦剧乱知”，就是不能用没有根据的胡思乱想或者情感的冲动来扰乱人的理智和思维活动。总之，只有做到虚怀若谷、精神专注、头脑清醒，学习才能取得成效。

荀子特别反对志不专注，用心浮躁。而要想做到“专”，就要持之以恒，不断朝着一个方向努力。荀子说：“骥骥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学习就如同雕刻一样，只要坚持不舍，金石也可以镂空。“锲而不舍”的精神是进学修德的有效途径。所以，学

生获得知识技能，不取决于愚与敏，如果能不懈地努力，就一定能学有所成。

五、教师的地位与作用

荀子特别推崇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竭力倡导尊师。荀子认为，教师的作用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相连的。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教师的作用关系到国之兴衰，原因在于，“礼”是最高的社会规范，是治国之本，而教师正是传授“礼”和实行“礼”的关键。他说：“礼，所以正身也；师，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

人无师法，就会任凭恶的本性支配，有师法才有礼教，才能向善。《荀子·礼论》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后世将天、地、君、亲、师并列，即由此而出。

教师的地位既然如此之高，自然不是人人可以作教师的。他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即当教师有四个条件，一般的传习学问，不在其列。一是有尊严，使人敬畏；二是年纪五六十岁，有崇高的威信；三是讲授解说准确适当，不违背师道；四是能体会精微之理且能加以阐发。荀子对教师提出这样高的标准，是与教师崇高的地位相配套的。

按照这样的教师价值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然要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荀子主张学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教师，做到“师云而云”，不能有任何违背师说的言论。即使毕业后，自己也当了教师，也不能把老师的教导抛在脑后，否则就是背叛：“言不称师谓之畔，教不称师谓之倍。”这样的要求显然过于苛刻，但它代表着极端尊师的传统流派。

荀子提出“性恶论”，在中国教育史上开创了与教育“内省说”截然相反的教育“外积说”，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他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学习过程、教师地位与作用的阐发都颇具新意，予人启发，其中不少主张对历代封建教育与政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七节 墨家的教育思想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名翟，生卒年不可确考，活动于春秋与战国之际。墨子出身微贱，精于工技，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创立墨家学派。他一生的活动主要是“上说下教”，门下弟子众多，声势很大。儒、墨两家并称为“显学”。

墨家私学是一个组织严格、纪律性极强的宗派集团。其领袖称为“巨子”，墨子是第一代巨子。巨子是精通墨家之义的圣贤，而且还是墨家之法的执行者。

巨子以自己的品格、道德力量和领袖地位对墨家弟子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和震慑力。墨家弟子对巨子都绝对服从，并为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墨家以求天下之利为核心内容的教义，使得墨家成员有着一种共同的信仰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境界，规范着墨家弟子的思想与行为。严格的自我磨炼，又使墨家弟子不仅具有为墨家教义忘我牺牲的品格力量，而且具有相当团结的集体凝聚力。

《墨子》一书共 53 篇，出于墨子及墨家后学之手，是研究墨家教育思想的主要材料。

一、论教育作用

墨子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教人耕者，其功多”，充分肯定教育对生产力发展和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作用。教育不仅对经济发展、创造社会物质文明有巨大作用，同时也给政治的稳定提供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墨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推行教育，主张通过“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家主张通过教育建设一个民众平等、互助的“兼爱”社会。在他看来可以通过教育使天下人“知义”，从而实现社会的完善。这就是教育的社会作用。

墨子阐述了环境和教育对人性形成的影响，“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在他看来，人性不是命定的，先天的人性就如待染的素丝（素丝说），有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就能造就什么样的人。

二、论教育的目的

墨子主张教育要培养“兼士”，作为兼士，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道德的要求、思维论辩的要求和知识技能的要求。墨家讲的德行的基本要求就是“兼爱”。即能够毫无区别地爱一切人；知识技能要求是为了使兼士们有兴利除害的实际能力；思维论辩要求是为了“上说下教”，去向社会推行其“兼爱”主张。

三、教育内容

在教育内容上，以“兼爱”为核心的道德教育要求“兼士”必须奉行墨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义，其宗旨在于造福全社会。墨家重视论辩能力的训练，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游说，推行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墨子对论辩术有深入探讨，提出“察类明故”的原则，强调运用类比，论据要有说服力，是中国古代逻辑理论的开拓者。

墨子还提出了判断言谈是否正确的三条标准，即著名的“三表法”：“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通过对大量实际问题的论证，提炼出了各种思维的逻辑方法，同时又将这些逻辑方法应用于各种实际问题的分析、论证、推理。墨家还注意对自然科学、生产技能、军事知识等技能的训练。

四、教育方法（原则）

（一）主动

墨子不赞成儒家“叩则鸣，不叩则不鸣”的被动施教的态度，主张“虽不叩必鸣者也”的“强说人”精神，认为“不强说人，人莫之知”。对不来求教者要主动施教，这叫“行说人”，他说：“行说人者，其劝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他强调主动施教是出自功利效益的考虑。

（二）创造

孔子主张“述而不作”，对此，墨翟提出批评，他认为对于古代的好东西应当继承，但是在今天应当创造出新的东西，是好的东西越来越多。

（三）实践

墨子特别强调道德行为的锻炼。他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他要求学生树立“强力而行”的刻苦磨炼精神。他非常重视意志的锻炼，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意志不仅是重要的道德品质，而且对知识才能有直接影响，没有在艰苦实践中磨炼出来的意志，就谈不上人的智能。

（四）量力

墨子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这要求教师施教，必须从学生的具体实际出发，根据学生不同的能力、基础、才智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教育。

评价：墨家教育思想具有自身特色，其中也包含着不少合理的主张，尤其可贵的是，提倡科学技术和技能技巧的专门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提出并实行，这就使得墨子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份独特有价值的遗产。

第八节 道家的教育思想

道家创于春秋末的老子，生平事迹不详，是个云游四方的隐士。现今流传的《老子》一书共 81 章，保存着老子的一些思想，为研究老子教育思想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道家的兴盛是在战国时期，战国道家分为两派，一是稷下黄老学派，这一派不墨守老子的理论，而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各家之长，有选择地吸收法、儒、

墨、阴阳、名家的一些思想因素，从而能够成为社会政治活动的一种指导思想。另一派则以庄子为代表，承袭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并将其演变为一种出世主义的思想，庄子崇尚自然，追求个人精神的解脱，在教育上主张培养“真人”、“至人”，即一种无己、无功、无名、无情的完全自由的人物，但他的思想代表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潮，对后世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现今流传的《庄子》一书分内、外、杂三篇，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也为研究庄子教育思想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一、对社会文明的批判及教育的作用

道家认为人的最佳状态即非有知识，也非有道德，而是如同婴儿般的无知无欲、无争无斗的质朴状态。社会文明的发展使人异化，摧残人的天性，背弃自然。

教育应是一个将种人为影响逐个消滅的过程，人须注意教育的副作用，教育中要减少人为干预、遵循自然发展，富于启发。没有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从根本上否定了教育的作用。

道家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它永远不变地存在着，不停地在天地万物中间运行着。这体现在教育目的上，就是要求人们把“道”当作认识、追求、实现的总目标，一切教育思想和活动都围绕着“道”而展开。老子论述了“道”的本质特征：“道恒无为，而无不为。”

“道”不依赖人们的主观意识，有自身运作规律，所以称“自然无为”。“无为”的反面是“人为”，而儒家的教育是最主要的“人为”活动。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能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贞臣。”就是说，儒家的仁义孝慈贞的教育都是人为的，不符合人类的本性。在道家看来，儒家所倡导的教育是破坏自然、违背人性的活动。

道家轻视知识，主张以自然之道即“天道”为教育内容，要求人们完全听凭自然，对于传统文化也持反对态度，强调“绝学无忧”。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教育的作用，对后世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二、教育目的：“逍遥”的理想人格

道家认为仁义献身是以牺牲人的自然发展为代价，于是提出一种“无功”“无名”、物我两忘的逍遥人格。道家认为“道法自然”，主张培养能体会自然之道的圣人，对于孔子提出的仁义道德持否定态度。

三、论学习

老子主张“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希望回归原始淳朴的状态，就像婴

儿时代一样。而学习恰恰与老子的主张背道而驰。他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

这样就将“学”与“道”对立起来，为学的趋势总是逐步增加、积累，而为道的趋势则是逐步减少、削除，削减得越彻底，就越贴近自然。因此，他提出“绝学无忧”的著名命题。这样，一切道德、智慧、文化、学术就都被否定了。

提倡怀疑，不仅仅怀疑自然、怀疑社会，更怀疑“圣人”教条。庄周指出“六经”是前人社会活动的成果，限制今天的脚步。道家否定学习知识的作用，实际上是持（传统）教育有害论，这是极端的、片面的。

四、教循自然

道家并非根本不要教育，而是提倡与传统教育不同的特色教育。老子主张“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为教”，反对过多的人为说教、干预、引导。最好是一切顺应自然，就像流水一样，“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含着尊重人的自然发展的意义，在教育态度和方式上，它体现了潜移默化的哲理。庄子也主张教循自然。他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意思是说，人的聪明才智是与生俱来的，人所要做的不是增长知识，而是以自己智力所能理解的来保持其智力所不能理解的，即不强求知识，一切应顺其自然。他主张让人们归朴返真，回到自然状态中去。庄子这一思想，反对束缚人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九节 法家的教育思想

法家是一个以论述社会政治观点为主的学派，在学术渊源上与儒家有关，早期法家代表李悝、吴起就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到李悝的学生商鞅时，法家与儒家开始趋于对立。商鞅辅佐秦孝公实施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其变法的指导思想就是法家理论，商鞅有《商君书》存世。战国末法家的杰出代表李斯、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又和儒家彻底决裂。韩非可称战国法家的集大成者，著有《孤愤》、《五蠹》、《内外储》、《说难》、《显学》等，使法家学说系统化。李斯则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施法家政策的倡导者。

一、“人性利己说”与教育的作用

法家提出了“人性利己说”，认为人性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人都有好逸恶劳的特性。第二，人性都有“趋利避害”、“喜利畏罪”的特点。第三，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利害关系，离不开“算计之心”。

既然人性是自私的，就无法指望人自觉为善，得出教育无用的结论。

根据这些理论，韩非确定了教育和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其一，“不务德而务法”，实行法制教育。其二，“信赏必罚”，取信于民。其三，严刑厉法，实行惩罚主义教育。

二、禁私学、烧诗书，重法制

出于“法制”的目的和统一思想的需要，鼓动统治者，禁私学、烧诗书，压制言论，以统一思想，并奖励安心生产和战斗的农民和士兵，提出了重农的教育，开了中国专制思想统治的先河。

认为只有封建国家颁布的政策法令，才是赖以治国的根本。韩非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好利避害的。但荀子认为教育可以化性，而韩非对此也表示怀疑。他说：“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将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他认为父母的管束，社会舆论的压力，包括教师的教诲，效力都是有限的，只有刑法具有最大的约束力，可以使人畏惧，而不敢作恶。韩非所说的那种人的确有，但毕竟只是少数顽劣分子，而且发展到这个地步，恐怕也有教育不到位的责任。由此以偏概全，得出教育无用的结论，则是错误的。

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管理模式

法家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管理模式。

“以法为教”，一切律令条文都由官府统一制定，然后公诸于众，坚决实施执行。

“以吏为师”即由国君直接操法之大权，主持制定律令。让全体官吏都去作施行法制教育的教师，教民学法。这样法家的法制教育就得到全面的普及。

与道家一样，法家也并非完全不要教育，只是一味提倡法治教育而已。商鞅要求“更礼以教百姓”、“燔诗书而明法令”，以官吏“为天下师”，“学读法令”。他主张以法家思想作为“壹教”，以适应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统一的政治需要，韩非发展了这种思想，明确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在韩非的思想中，除法教外，不要其它教育，除执掌法规的官吏以外，不要其它教师。法治教育固然必要，但教育绝不仅限于法教，教师绝不仅限于官吏，只讲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结果是以法代教，以吏代师，从而取消了普通教育。

法家的主张迎合专制统治的需要，重实力，讲实效的风格有可取之处。但法家一味推崇强权和暴力，蔑视文化教育和社会道德的作用，不仅会摧残思想文化教育的发展，对维护封建统治最终也是不利的，这已被后来秦王朝覆灭的历史所

证明。

第十节 战国后期的教育论著

一、《大学》

《大学》，原是《礼记》里一篇，《礼记》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是儒家学者讨论大学教育的一篇篇论文。对大学的教育目的、任务、途径作了一个总的概括，提出了一个完整而概括的政治、道德教育的纲领和程序。

《大学》提出的教育目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称为“三纲领”。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大学》“三纲领”。这是《大学》提出的教育纲领和培养目标。这是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最明确的概述。

为实现大学教育的三个目标，《大学》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步骤，朱熹称为“八条目”。《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八条的核心是修身，“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中前四条体现修身的过程，从接触事物开始，获得正确的知识和认识。在这个基础上逐渐调整和净化自己的思想观念，树立坚定的志向和意志。最终使内心达到纯正的境界。后四条体现修身的成果，由自身，到家庭，再到一个国家，再到全天下。修、齐、治、平是所有正统儒家士人努力的目标。八条目相互联系，体现了过程与效果的统一。

二、《中庸》

《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儒家思孟学派的作品。它主要阐述了先秦儒家人生哲学和修养问题，提出了“中庸之道”。

《中庸》是论述个人修行的一篇哲理性极强的论文。首先，它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与作用。《中庸》一开头就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思孟学派的“性善论”的思想。意思是说，上天所赐予的称作“性”，顺应和发扬这种本性称作“道”，修明和推广这个道，就称做“教”。也就是说，教育即修道，而教育的作用则在于“率性”，尽量把天赋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体现出来。

《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的过程，这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步骤。“博学”就是广泛的学习，“审问”即对博学中的内容详尽

设问置疑，“慎思”即对审问的内容谨慎思考，“明辨”即通过慎思而明辨真伪是非，“笃行”即将明辨的结论付诸切实的实行。这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学习和修身方法，包括了学、问、思、辨、行等几个主要环节。

对于教育途径，《中庸》认为人可以从两条途径得到完善，一是发掘人的内在天性，达到对外部世界的体认，这就“自诚明，谓之性”，或称“尊德性”。二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求知，以达到人的内在本性的发扬，这就是“自明诚，谓之教”，或称“道问学”。意思是说，学习和教育的实现需要有人性的依据，故要尊重德性，发扬自己先天的善性。同时，人性的完善又要依赖于学习和教育，故要注重后天的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中庸》认为这两条途径是相依并进，相辅相成的。

三、《学记》

《学记》是一篇教育专著，成文大约在战国末期。全文1229字。它与《大学》相表里。《大学》重在阐述教育之纲领，其着眼点为教育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学记》则主要论述教育的实施，其着眼点偏重于教育过程内部的关系，涉及教育作用、政策、制度、方法等各个领域，首次从理论上对教育教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学记》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学专著，具有极高的价值。

（一）教育的功能

《学记》本着儒家的性善论和德治论，首先看到教育的社会政治作用，光靠良好的施政措施，取得的成就是有限的，而教育的作用则是最广泛的和牢固的。因此提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通过教育可以提高社会道德水准，树立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良好的社会风尚，这是后来广义的教育，也就是面向全民的社会教化的宗旨。

其次是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学记》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为喻，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通过教育可以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这是后来狭义的教育，也就是开展学校教育和选士的指导思想。

（二）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

《学记》以追求古代理想社会制度的方式提出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学制系统：“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种按行政建制设学的思想，对后世兴办学校影响很大。

在学校管理方面，《学记》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教学进程和考查标准。“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意思是说，学生到了规定的年龄入大学，国家每隔一年考查他的学业及品行：第一年考查其明析

经义的能力和学习的志趣；第三年考查其是否专心学习，对周围的人是否和睦相处；第五年考查其学识是否广博，同老师是否亲密无间；第七年考查其研究学业的本领和识别朋友的能力。达到这一标准就称为“小成”。到第九年，学生对于学业已经触类旁通，立场也已经坚定不移。达到这一标准就称“大成”。

这个教学进程设想，一方面明确了教育的总目标，又确定了每个阶段的具体标准和要求，而且逐步深化提高，另一方面，每个阶段要达到的标准中都规定了学业知识和思想品德两方面的要求，体现了德智并重，循序渐进的特点。

（三） 教育教学原则

《学记》在综合各家长期教育、教学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总结了一套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这是《学记》的精华所在。

1. 教学相长。《学记》云：“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段话概括了教师自我提高的规律，它说明了教师本身的学习及施教相互推动，使教师不断进步。“教学相长”深刻揭示了教与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学”因“教”而日进，“教”因“学”而益深。这是《学记》对教育理论的一大贡献。

2. 尊师重道。《学记》明确提出了“师严而后道尊”的思想。一方面，《学记》高度评价了教师的作用，认为“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又说：“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就是君主对自己的教师也不能按一般臣下对待，即“当其为师，则弗臣也。”以示尊师之礼。另一方面，《学记》又对教师提出严格的要求，既要有渊博的知识和崇高的道德修养，又要熟练掌握教育、教学理论和技能技巧，反复强调“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等教师应具备的条件。

3. 藏息相辅。《学记》认为正课学习与课外练习必须兼顾，相互补充，《学记》指出：“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课外练习是正课学习的继续和补充，可以深化课内学习的内容，又可使学习有张有弛，让学生既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又感受到教师、同学的可亲可爱，最后达到虽离开师友而信仰不移的目的。这一经验也是十分可贵的。

4. 豫时孙摩。这是《学记》总结了长期教育、教学中的经验教训后概括出的规律，包含四条原则。“豫”是预防，“禁于未发之谓豫”，要在不良倾向尚未发作时就采取预防措施，否则，待到不良行为发生后再去纠正，则“扞格而不胜”，即遭遇抵触而难有成效；“时”是及时，“当其可之谓时”，要把握教学的最佳时机，适时进行。否则，“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孙”是指循序，“不陵节

而施之谓孙”，教学要遵循一定的顺序进行，否则，“杂施而不孙”，学生将苦不堪言；“摩”指观摩，“相观而善之谓摩”，学习中要相互观摩，取长补短，否则，“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但观摩一定要是正面示范，否则，效果恰得其反。从正反两面的对照分析，大大加强了论证的力度。

5. 启发诱导。《学记》云：“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就是说，教学的关键是要使学生明了。要注重引导，但又不牵着学生鼻子走；要督促勉励，又不强制压抑；要打开学生思路，但又不提供现成答案，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学生学习和思考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锻炼和发展。

6. 长善救失。《学记》认为：“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指出了学生学习中存在的四种缺点，即或贪多务得，或片面狭窄；或把学习看得很容易而浮皮潦草，或把学习看得很难而止步不前。这些缺点在每个人身上表现不同，产生的原因也各异，教师要学会具体分析，采取针对性措施。清代学者王夫之认为，如果教法得当，这些缺点可以转化为优点，多则知识渊博，寡则精深专一，易则充满信心，止则认真对待。这就要求教师善于因势利导，利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将缺点转化为优点。

总之，《学记》的教育思想相当丰富，论述相当深刻，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学记》为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专门化的形成，是中国“教育学的雏型”

四、《乐记》

《乐记》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先秦儒家专门论述乐教的论著。《乐记》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汉族音乐理论著作，它总结了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乐教的内容

《乐记》强调对音乐内容的控制和挑选，才能进行有成效的乐教。它认为，不是所有的音乐都能对人民起到好的教育作用的。应当选用先王所制的“礼乐”、“德音”来教化人民。德音包含了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乐化》）

乐教任务

《乐记》认为乐教应包含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道德教育。《乐记》强调用“德音”来施教，使人民的言行举止都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乐记》说：“唯乐不可以为伪”。只有音乐是不能作

伪的。音乐是品德的花朵，是品德的声音，是人的德性的真实的表现，是人的真情的流露。音乐既有披心露腹的抒情作用，又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音乐能感化人心，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并进而形成道德行为习惯。

第二，音乐知识教育。《乐记》中的乐，是诗、歌、舞三种文化的总汇，它包含着许多音乐、舞蹈、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知识技艺。如“钟鼓管磬，羽管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乐论》）“金石丝竹，乐之器也。”（《乐象》）进行乐教的过程，也是对人民传授音乐文化知识的过程。

第三，情感教育。《乐记》认为，乐与人的感情密切相关。乐既是人们感情的表现，又能对人的感情发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进行乐教的过程，也是对人民进行情感教育的过程。

《乐记》认为，乐教一定要与礼教相结合，因为礼乐是相辅相成的，互为补充的，所以应用平和的、发自内心的、近乎仁的乐来关怀引导人民百姓，同时又以区别差异的、发乎于外的、近乎义的礼来要求教导人民百姓才能收到好的教育效果。

第三章 儒学独尊与读书做官教育模式的形成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施了“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将儒家经典立为官方学说，建立察举制度以选官，由此促成了读书做官教育的模式的形成。

第一节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统治者总结了秦朝速亡的教训，摒弃严刑酷法，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正式废除秦代“挟书律”，开放了民间学术活动，奉行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无为而治”十分适合汉初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的需要，但是也容易导致放任自流和政府权威的削弱。到汉武帝时期，国力已基本恢复，统治者已有实力来整顿国政。同时，社会也面临着新的危机，“无为而治”已经不能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必须采取新的政策。于是，在文教方面，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出的三大建议，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为确保儒术“独尊”，采取了以下几项主要措施：

一、设五经博士

战国时就有博士，秦汉承袭此制，也设立博士官。博士是掌管典籍簿册的咨政议政官员，诸子、术数、方技等都立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此后，博士的职位就只有被官方认可的儒家五经大师才能担任，其

他学派虽然没有像秦代那样被明令取缔，但已不能取得官方学术的地位了。这一措施是“独尊儒术”的集中体现。

二、建立博士弟子制

博士官因学识渊博，也常常以私人名义授徒讲学。元朔五年（前 124 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公孙弘的建议，由朝廷为五经博士选置弟子，有固定的名额和选拔标准，并享有官方给予的待遇。这就是博士弟子制，这一制度的实行，标志着汉代太学的建立。自此，学习儒经者日益增多，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三、以儒术取士

汉代自高祖始，就重视选贤任能。武帝时逐步确立了以察举为主的取士制度。在取士的标准上，则突出强调精通儒术和具有儒家伦理道德修养。察举最盛的孝廉科，就是选取具备儒家的“孝”、“廉”美德的人士，而明经科则是专取通晓一门儒经的学者。太学生通过考课，通一经者即补为官。以儒术取士，不仅为“独尊儒术”的推行和落实提供了保证，而且对士子进德修业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

四、视学制度

君主视学自古有之。汉代帝王对其最高学府太学非常重视，有时亲临太学视察或指令要员视察太学。东汉时皇帝视学成为一种制度。视学时要举行各种隆重的仪式，要召集博士讲论五经，有时还要考察学生的学业，还要与师生欢聚。为了弘扬儒学，每次视学皇帝还要聚众宣讲。以上诸项措施都为“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起了保证和促进作用。

汉武帝所采取的文教政策，在本质上与秦始皇是一致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巩固专制统治，但是手段和措施不同。秦始皇以“禁”为主，以暴力做保障，结果是将士人推向对立，丧失了统治基础。汉武帝则以“尊”为主，用功名利禄来诱导士人研习儒家经典，从而将思想统一于适应统治阶级利益的儒家学说，其手段显然高出一筹。

五、独尊儒术的作用和影响

“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一文教政策此后一直维系了两千多年，直到古代史的终结。其对教育的主要作用和影响，一是确立了教育为治国之本的地位。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德治和礼教为本，所以，尊儒必定推崇教育，汉代的官方学校体制就是伴随独尊儒术而建立的。重教兴学成为汉以后历代的一项基本国策。二是儒家

经学成为教育的主体内容。精通儒经的就可以通过选士而作官，取得荣华富贵，从而大大激励起士人的学习积极性，是古代教育昌盛的主要动力。汉代流传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王充曾感叹说：“儒者学，学，儒也。”儒与学已合为一体，从而使儒学绝对控制了教育事业。

第二节 汉代学校

汉武帝实行设太学养士，这是落实独尊儒术的教育政策的重要步骤。汉武帝元朔五年（前 124 年），朝廷为博士置弟子 50 人，这是汉代太学建立的标志。汉代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不须有固定的校舍。后来，太学生不断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我国最早大规模地修建大学校舍是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 4 年），当时为太学生修建了能容万人的校舍。东汉迁都洛阳，光武建武五年（公元 29 年）于洛阳南门外重建太学，校内建有宽敞的讲堂，还建了博士舍。后因政治动乱，太学一度衰落。顺帝时采纳左雄等人的建议，修整太学，建造 240 套房，1850 间室，校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汉代太学具有以下特点：

教师与学生：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秋），即是太学的教师。博士弟子，即是太学的学生。

一、太学教育的基本特点

（一）为国家培养“经明行修”的官吏。“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

（二）御定统一的教材。儒家经典“五经”

（三）建立的定期的考试制度。太学**首创**一岁一试的制度。“设科射策”

二、太学的意义

（一）汉代太学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备规制，详实史料学校，自创立到清末，成为历代高等学府常用的名称，其影响之深可以得知。

（二）从真正的意义上说，利用学校教育来强化官方的意识形态，是始于汉代的太学。（五经博士制的确立，经学考试的强化，使统治者摸索到了强化统治思想的手段，官学教育与儒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由于太学成为知识精英的汇集之地，集结了有识之士，为历史上中国学生运动掀开了第一页。

（四）汉代太学教学中存在排除异己学说，并且空谈义理以此取代了对现实

问题的分析和探究，严重束缚着教育思想和学术研究的发展。

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学生是由州、郡、三公推荐的。这所学校不同于其它以儒学为主的官学，它讲求辞赋、小说、绘画、书法等，因校址位于洛阳鸿都门而得此名。鸿都门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在教育史上具有开专科学校先河的意义。

郡国学：汉代地方官学始创于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欲移风易俗，推行教化，先从郡吏中选派聪慧者十余人到长安，就学于博士，这可谓最早的委托培养措施。数年后，这些人学成归来。于是文翁在成都立学，招收属县子弟入学，学成者都给予重用，或推荐到朝廷作官。蜀郡从此学风大盛。到汉武帝时，推广文翁兴学的经验，曾“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至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颁布地方官学学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普遍设学：设在郡国的称为“学”，设在县的称为“校”，设在乡的称为“庠”，设在村落（“聚”）的称为“序”。学、校置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师一人。但此项制度并未切实贯彻。汉代地方学校的兴办取决于地方长官的意愿，因此地方办学并不普遍，已办起来的学校也少有能维持长久的，或者是进村虚名而已。

第三节 建立察举制度

察举制始于汉文帝，在汉武帝时期得以确立，是先经考察举荐、再经考试、据考试成绩优劣选任人管的制度，是对太学养士选材的补充。其实是保障了读书做官、以儒术取士的落实，称为科举制度的先导。

察举的科目可分为两大类：一为经常性举行的科目，称作常科，一般是每年由州郡长官按规定的名额、标准向朝廷推荐人才；另一类为特科，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选士标准和名目的科目。

察举常科中最主要的是孝廉科。各郡每年按人口比例荐举孝廉，平均20万人口荐举1名，不足20万人口的郡隔年或隔两年荐举1名。儒家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基。可见该科主要选拔德行优良之士，借此在社会上造成“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风尚。但德行的考察难度较大，难免名不属实。到东汉，对各地荐举上来的孝廉，朝廷要进行复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变成了笔试儒家经学或公文写作，以德行为主的选拔标准也就变味了。

察举常科中还有秀才、明经等科目。秀才（东汉时避刘秀之讳改为茂才）科主要选拔奇才异能或有非常之功的士人，明经科察举通晓儒经的人才。另外还有选拔12至17岁之间的“博通经典”者的童子科，可见当时已经重视对有特殊才能儿童的培养和任用。

特科因是皇帝临时决定，科目开设是随心所欲的，名目众多。其中最主要的科目、也是最制度化的科目是贤良方正。一般在遇到“灾异”或国家有重大问题需要探讨时，下诏让各地荐举贤良方正，由皇帝亲自策问，让他们对这些问题进

行分析，发表对策。对策中皇帝的意，马上就可以作官或升官。所以贤良方正在察举中地位最高。

察举的流弊

察举各科设置之初，颇能体现选贤任能的原则，也的确选拔出不少济世之材。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讲习儒经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当时，民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但是察举的主要特点是以主管官员（地方长官和中央各部门长官）的推荐为前提。而要引起主要官员的注意，“声望”是很重要的，于是，士人便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或者攀附权贵，贿赂请托。因而，士风日下，察举不实。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尚书令左雄从察举最滥的孝廉科着手进行改革，规定孝廉所举之人，必须在40岁以上，对岁举的孝廉由朝廷进行考试。儒生考以儒家经典，文吏试以奏章律令。然后在端门进行复试。自此，察举制由推荐发展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为选士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探索了新路。

第四节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是西汉最著名的儒家学者，有“汉代孔子”之称。董仲舒学识渊博，遍通五经，尤精于“春秋公羊学”。汉景帝时任博士，此时他在学界已有很高声望，许多读书人都拜他为师。汉武帝即位不久，让各地荐举贤良之士，董仲舒得到荐举。汉武帝就治国大道进行策问，董仲舒连对三策，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和学术造诣，颇受汉武帝欣赏。但是，董仲舒后来在仕途上并不顺利，主要从事讲学活动。晚年辞官居家，不问家产，一心著书立说。董仲舒的著作大部分都散失了，流传下来的只有《春秋繁露》一书。

一、《对贤良策》与三大文教政策

董仲舒在应对汉武帝的贤良策问时，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在《对贤良策》中提出三大文教政策建议：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

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

（二）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中央的大学，大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他还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在办好太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老百姓总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没有堤防，就难免造成灾患，教化就能起到堤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就是说，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对于稳定统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

（三）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

二、论人性与教育作用

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性是“天”赋予人的一种素质。天有阴阳，人性也相应地包含性与情两种成分，即：性属阳，是仁的、善的；情属阴，是贪的、恶的。而善的成分并非就是善德，它必须通过教育，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人的善德，即所谓“性非教化不成”。可见，董仲舒认为人性中兼有善恶的因素，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人成为善人。

同时，董仲舒认为，教育的任务应由“承天意”的帝王来承担。可见，他把教育看成是王者的权力，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为此，他还提出“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与“斗筲之性”。所谓“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一般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斗筲之性”，是无“善质”的，生来就“恶”的，教化无用，只能采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置他们。而“中民之性”，也就是万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必须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董仲舒关于人性以及教育作用的思想，立足于以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对象，主要是为其“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又留有推崇圣贤和镇压所谓恶人的余地。

评价：董仲舒关于人性以及教育的思想，立足于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对象，主要是为其“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等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又留有推

崇圣贤，镇压恶人的余地。

三、论道德教育

在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是其核心，因为它是董仲舒德治政治思想在教育上的自然延伸，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必由之路。

（一）道德教育的内容

“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提倡的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是道德准则，是相对抽象化、理想化的；“三纲”则是道德规范，是高度具体的、必须遵从的。董仲舒认为“王道之三纲，可达于天”，把“三纲”及其相应的忠（臣）、孝（子）、节（妇）等封建道德，说成是上天赋予的，是违背不了的。董仲舒的这一理论被后人称为“名教”，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君权、族权、夫权，再加上封建迷信的神权，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二）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1. “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严于责己和宽以待人。

2. “强勉行道”：董仲舒认为，一个人治学和进德，全靠自己主观努力。对治学来说，只有勤奋努力，锐意进取，才能达到“博”与“明”的境地。对进德来说，只有严于律己，强勉行道，才能“积小致巨”，积善成德，成就大业。因此，他主张“强勉学问”、“强勉行道”，所谓“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董仲舒主张“强勉学问”、“强勉行道”，是要鼓励人们积极主动并持之以恒地按照封建伦理道德的要求去修身养性。但是，他强调进德修业要靠主观努力、勤奋刻苦、脚踏实地，而且要持之以恒，显然符合学习规律。

3. “必仁且智”，认为德育、智育应结合起来。

4. “重义轻利”。如何对待“义”和“利”的关系，这是儒家重要的论题。孔子就讲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确定了重义轻利的基调。董仲舒继承了这一观点，他明确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将义利之辩扩充到动机和效果的关系上，作为道德修养的原则。凡事讲究动机的合理性，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只讲动机的合理性，不计较效果的主张则是片面的。而且正谊明道，就是要引导民众只遵照封建伦理道德，而不得追求自身利益和需求，对统治阶级，也要求他们注重封建王朝的大局，而不要过于追求个人和眼前的功利。董仲舒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朱熹将其作为“处事之要”，写进白鹿洞书院，更扩大了其影响。

第五节 王充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思想特征

王充（约 27-97 年）字仲任，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身“孤门细族”。八岁入书馆，学习《论语》、《尚书》，学业优良。二十岁左右入京师太学。王充不崇拜权威，怀疑神学化的儒学，广泛阅读百家之书，采取批判态度，独立钻研。他曾出任郡、县小吏。但因为为人耿直，不愿随俗附和，索性辞官还家，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研究和写作中度过。王充的著作现存的仅有《论衡》一书，是以“疾虚妄”的态度来写作的，宗旨是“立真伪之平”，即讲求真实客观，反对虚假浮夸。

二、论教育作用

王充与董仲舒类似，也把人性分为三种：有生来就善的，是中人以上的人；有生来就恶的人，是中人以下的人；有无善无恶，或善恶混杂的人，是中人。人性的善恶，是由自然的“气”构成的。中人之性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生来就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使恶为善。总之，人的善恶在于教育。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要作用。

三、教育的培养目标

王充理想的培养目标是“鸿儒”。他把人才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鸿儒”（能够独立思考，著书立说）；第二是“文人”（独立思考能力较差，文采尚佳）；第三是“通人”（文笔谈不上，但知识渊博）；第四是“儒生”（知识也不够渊博，只懂一本经，并此生靠这一门经吃饭）。王充特别推崇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其次是文才，再其次才是知识的渊博程度，最看不起专经传授的教师。评价：这固然是出于他对当时经学教育的强烈不满，但轻视一般传授知识的教师也是片面的。所以鸿儒就是王充培养的目标。

四、教育内容

王充认为，不能仅学儒学，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思想僵化，思路狭窄；他认为凡是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化知识都应当学习，应当“博通百家”。

五、论学习

知识来源：“学之乃知，不问不知”，重视知识的力量；

教学过程：“见闻为”与“开心意”，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结合。

教学效果：“效验”，重视以实际效果来检验知识真伪的功夫。

（一）学知与闻见 那时神学盛行，迷信圣人，认为圣人料事能力先天具有，“不学自知，不问自晓”。而王充认为所谓圣人的“独见之明，独听之聪”都是建立在一定经验基础上。圣人的料事能力首先是他积累比常人更为丰富的经验知识与能力。“闻见”是圣人积累经验知识的一个基本手段，他们一方面留心周围的事物，注意积累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广闻博览，通过书本或其它间接途径吸收他人的生活经验，接受间接知识。

（二）思考与求是 经验和知识是形成个体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第一性因素，但要使经验知识转化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少不了理性的思考。许多书本中的知识是经过夸张歪曲、虚伪失实的。分辨知识真伪一个有效手段是坚持“效验”、“存证”原则，这是王在打破圣人崇拜心理后避免个人主观偏见的良方，也是他重视实证知识的认识论思想在学习论上的反映。

（三）问难与距师 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必须打破唯师适从、唯书适从的心理。要打破崇拜古人的、崇拜权威心理。敢于否定批判明显错误。“问难”通过激烈辩论充分调动师生双方思维的积极性，不仅利于深刻领会学习内容，也利于推陈出新，对原有知识产生新的见解。

王充的教育思想以鲜明批判精神为特征，敢于打破传统，批判权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第四章 封建国家教育体制的完善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官学与选士制度的变革

一、学校设置上的新举措

魏晋南北朝近 400 年，是我国历史上处于分裂和长期战乱的时期。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官学时兴时废，教育总的来说是不景气的。由于当时社会上佛、道、玄学盛行，文学、史学、自然科学发达，儒学不振，退居次要地位。但由于经学地位的削弱，官学教育中也出现一些新事物，为隋唐建立完备的官学制度做了准备。

（一）立国子学与太学并列

西晋时期，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一个贵族阶层——门阀世族。为了保证他们受教育的特权，晋武帝咸宁二年（276 年）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四年（278 年）设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惠帝时规定五品官以上子弟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子弟入太学。此后，各朝中央官学都是国子学与太学

并立，以体现“贵族士庶皆需教”的原则。西晋国子学是我国古代于太学之外专为世族子弟设学之始，这是门阀世族享有特权在教育上的反映。

（二）郡国学校制度的建立

郡国学校制度的建立是在北魏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政局相对比较稳定，北魏统治者又重视经学，不仅设立了国子学和太学，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年）还普遍设置了州郡学，并建立了郡国学校教育制度，据《北史·高允传》记载，当时规定大郡立博士2人，助教4人，学生100人；次郡立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80人；中郡立博士1人，助教2人，学生60人；下郡立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40人。按郡的大小规定了博士、助教和学生的人数编制，实际上确定了学校的规格。所以史籍多认为中国郡国学校制度的建立自北魏开始，如唐代杜佑《通典》就说：“郡县学始于此矣”。

（三）专门学校的设置

三国魏明帝置律博士，教授刑律，招收律学弟子。这是我国古代法律分科设学之始。后秦姚兴、梁朝武帝也设置“律学”。晋武帝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年）开设医学，这是我国医学专科教育之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专科学校。北魏也曾设医学博士以教弟子。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下令在京师开设“四学”。据《文献通考·学校考二》载：文帝“雅好艺文，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散骑常侍雷次宗立儒学，为四馆。”四馆即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四学”，是我国最早的分专业的综合学校。宋明帝下令开设总明观（设儒、道、文、史、阴阳五科），也是专科教育的机构。

二、“九品中正”选士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士人流徙迁移，致使汉“乡举里选”为主的察举制度难以实行。此时地方豪强势力强大，统治者不得不依靠他们的支持才能生存，于是形成了门阀世族集团。这个集团的内部要分配政治权力，这就必须对选士制度进行改革。“九品中正”选士制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九品中正”选士制度，就是由“中正”官负责考察人才，按九品定级，朝廷再按品授官。该制度开始实施于三国魏文帝曹丕执政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士制度。

第二节 隋唐时期教育体制的完备

一、隋唐的文教政策

隋唐的文教政策可以归纳为“重振儒术，兼容佛道”。

公元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中国再次统一。隋朝如秦，也是一个短命王朝，但在治国方策上颇有建树，包括在教育方面建立国子监和实行科举制，为唐代所继承和发展。唐朝如汉，建立起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隋唐文教政策的基本精神是重振儒术，兼用佛、道。或者说是三教并用，世俗社会政治领域则以儒为主。

（一）重振儒术

自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社会动乱，儒学地位下降，佛教、道教日益兴盛。到隋文帝即位后，认识到三教皆可利用，要论教化百姓，养育人才，则非崇儒兴学不可。于是下令广泛征集儒家经典，并以高官厚禄礼聘天下儒士集于京都，令自京都至州县均设学校，还亲自至国子监参加典礼。隋炀帝时又将经典文献加以整理、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目，分统于经、史、子、集四类，成为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正统方法。

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之初，就“颇好儒臣”。为了提高儒学的地位，在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公元624年颁《兴学敕》，要求“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崇儒，登基前就在王府内设立文学馆，召集房玄龄、魏征等十八名儒为学士。贞观元年（628年）下令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贞观四年诏令各州县学皆立孔子庙。贞观十四年（640年），诏令孔颖达会同诸儒撰写《五经正义》，颁行天下。这是历史上第一部由官方颁布的经学权威著述，成为全国官学的统一教材，每年的明经科考试也以此为标准。

（二）兼融佛道

隋唐崇尚儒术，但在重儒的同时，还提倡佛教和道教。佛教和道教都是宗教，都主张与世无争，积德行善，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特别是佛教和道教在生死观上都有一套理论，如佛教宣传“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以求得死后超生。道教研究养生之道，修炼长生不老之术。这些对封建帝王直至平民百姓都有极大的诱惑力。隋文帝和炀帝都信奉佛教，唐代统治者鼓吹三教并用。唐高祖在一份诏书中就宣称“三教虽异，善归一揆”。他崇奉道家开创者老子为始祖，以维护李姓统治的需要。唐太宗认为三教殊途同归，支持玄奘译佛经。武则天也认为“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为一宗”。整个唐代，儒、佛、道三教虽间有此消彼长的矛盾，但总的来说，在政治上还是儒术居于主导地位，而佛教和道教

只是作为信仰和精神寄托。

二、中央政府教育管理机构的的确立

为了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隋朝设立了国子寺，后又改称国子监，设祭酒一人总管学校，首次设立了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和首长，教育成为独立的部门。唐代国子监统辖下属的各学校，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加强。

三、学校教育体制的完善

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典型。

隋朝学校教育制度：中央设置了国子寺，负责管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和算学五学。国子寺及国子祭酒的设置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置专门管理教育的政府机构和设置专门教育行政长官的开始，标志着我国古代封建教育已经发展到能独立于其他部门的时代。书学和算学的创建也标志着我国古代专科学校的多样化。

唐代学校教育制度：

（一）中央官学体系完备：中央设六学，属于直系，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学属于国子监，长官称国子祭酒。六学前三学属于大学性质，后三学属于专科性质。“二馆”即崇文馆与弘文馆，医学属于旁系。弘文馆由门下省直辖，崇文馆由东宫直辖。医学属于专科性质，直辖于太医署。唐时，医学十分发达。玄学隶属于祠部，是大学性质，集贤殿院隶属中书省，实际上是中央图书馆。

（二）学校行政管理与制度：教师分为博士、助教和直讲三级；学生入学要送礼，且仪式隆重；入学年龄为14-19岁，年限9年；课程设置，制定教材为《五经正义》，后来成九经，《礼记》成三礼，《春秋》成三传。学校设淘汰与留级制度，制裁与解退制度；还有休假制度（包括常假制度与制假制度），考试制度。

（三）专门学校：律学、书学、医学、兽医学、天文学

从教育管理体制而言，中央加强了对教育的领导，成立专门负责管理教育事业的政府机构——国子监，国子监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大学，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并对教育管理的模式做了探讨，模式一是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级管理，中央官学由国子祭酒负责，地方官学由地方长史领导。模式二是统一管理和对口管理并举，以统一管理为主，中央有国子监，统一管理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又将一些专科性学校如医学、天文学科划归到各个对口部分中去，由专职行政领导。

私学发展：

各府有府学，各州有州学，各县有县学，县内又分市学和镇学，所有府州县

市各学校同属直系，由长史掌管，各府市另有医学谓之旁系。唐时，私学很发达，当时名师大儒，也聚徒讲学，传授经业，如韩愈、柳宗元等。此外，农村还有私立小学，蒙学课本如《急救篇》、《千字文》等很流行。官学发展并未妨碍私学发展，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影响，共同构成唐代的封建教育体系。

学校教育发展的特点

唐代学校教育制度的特点：A 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封建学制体系；B 学校与科举的关系极为密切；C 扩大了国际国内文化教育的交流。

第三节 科举制度建立

一、科举制度的萌芽与确立

科举制的创立，是中央集权的需要，是选士制发展的结果。隋朝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首先着手的就是官制和与官制密切相关的选士制度的改革。因为：第一，要加强中央集权，必须把选用人才的大权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第二，要巩固统治，必须最大限度地网罗和笼络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参政的机会；第三，全国统一，封建官僚机器日益完备，必须选拔大量的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来充任各级吏员。这样，被地方官员操纵的察举制和被士族所操纵的九品中正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隋文帝正式废“九品中正制”。至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置进士科，一般认为，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的创立。到唐代，科举逐渐成为定制，宋、元、明、清，历代相袭，在中国历史上推行 1300 年之久。

二、科举考试的程序、科目与方法

（一）科举考试的程序

唐代参加科举的考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二是乡贡。

生徒：由中央地方官学，经过规定的学业考试，选送到尚书审应试的称为生徒。

乡贡：不由馆学学成的人，自己在周县报考的，经周县考试合格选送的。

报考时间是在每年仲冬，考生会集京师，到礼部、户部递交履历和推荐书，办妥应试手续。第二年二月初春，考生赴尚书省礼部贡院应试。明经、进士考试分三场进行，每场一日。考试合格后，分等级给予及第、出身的资格。

（二）科举考试的科目

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和制举两类。常科是固定时间举行的固定科目选士，制举

则为皇帝临时根据需要下诏开科选士。通常所说的科举，指的是常科。

参加科举的考生有“生徒”和“乡贡”两类。“生徒”即各类官学的学生，“乡贡”即“生徒”以外的在地方报考的读书人。获得准考名额的比例，“生徒”要大大高于“乡贡”，这是官学吸引学生的主要动因。

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因科目不同而有所区别。唐代科举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学、童子等科。实际上，经常举行的是前六科。

秀才科注重博学才高。唐以此科最高，考选较严，宁缺毋滥，每年所取不过一、二人，很难考取。太宗贞观以后，此科便名存实亡了。明法、明书、明算科选的人数量不多。因而学子们热衷的只有明经、进士两科。

所谓明经，即通晓儒家经典。明经科又有通二经、三经、五经之别。唐代把儒经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三类。《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须通一大经、一小经或通二中经。通三经者，须通大、中、小各一经。通五经者，大经须全通，其他各经任选。《论语》、《孝经》为共同必试。考试的过程是先帖经，每经10帖，每帖3字，通6以上为及格。然后口试，问经义10条，通10为上上，通8为上中，通7为上下，通6为中上，皆为及格。然后，答时务策3道，通2为及格。三试皆及格为及第。总之，明经科考试比较容易，只要熟读经书就行，对于经义未必真懂，及第也比较容易，故有“三十老明经”的说法。明经科主要是为官员贵戚子弟提供科举出身的机会。

进士科最初主要是向平民出身的才士开放的，及第者即跨进了统治阶级的行列，常有“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的美称。进士科曾一度只试策、帖经。试时务策5道，帖1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4，帖过4以上为乙第。永隆二年（681年）加试杂文两篇，即一诗一赋。此后，进士科考试便包括帖经、杂文、时务策三场。唐代进士科大约每百人中只能有一两人及第，而明经则每十人就能有一两人及第。因此，进士科的竞争相当激烈，考取也很难，故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三）科举考试的方法

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还有应用文体的写作。其考试方法，主要有帖经、墨义、策问、诗赋四种。

帖经相当于填空题。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其左右两边盖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帖盖3字，令应试者填出来。这种考试方法很简单，只要熟读经书、注疏即可应付。帖经是一种简单考查对儒家经典熟悉程度方法。

墨义是关于经文内容的小问答题，只要按原文对答即可，所以也是考查熟悉儒经的功夫。所以试题出得很多，少则数十道，多则数百道。墨义有时也采用口

试方式，叫口义。

策问是从西汉沿袭而来的，是有关时事政治的系列问答题。答卷叫做“对策”，归总回答策问，形成一篇文章。对策要求考生通晓经史，熟悉时政，能提出合理和有效的见解，是考查政治才能较好的方法。但好的策问题目不易大量找到，亦容易犯忌，久之则造成题目落入陈套。考生为应付策试，则编辑旧策背诵，遇到类似试题，便依样套用，造成学生“不学史传，唯读旧策”的学风。另外，对策的成绩等次评定缺乏客观标准，受阅卷官本人思想好恶的主观影响较大。

诗赋，即命题创作诗赋。主要考查考生的文化修养和写作水平。与帖经墨义相比，作诗赋需要文采；与对策相比，诗赋有严格的格律声韵要求，评定成绩也可以较为客观。但是，与三者相比，诗赋又是与治国实际最脱节的，所以被务实派斥为“雕虫小技”。

三、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由于选才与育才标准和要求一致，科举制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第一，因为通过科举可以取得名位，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为获得名位努力读书。隋唐以后学校毕业的人必须经过科举选拔才能获得吏部考试的资格，合格后才能授官，这就是说科举制的产生在客观上推动学校封建教育的发展。第二，科举主要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这对结束魏晋以来学校教育所流行的清淡学风和玄虚思想，对于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的统一和标准一致，对于良好风气的形成有积极意义。第三，科举考试科目中有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和史科、开元礼、道举、童子科，对社会上出现的重文轻武、重经轻算、重成人轻儿童的陈规，或多或少进行了冲击，有积极意义。

但是科举考什么，学校教育也跟着注重什么，是学校教育完全屈从于科举要求，在学校完全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情况下，科举本身有种种缺点和弊端。第一，教学内容局限于儒家几部经典著作，方法又死记硬背，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学校的教学工作充满了教条圣义、形式主义的恶习，这既不利于选拔和培养有实际能力的人才，又养成空疏的学风。第二，科举将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成为他们取得高官厚禄、权势的最好门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这种人生哲学支配了学校教育，严重影响着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第三，科举最后的取舍权为主考官、礼部、吏部、宰相、皇帝决定，录取标准有多以权势门第为转移。一般知识分子无靠山、门路窄很难进入。在这种状况下，个人关系全面启动，严重毒害知识分子精神面貌，败坏学校和社会风气。

四、科举制的影响

科举制是选士制度发展到高级程度的表现，它纠正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机会不均、主观随意性大、易营私舞弊以及选士大权旁落等弊病。科举面向全体士人公开招考，给每个人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科举通过严格的考试，以统一的标准选拔人才。尽管考试的内容、方法等也有一些弊端，但是它毕竟有力地保证了选拔的质量。科举制的实行，对中国封建政治、文化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科举制的创立和实施，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国家统治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一，选士任官大权由朝廷掌握，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第二，科举制向中小地主乃至平民士人开放了入仕的门径，有效地笼络了广大知识分子，加强了统治基础；第三，使官员队伍可以有效地补充新生力量，为国家的运转增添了生机活力；第四，规范了广大士人学习和修养的内容，促进了思想的统一。

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实施，就像一根指挥棒一样，对教育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一方面，科举有力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科举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士人的学习积极性和社会兴学设教的热情。据《全唐文》记载，当时“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学术文化的地位大大提高，因为它意味着锦绣前程。所以连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也养成“敬惜字纸”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又使得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教学的直接目标就是为了通过科举。科举制束缚思想，败坏学风：科举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学校就教什么。科举怎样考，学生就怎样学，学校就怎样教，完全成为科举的应试教育。造成学生学习的动机狭隘，知识和能力片面，思想僵化，不利于人才的健康成长。国家往往只重选科取士，而忽略了学校教育，而且科举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所以科举从一开始，就不断遭到批评，但科举毕竟从根本上适应封建时代的社会政治的需要，所以一直延续下来。

第四节 中外教育交流开辟

早在汉代，就有周边地区（如匈奴）派遣子弟来中国留学。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教育的交流又有很大发展，中国的文字、《论语》、《五经》、《千字文》等被传到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对它们的文化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隋唐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加上政策比较开放，与亚洲各国的文化教育交流更加频繁，长安成了亚洲文化教育的中心，吸引大批留学生。当时，突厥、吐蕃、高昌、渤海国，以及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高丽等，都派遣留学生来长安。特别是日本，派了大量的官员和学生来华学习。贞观年间，各国留学生来华最盛，人数约在千人以上。凡到长安的留学生，一律入“六学”学习，享受与中国学生一样的待遇，有的还参加了科举，也有的任了

官职。唐允许留学生自由地与中国人交往和到各地旅游、访问，带回采购的物品。留学生居留多长时间自便，在中国学习期间，要求他们按唐人衣食住行方式生活，以便更好地学习和领会中国文化。

第五节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颜之推（531-约 595 年），字介，梁朝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人。他出生于世代经学的仕宦之家。他鉴于当时许多士大夫被诛的惨痛教训，结合自己立身、处世、治家的经验，写成《颜氏家训》一书，以训诫他的子孙。《颜氏家训》是一部比较系统的家庭教育著作，成为后来封建社会家庭教育的重要材料。其主要观点有：

一、论士大夫教育

（一）士大夫必须重视教育；

（二）教育的目标在培养治国人才；

（三）德与艺是教育的主要内容。重视“应世经务”的实学教育。颜之推主张上自明王圣帝，下至庶人凡子，均须勤奋学习，学习的目的在于“行道以利世”，因此要掌握“应世经务”的真实本领。因此，除必读儒家的《五经》之外，还应“涉百家之书”，而且要广泛接触社会生活，学习各种杂艺：琴、棋、书、画、数、医、射、卜等。还要熟悉农业生产知识。他特别强调要掌握一技之长，以为立身之本，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二、论家庭教育

（一）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

家庭教育本来就是人生最早受到的教育，而早期教育的理论又是开展家庭教育的价值基础，颜之推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引用孔子“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又引俗谚“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作为例证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家庭教育应该包括胎教，而出生后的教育也要及早进行。人在幼年时单纯专一，容易接受教育，而长大以后思想复杂了，就不容易调教了，所以一定要抓住早期教育的最佳时机。而早期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包括认真接受父母教育的习惯在内，能够“使为则为，使止则止”。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就省心了。

（二）要爱与教相结合

家庭教育是由父母对子女实施的，因此最关键的是要处理好“爱”与“教”的关系。颜之推主张父母对孩子从小就要严格要求，勤于教诲，不能溺爱和放任。

父母在子女面前要庄重严肃，但不能过于严厉，要严慈有度，所谓“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惧而生孝”。

（三）均爱原则

偏爱——不良人格

（四）重视语言教育和道德教育

语言是工具，是发展诸多能力的基础。德育以孝悌为中心，立志为君子。

第六节 韩愈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思想特点

韩愈，字退之，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韩愈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上，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猛烈抨击佛老，极力维护儒家的道统及其独尊地位，提倡复古运动，可以说是“振兴儒学的卫道者”。他的主张代表了世俗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客观上符合中小地主阶级以及农、工、商等小生产者的利益与要求，因而具有积极意义。

韩愈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他三十五岁任四门博士。其后，两次做国子博士。唐穆宗时被征为国子祭酒。他对地方教育也很重视，曾作《子产不毁乡校颂》，歌颂了郑子产的不毁乡校。在潮州为刺史时，他曾拿自己的薪俸出来兴办州学。他很热心授徒讲学，在教学中总是“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其醉义忘归”。韩愈的著作收集在《韩昌黎集》中。韩愈的《师说》，是我国关于教师论的名作。

二、“性三品说”及教育作用

（一）性三品：

第一、他提出性与情的问题，认为人有性有情，性是先天具有的，情是后天习染的，性和情二者之间完全相应。

第二，性和情皆分三品，性有五德，情有七情。上品之性为善性；中品之性可善可恶、尚未定型；下品之性为恶性。

第三、性可移，但性的品级不可移。上、中品之人可受教育，下品之人只能以刑罚制之，而三品之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

（二）教育的作用

从性三品说出发，韩愈认为上、中品之人可受教育，下品之人，气质太坏，只能以刑罚制之。因此，对于不同的人性，教育所起的作用是不尽一致的。对上

品之人，教育能使其先天具有的仁义善性得到发扬光大。对可善可恶的中品之

人，教育对这部分人的人性改造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于下品之人，他们天生是顺情而行的，教育对他们人性的变化起不了作用。

韩愈还提出，由于人天生包含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容，教育就应把这种道德发扬开了，儒家经典是最好的教育内容。

评价：韩愈一方面肯定了教育在促进人性变化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人性三品不可变，教育只能在品味内发挥作用，这种人性论不但为封建制度的等级性做了合理的论证，而且也为决大多数的人接受封建道德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关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思想

他继承儒家德治思想，必然重视教育事业。因为德治是人治的问题，人治需要大批人才，人才的培养主要靠教育。教育的任务就是为治国兴邦培育人才。为此，他要求整顿国学，扩大招生范围。整顿教师队伍，整顿教学，建立比较正常的教学秩序。不但要重视人才培养，也重视人才的选拔。他指出了科举的一些弊端及考试内容的不合理。他要求统治者爱惜人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以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来说明人才的难得。批评统治者愚昧无知，鼠目寸光以及对人才的摧残。这种爱才、选材、用材的思想与封建社会选人唯贵、任人唯亲相对立，有现实意义。

四、论尊师重道

韩愈重视师道的原因有三：一是师道即君道，尊师即忠君，这是深层因素；二是社会原因，安史之乱后，唐代国势日衰，学校教育业随之衰落，社会上出现了不重师道的现象；三是科举使文学的地位逐渐超过经学，儒学受到削弱。

关于教师的任务：为了恢复儒家的传统精神。把传道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把授业作为第二位的任务，还把解惑提到应有的位置，这样排列顺序也很明确。这里不仅包含了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起主导作用的思想，也包含了寓德育于智育之中、德育通过智育进行的思想，这是很深刻的。

关于教师的标准：首先是道，其次是业。凡是具备了一定的道和一定的业的，就可以做教师。教师要在这两方面加强学习和修养。

关于师生关系：谁先掌握了“业”谁就是教师，说明教师不是一个万能的人，师生关系不是永恒不变的，这就破除了对教师的盲目迷信，而且还反映了闻道在先，以“知”教“不知”这一教学过程的客观规律。提倡互为教师，包括向自己的学生和晚辈学习，这里既有能者为师的观点，也有教学相长的含义。

《师说》提倡尊师重道。这一思想既是维护儒家道统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表

现,又是针对中唐以来教育事业中出现的种种弊端而提出,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扭转当时的不良学风有积极作用。《师说》是我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文章,他既肯定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中的主导作用,又强调教师要尊重学生,向学生学习,教学相长;既要求学生虚心向教师学习,又鼓励学生敢于超过教师;既提倡乐为人师,又强调不耻下问,虚心拜人为师。总之,《师说》看到了师与道、道与业、师与生之间统一关系,含有朴素辩证法因素,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处理教师的职责、政治与业务、德育与智育、教书与育人、教师与学生关系等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第五章 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学校的改革与发展

第一节 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学校教育的改革

一、宋朝的文教政策

宋初的统治者强调“文治”,推行了“兴文教”的政策。

重视科举,重用士人

“三次兴学”,广设学校

尊孔崇儒,提倡佛道

二、宋朝科举制度的发展

(一) 科举制的地位提高,唐代科举还只是为寒门子弟打开取得作官资格的一条门缝而已,取士名额少,取中的还要通过吏部考核才能作官。到宋代,科举及第的进士不仅享有显耀,而且立即就可以作官,而且升官较快,尤其是取中高第者。取士名额增加,及第后待遇优厚;对屡试不中的士人,有“特奏名”、“赐出身”。

(二) 科举取士规模的扩展。宋初每届取士人数与唐代大体相同,不过二三十人。宋太宗即位后,开始大幅度增加录取名额,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殿试,进士及第109人,诸科及第207人,此后,每届大体维持在三四百名的录取规模上。取士规模终究是有限的,对那些多次应试不中者,朝廷又开辟了特奏名的科目,降低考试难度,予以照顾。如果还考不上,等达到足够的年头,一般是经历15届以上的应试后,朝廷赏给一个相当于科举某种出身的称号。

(三) 科举内容变革。废除帖经、墨义、诗赋等传统科目,改试经义。有鉴于唐代科举的帖经、墨义完全是考死记硬背儒经,而诗赋考试又与治国实际关系不大,到王安石变法时,废除帖经、墨义、诗赋等传统科目,改试经义,经义是

论述儒经某一内容的小论文，既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理解，又考察考生的文笔水平。为了加强评阅的客观性，王安石还编制了经义式，作为标准格式。不过诗赋毕竟是士大夫文人的基本素养的体现，后来采用诗赋考试还是经义考试几经反复，经义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四）考试办法不断革新完善。对与考官有亲属或其他亲近关系的考生实行别头试，即另行开场考试，考官与考题也另行安排。目的在于制约人情影响。对试卷实行弥封（糊名）、誊录制度。考生交卷后，先由弥封人员将考生的姓名密封起来，再由誊录人员将试卷内容原封不动地誊录出来，将誊录的试卷交给阅卷人评阅。这样，阅卷人就无从知道试卷是何人所作，判卷也就比较客观了。

三、宋朝的官学改革

（一）北宋的三次兴学

第一次兴学：范仲淹在宋仁宗庆历四年主持的，史称“庆历兴学”。

第一，令州县立学。选部属官或布衣宿学之士为教授，并立听讲日限，规定士须在学校习业 300 日，方许应举。这项措施旨在避免学校流于形式，沦为单纯为应试举人取解的场所，进而保障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第二，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去掉帖经和墨义，着重策论和经学。

第三，振兴太学。选用拥护新政的著名学者石介、孙复主持太学讲席，将胡瑗(993-1059 年)的苏湖教法引进太学。胡瑗字翼之，江苏泰州人，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北宋著名教育家。他早年在苏州、湖州两地州学讲学二十余年，主持苏湖州学期间，一反当时盛行的重视诗赋声律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明体达用，”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创行分斋教学制度。经义斋主要学习六经经义，属于“明体”之学；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属于“达用”之学，学生可以主治一科，兼学其他科。胡瑗的苏湖教法，创立分科教学和学科的必修、选修制度，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最早的。

第四、设立四门学，允许八品至庶人子弟入学，扩大了中小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深造的机会。

第二次兴学：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主持的，史称“熙宁兴学”。

第一，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将太学生员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生员依学业程度，通过考核，依次升舍。初入学为外舍生，原无限定名额，相当于预科生或旁听生，后定额为 700 人。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生定员 100 人。平时有品行（“行”）和学业（“艺”）的考察记录，每月由任课教师举行“私试”，每年由学校举行“公试”，外舍生考试和平时行艺合格者可依次升入内舍。内舍生定员 200 人，每两年由政府派员与学校会同举行上舍试，考试和平时行艺合格者可依次升入上舍。优等者荐入中书，上舍生可兼任学正、学录之职，

其中学行卓异者，可由太学主判、直讲荐于中书，直接作官，等于科举及第。其他人根据学业成绩，可分别得到免发解、免省试的待遇，等于减少了部分科举考试的程序。三舍法的实行强化了学校的职能，使在校的学业与前途直接挂钩，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日常教学的进行，并使得学校教育的课业与考试更加规范化。王安石的长远目标是通过三舍法使学校取士逐步取代科举取士。

第二，扩建和整顿地方官学。一是设置诸路学官，学官任免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全权负责管理当地教育，地方当局不得随意干预学校事务。朝廷还为地方学校拨充学田，从而在物质条件上为州县学校的维持提供了保障。熙宁四年(1071年)，诏令诸州“给学田十顷为学粮，原有学田不足者益之，多者听如故。”在诸州普设学田，解决了多年来州县学校经费不济的问题，为州县学校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恢复与创立武学、律学、医学等专门学校，以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才。

第四，编撰《三经新义》。为了统一经学，熙宁六年(1073年)设经义局，王安石亲自修撰《诗》、《书》、《周礼》三经义。由朝廷正式颁行，成为官方考试、讲经所依据的标准教材。

第三次兴学：蔡京在宋徽宗崇宁年间主持的，史称“崇宁兴学”。

第一，全国普遍设立地方学校。

第二，建立县、州、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县学亦置小学，在各地方学校也实行三舍法。县学生可升入州学，州学生可贡入太学。至此，形成了遍布全国州县的学校网络，无论在数量上、规模上，还是在分布的范围上，都远远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兴学。

第三，扩建太学。崇宁元年(1102年)在京城南郊营建太学之外学，赐名辟雍，仿《周官》外圆内方之制，屋 1872 楹；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外学专处外舍生。诸路贡士初至，也皆入外学，经考试合格补入上舍、内舍后，方可正式进入太学。上舍名额 200 人，内舍 600 人，外舍 3000 人。

第四，恢复设置书学、画学、算学等专业学校，采用太学三舍法考选取士。崇宁时期的画学是中国古代惟一举办过的专门美术学校。

第五，罢科举，改由学校取士。由于天下已普遍设学并实行三舍升级制度，崇宁三年(1104年)诏罢科举，士人全部由学校升贡，每岁考试上舍生如礼部试法。次年赐上舍生 35 人及第，以后又间行科举，与舍选并行。宣和三年(1121年)恢复科举旧制，但太学仍保留崇宁定制。

(二)“三舍法”

将太学生员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生员依学业程度，通过考核，依次升舍。初入学为外舍生，相当于预科生或旁听生。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

平时有品行（“**行**”）和学业（“**艺**”）的考察记录，每月由任课教师举行“私试”，每年由学校举行“公试”，外舍生考试和平时行艺合格者可依次升入内舍。内舍生，每两年由政府派员与学校会同举行上舍试，考试和平时行艺合格者可依次升入上舍。上舍生中学行卓异者，可由太学主判直接推荐做官，等于科举及第。其他人根据学业成绩，可分别得到免发解、免省试的待遇，等于减少了部分科举考试的程序。王安石的长远目标是逐渐让“三舍法”取代科举考试。

历史意义：三舍法是在太学内部建立起严格的升舍考试制度，对学生考检和选拔力求做到平时行艺与考试成绩相结合，学习优劣与对他们的任职、使用结合，这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太学教学质量，同时又把上舍考试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融养士与取士于太学，无疑提高了太学的地位。总之，三舍法是中国古代大学管理制度上的一项创新，他不仅对宋朝的学校教育产生了积极作用，而用对后来元、明、清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苏湖教学法”

“苏湖教学法”，是胡缓在主持湖州学时创立的一种新的教学制度。

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明体达用”，其内容是在学校内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创行“分斋教学”制度。

经义斋主要学习《六经》经义，以培养高级统治人才为目标；——明体

治事斋分为治兵、治民、水利、历算等科，旨在培养具有专长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达用

在“苏湖教学法”中，学生可以主治一科，兼学其他科，创立分科教学和学科的必修、选修制度。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最早的。

（四）积分法

累积计算学生全年学业成绩的方法，“积分法”作为一种学生学业考核方法，始于宋代，到元代趋于完善。

（五）“五等黜陟法”：考试成绩评定为五等，根据成绩对生员的身份进行黜陟。黜陟：指人才的进退，官吏的升降。

（六）“监生历事”：监生到监外“历练政事”或称实习历事，这是一项培养官吏的重要措施。此制是洪武年间为满足当时官吏不足的需要而创立的，规定凡是在监十余年者，派到六部诸司历练政事，诸司教习政事，并考察其勤惰。历练3个月，进行考核，勤谨者送吏部备案待选。

（七）社学：社学和义学也属于启蒙教育机构，均起源于宋，元，一般为地方社会所创办。社学属于社会乡里设置的基础学校，虽是官方通令办的，实际上还是群众自办的。

第二节 宋朝书院的发展

一、书院的产生及原因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以私人创办和组织为主，将图书的收藏、校对与教学、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

书院始于唐代，当时其性质相当于皇家图书馆。唐末五代战乱学者，隐居山林讲学，吸引了一些士子前来求学，书院开始具有讲学授徒的功能。但唐末五代的书院数量少，规模不大，故其影响有限。

宋代书院兴盛：由于唐末五代官学衰落，学校不修，学者求学而又没有适当的求学之所，因而选择了创建书院这种教学形式，来满足世人求学的需要。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作为广大士子提供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第三，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佛教出于僻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宗旨，多选择环境僻静优美的山林建立寺庙，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书院的讲会制度就是借鉴了佛教僧讲和俗讲的讲经方式，书院教学的讲义和语录等形式，也是来源于佛教禅林制度。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籍不再是珍藏品而是公众都可以拥有的，才有可能使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二、宋代的著名书院

（一）《白鹿洞书院揭示》与书院教育精神

《白鹿洞书院揭示》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第一个纲领性学规，不仅对当时的书院教育，而且对关学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它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教育目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治学顺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形成比较完善的书院教育理论体系，成为后世学规的范本和办学准则，使书院逐步走向制度化的发展轨道。书院以自学读书为主，讲学辅导为辅。注重自学、自由独立的精神。注重讨论辩论最为显著，师生质疑辩难的论辩成为家常便饭。大多是自发、平等的，体现出一种民主治学的学术精神。此外，自由讲学、自由论学、自由竞学的自由精神是书院精神的最好体现。

《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朱熹为了培养封建统治人才，而制定的大学教育方针和大学生守则。集儒家经典成语。总的来说，它要人们遵循封建伦理道德。学规既规定了教育宗旨，又明确了为学之序和修身、处事、接物之要；既体现了封建社会对教育的基本要求，又反映了办学的一般规律，对南宋及后世的书院学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为后续 700 年中国书院制度所承袭，成为历代书院的楷模，对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为外国教育界所重视，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制定的重要教育规章之一。

（二）东林书院与书院讲会

东林书院是明代影响最大的书院。原址在今无锡市，北宋杨时曾在此讲学，明万历年间顾宪成重修并讲学于此，是东林党人舆论阵地和培养人才的场所。以讲学干涉政治、针砭时弊为职志。不单纯是为了探讨学术本源，实际上是借机会讨论朝政得失，反对专制统治，宣传天下事天下共议，国家事全国人共治的民主思想。东林书院是教育、学术交流的场所，又是制造舆论的中心，不是政府意志的传声筒，也不是科举开始的预备机构，是当时初步民主或启蒙思想萌芽的温床。

书院或书院式精舍之间的学术辩会，事先约好时间、地点、宗旨、规约、论辩主题，由师生共同参加，并吸引社会贤达与会。源于南宋的“鹅湖之会”，讲会在明代书院复兴后大兴，清雍正后才明令废除。讲会制的确立，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活跃学术空气，而且有利于扩大和巩固书院的社会影响和地位，使僵滞的官学相形见绌。

东林书院，由东林学派领袖顾宪成等复创。其特点是，将学术与政治结合，另一特色就是定期举行学术会讲。讲会制度的历史意义：讲会制度在官学中是没有的，书院通过讲会把书院的讲学活动扩展为地区性的学术活动，许多学派的学者，不远千里到这里来宣扬自己的学说或者与其他学派交流主张，取长补短，这就促进了思想的流动和思想的发展。

讲会制度的历史意义：讲会制度在官学中是没有的，书院通过讲会把书院的讲学活动扩展为地区性的学术活动，许多学派的学者，不远千里到这里来宣扬自己的学说或者与其他学派交流主张，取长补短，这就促进了思想的流动和思想的发展。

（三）诂经精舍、学海堂与书院学术研究；

诂经精舍、学海堂是由清后期阮元在任浙江巡抚和两广总督时，先后办于杭州西湖孤山和广州越秀山，以追求汉代考据学说为宗旨，延续至 20 世纪初。书院重品学而轻功名，不习科举应试之学，而以经史、小学、天文、地理、算学为业；所聘教师均于考据训诂各有所长，学生则据其天资秉性所近因材而习；注重学生参与研究，成果有书院集刊出版，《十三经注疏校刊记》《皇清经解》等学术著作都出自师生之手，对整理、研究、保存文化遗产和学术发展做出了贡献。书院有私、官、民办官助等多种形式。最初由“山长”或“洞主”负责书院管理和教学工作，以讲学活动为主要内容。学术研究主要以讲会制度为主，重视学术交流，开展讨论争辩，学生以个人读书钻研为主。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是清朝后期阮元，先后办于杭州西湖和广州越秀山，其宗旨是追求汉代考据学说。书院重品学轻功名，不习科举应试之学，而以经史、小学、天文、地理、算学为业；学生则根据自己的天赋和喜好选择学习内容；注重学生参与研究，对整理、研究、保存文化遗产和学术发展做出了贡献。著名学者阮元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东学海堂，就是当时训诂考据学研究教学的重点场所。“专勉实学”是两所书院的教学宗旨，注重扎扎实实做学问，编撰出版了 1400 卷的巨著《皇清经解》。还出版了《诂经精舍文集》和《学海堂集》，体现了治学的巨大成果。

三、书院教育的特点

（一）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书院是一个教育机构，也是一个学术研究基地。书院进行教学，不以参加科举为目的，是以研究、传播学问和践行道德为宗旨。

（二）教学形式多样：自学、教师讲授、师生之间的疑难解答、学友之间的相互切磋、讲会。

（三）教学上实行门户开放。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教学人员也不限于书院自身，而是广泛邀请学界名流前来讲学。

（四）学习以个人钻研为主。书院的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讲究身心涵养。书院教学除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师必要的讲授外，主要是学生自学，所以书院都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

（五）师生关系融洽。书院盛行尊师爱生的传统，师生之间感情深厚。

（六）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管理体制日趋完备。宋代书院的最高首脑称为山长、洞主或洞长。山长既是主要的教学者，又是最高的管理者，并且往往都由著名的学者来担任。北宋的书院除了山长之外，其他教学管理辅助人员的设置很少。南宋书院，随着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书院内部设施的日益增多，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设置也相应增加。

书院产生的意义：书院的产生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书院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起到了弥补官学不足的作用，书院提倡自由讲学，注重讨论，学述风气浓厚，开辟了新的学风，成为推动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另外在办学管理领域也创造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

第三节 私塾与蒙学教材

一、私塾的发展与种类

私塾为民间私人所办，是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启蒙和基础教育的教育组织，主要承担识字、写字、阅读、作文和封建道德教育。其前身可追溯到汉代的书馆，唐宋时期十分普遍，中国古代社会中后期国家的基础教育主要由其承担。

种类：（1）宦官和殷实人家聘教师在家中教子弟的**家塾**；（2）教书先生自办的**学馆**；（3）私人或社会团体所办的具有公益性质的**义塾**；（4）由村民联合聘教师教子弟的**村学**。

二、蒙学教材的发展、种类和特点

最早见载的为西周时代的《史籀篇》，《苍颉篇》是秦代蒙学识字读本，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范本。汉代则有影响较大的有《急就篇》。

唐宋是启蒙教材繁荣发展时期，形成丰富的数量与种类：

（一）以识字为主的教材。这类教材以识字教学（包括读写训练）为主，其中也传授一些知识和道理。流行最广泛的就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三字经》，相传为宋代学者王应麟作。以三字为句，内容层次分明，全文 356 句，先说学习的意义，次叙学习的内容及次序，分别介绍名物常识、历史沿革、伦理道德，再列举前人勤学范例，等于介绍学习方法，最后归结于学习目的：报效君王，造福民众，同时又扬名声，显父母，垂范后世，很像一篇通俗的劝学诗。《三字经》虽不大讲究押韵，但三字一句的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记诵，因此成为元代以后最为通行的蒙学课本。《百家姓》，成文于北宋时，将“赵”姓放在第一位就是明证，到南宋时已相当流行。后来有不同的增补版本，其通行本 472 字，集有单姓 408，复姓 30，四字一句，隔句押韵，便于记诵。《千字文》已在第二章第二节介绍，千余年来一直流传。明代杨继盛说：“夫《千字文》，谁不童而习之？”此外，识字教材还有《古文观键》、《文字蒙求》、《正字千文》等。常用的工具书有《养蒙针度》、《同文字汇》等。

（二）伦理道德教材。流传较广的有南宋朱熹的《小学》，吕祖谦的《少仪

外传》等，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编的《小儿语》、《续小儿语》，吸取流行的格言、谚语编成，分四言、六言、杂言，如“一切言动，都要安祥；一差九错，只为慌张”，“自家过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均以白话写成整齐押韵的警句，易诵易懂。清李毓秀以学规、学则的形式编写的《弟子规》，也是主要进行道德教育的课本。

（三）综合知识类教材。介绍掌故、名物、各科知识的蒙学课本始创于唐李翰的《蒙求》。这书一直流行到清初，以后许多同类的书就称“蒙求”书。明清私塾普遍采用的蒙求书除《蒙求》外，还有《龙文鞭影》，是以介绍自然知识、历史典故为内容的蒙学课本。还有《史韵》，是一种介绍历史知识的课本。还有一种是介绍自然和社会常识的，以宋方逢辰编的《名物蒙求》为代表。清邹圣脉在明人程登吉《幼学须知》基础上增订的《幼学琼林》，是以解释成语典故的形式介绍自然、社会、历史、伦理等常识的知识性课本，在蒙学中流传亦很广。

（四）诗歌类教材。以《千家诗》、《神童诗》为代表，所选多名篇，题材广泛，文字浅显，很适合儿童朗读、背诵。《千家诗》有多种刻本，明清时流传的《千家诗》，是在提名宋刘克庄选编的《千家诗》基础上选录编订的。《千家诗》与教识字的“三、百、千”合称“三、百、千、千”，是社会上使用最为广泛的蒙学教材。《神童诗》初名《汪神童诗》，辑录宋代汪洙幼小时诗作，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补入他人作品。清孙洙编的《唐诗三百首》选诗精当，流传甚广，是较高年级的教材。

传统启蒙教材编写最为成功之处是符合中国语言文字的规律和少年儿童学习本国语言文字的规律，这些教材通俗易懂、短小精炼，易记、易读、易诵。

第四节 朱熹与理学教育思想

一、生平

朱熹，字元晦，生于福建，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一生主要从事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他还编撰了很多书籍，其中影响最广、最深的是《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

二、“明天理，灭人欲”与教育作用

朱熹把“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具有“天理”的人性为前者，“理”与“性”相杂的人性为后者。“理”是最高最完善的，清明至善者即为“天理”，浑浊不善者即为“人欲”，就要通过教育把“气”和“不善”清楚

干净，这个清楚过程，即“存天理、灭人欲”的功夫。

朱熹强调教育目的、作用是要适应宋代以来调整和强化封建伦理纲常的需要，坚持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朱熹用理学思想论述教育目的和作用，就是为了论证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又把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必须遵守；把违背或反抗封建道德的言行统归于“人欲”，必须禁止和根除。因此，“存天理、灭人欲”不仅是朱熹教育目的作用的表示，而且是其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

继承前人思想，他提出这一看法，即以道德伦理纲常克除私欲为教育的最终追求。认为人有得之于“天理”的纯善的“天地之性”，也有善恶混杂各不相同的“气质之性”，人的求善既有了可能也有了必须。由此要求教育须培养“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的“圣人”，反对科举制约下的学校引导人逐利而去义。继承“外烁”的教育观，他提出格物、致知、穷理的教育过程思想，重《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前四段为求知，称作“下学”，又形成一套读书方法，后一段为力行，称作“上达”，又形成一套修身、处事、接物的方法，由此达到“治国平天下”或“止于至善”的境界。

三、论“大学”和“小学”教育

朱熹关于教学内容的主张，是把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这个分段是以年龄和智力发展为准的，因此在学习内容和培养要求上，也有不同。朱熹认为8-15是小学阶段，是打基础的阶段，教学内容是“学其事”，即从洒扫应对进退开始，将伦常礼教教给儿童，进而教他们诗、书、礼、乐之文，使儿童在日常生活上，具体行事上，熟悉伦理纲常，达到存养已熟，根基已深的程度。他曾专门编著《小学》作为这个阶段的教材。把古人的“嘉言懿行”汇集起来，分为内外篇，共385章，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纲，以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心术、感化、衣服、饮食为目，引用许多格言故事，具体形象给学生举出榜样，使学生通过行动学习榜样。

在大学阶段，是15岁以后，要在小学基础上以“明其事”，按照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使其“明明德”，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目的。朱熹精心规划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步骤，尤其是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作为大学的基本教材，并亲自用理学观点，对于各书进行重新解释，对于封建社会后期官学教育，产生深远影响。四书经他提倡，成为大学的基础读物，只有学完四书，才能学习五经，其地位和作用甚至超过了五经，对于巩固封建统治，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

朱熹将小学教育（儿童少年教育）和大学教育（青年和成人教育）既视为两个不同阶段，也看成一个完整过程。小学是8—15阶段，“学其事”，如“事君、

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去做”，“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知其当然；大学是15之后，在“学其事”基础上“究其理”，知其所以然。小学是打基础，形成“圣贤胚模”；大学是扩充、深化与完成，是“就上面加光饰”，完成“圣贤”。朱熹认为儿童教育的特点是先入为主，在其还未形成一定观念前就要靠灌输、强化、规范，因此提出以格言、故事、“须知”、“学则”的形式灌输观念、规范行为、养成习惯。朱熹小学、大学教育的主张，是封建伦理之教，以培养“君子、圣贤”为目的，这种由近及远，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考虑到年龄特点的意见，在古代教育史上值得重视。

四、朱子读书法

（一）循序渐进。朱熹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循序渐进的含义：首先，学习的过程应当根据知识的难易程度确定次序，由浅入深，由小及大。他说：“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秩而不可躐等”。并称：“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后传以远者大者”。其次，循序渐进也包括知识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他注解《论语》“譬如为山”时指出：“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小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治学应该坚持不懈，不断长进。其三，循序渐进还体现在读具体的书上，要按照首尾篇章的顺序，“未明于前，勿求于后”。强调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前进。

（二）熟读精思。朱熹强调读书必须反复阅读，在遍数上不能打马虎眼。不仅要能够背熟，而且对书中的内容了如指掌，“一一认得，如同自己作出来底一般”。熟读是精思的基础，要对书中的名物训诂，都要一一领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刻理解文章的精义及其思想真谛。

（三）虚心涵泳。读书必须以虚心的态度去体会圣贤的用心和寓意，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或随意发挥。尤其是不能自己先有个意见，再“把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甚至穿凿附会地硬行联系，这样是学不好的。

（四）切己体察。也就是“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读书不仅是要获得知识、寻求义理，更重要的是落实到自身修养的提高上，这是儒家提倡“求诸己”，讲究自律的思想体现。如果读书只是为了向别人炫耀，或是为了获取教训别人的材料，也就丧失了本义。

（五）着紧用力。读书学习一定要抓紧，要努力。朱熹比做“撑上水船，一篙不能放松”，不进则退。读书又是细致功夫，不能蛮干。他以鸡抱卵为喻，急躁是不行的，而且过冷孵不出来，过热又会死。为此，他提出“宽着期限，紧着课程”的读书原则。要考虑到熟读精思的高标准需要，总的读书期限不能安排得过于紧凑。而一旦进入学习阶段，就绝不能放松，要按部就班地完成任

（六）居敬持志。朱熹视为读书的“致精致本”，关键还在学者的志向及良

好的心态。“敬”就是端正态度，诚心诚意、兢兢业业地去做，可以说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基础，读书也不例外。而居敬 a 则还有专静纯一、持之以恒的意思。“持志”即有坚定志向。朱熹指出：“立志不定，如何读书？”要保持努力学习圣贤之道、修身复性的志向，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评价：朱子读书法是古代最有影响的读书方法论，六条均反映了读书学习的基本规律和要求，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的局限性在于，主要是指读圣贤之书，自然句句是真理，读书的目的就是穷理，而穷理的目的就是进行封建伦理道德修养，掌握知识仅在其次，也不可能涉及质疑和问难的原则，不重视书本与实践的结合，这正是封建正统教育的弊病所在，所以也遭到后来不同学派人士的批评。

第五节 王守仁与心学教育思想

一、生平

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是明朝中期著名的教育家。王阳明年轻时信奉程朱理学，但在修行中对朱熹的为学之道产生了怀疑。他最终领悟到，“理”就在我心中。于是与程朱理学分道扬镳，转向承袭陆九渊的“心学”，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命题，创立了与程朱理学相径庭的“阳明学派”。后人将他们的思想合称陆王心学，成为理学中的重要派别。

二、“致良知”与教育的作用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为基础的。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靠心的认识而存在。万事万物都不在心外，而在心中。所以他不承认有客观存在的“理”，认为“心即理”，万事万物及其运行规律，以至道德规范，都是由心派生出来的。

心的本体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天理纯全，良知常在。而一般人的良知常被物欲、邪念所蒙蔽。除掉物欲、邪念，为善去恶，从而恢复本心，这就是“致良知”，也就是教育的作用。王阳明不同意朱熹“格物穷理”的主张，认为认识“理”，从本质上说，不是外求的过程，而是体验“吾心之良知”。

三、“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原则

所谓分限，是指儿童的认识水平和限度。他以走路为喻，婴儿只能扶着墙壁学习站立、移步，幼童可以在庭院中走、跑、跳、登，成人则可以出远门旅行千

百里。儿童处于“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身心发展时期，学习必须是循序渐进。王守仁认为儿童处于一个重要发展时期，精力、身体、智力等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教学必须考虑到这个特点，儿童的接受能力发展到什么程度，便就这个程度进行教学，不可逾越。把这种量力而教的思想称之为“随人分限所及”。就是说教学要考虑学者的基础，从此逐渐加深，不可躐等而进。

四、论教学

（一）“六经皆史”与教育内容

“六经”不过是人“心”的展开过程的记载，其作用无非是帮助人明白和发展“心”中的“理”。所以，王守仁认为，读书不能迷信书中的东西，认为“《六经》皆史”而已。读经的目的是要通过体认经书的理，来启发自己的良知。

（二）论教育教学原则

1. 立志

树立正确、坚定的志向是致良知的前提，也是致良知的体现。王阳明认为，无志向的人，“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痛痒，恐终不济事。”所以他强调：“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立志与勤学紧密相关：“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只有立定志向，方能勤学不倦；而立定志向后，也必然会勤学不倦。这确实说到了根本之处。

2. 自得

致良知本身就意味着自求自得。自得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自我得之，而不是靠别人包办。他说：“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自一了百了。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教师应起“点化”的作用，但归根结蒂还得由学生自己消化，否则教师也点化不了。二是自觉地有所得，而不是迫于外部压力不得不学，所以王阳明强调要立志，“凡学之不勤，必志之未笃也。”三是得之于己，即最终要把学到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就是致良知的结果。

王阳明并不反对读书学习，特别是读经，但与朱熹的宗旨有所区别。朱熹强调从经书中去钻研圣贤之道，即穷理。王阳明则认为：“《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

经书的精神实质（“理”）是与自己的本心相通的。读经的目的正是要通过体认经书的理，来启发自己的良知。因此，王阳明主张读书贵精而不在多。他指出：“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意，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絀绎反复。久则义理浹洽，聪明自开矣。”

读书还必须开动脑筋，独立思考。他指出：“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不敢以为是也。”这里体现出反盲从、反迷信的倾向，也

被正统程朱理学派视为异端邪说，斥之为“病狂丧心之人”。由此可见，阳明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

3. 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

王阳明多次强调要“随人分限所及”。儿童处于“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身心发展时期，学习必须是循序渐进。负担一定不要过重。他主张：“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恶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要使儿童经常保持精力有余的状态，这是十分有价值的观点。看起来教学进度是放慢了。而每个人的情况又不相同。他说：“人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教学就像治病一样，“初无一定之方”，根据病人体质、病情，“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要在去病而已”。王阳明的因材施教不仅要避短，而且要扬长。他说：“圣人教人，不是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有尊重和扶持个性发展的倾向，态度更为积极。

五、论儿童教育

1. 王守仁认为儿童阶段人私欲尚少，良知容易体认，所以儿童教育更应抓好。

2. 王阳明对当时束缚儿童、摧残儿童的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抨击。认为当时的儿童教育，对儿童一味要求约束而不知正面引导。

3. 有鉴于儿童教育中的严重问题，王阳明提出教育应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强调一定要注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保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强调儿童的教育要循序渐进，注意教育活动的多样化。

4. 教学内容多样化。针对儿童好动、注意力难以持久的特点，王阳明主张教学应该力求生动、多样化。要发挥诗、书、礼等各门课程多方面的教育作用。如“歌诗”不仅是精神陶冶，同时在高声吟咏歌唱的过程中，还可以调节、宣泄情感。“习礼”不仅是训练礼仪，还可以通过礼仪动作的练习，达到锻炼身体，强健体魄的作用。“读书”也不仅是增长知识、开发智慧，还可以通过抑扬顿挫的诵读来表达志向。王阳明还制定了一个日课表，将每天的功课按考德一一诵书背书一一习礼或课仿一一诵书讲书一一歌诗的次序安排。教学安排可谓动静交替，使儿童不致于感到过于单调和疲劳，有助于保持学习兴趣和提高学习效果，比起传统教育一味地读书背书来，确实是耳目一新，充分注意到儿童的身心特点。

第六章 早期启蒙教育思想的产生

第一节 早期启蒙思想

中国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具有思想启蒙的一般特征：

首先是批评传统。批评传统的政治和专制主义把学校作为宣传其思想的工具；指出科举束缚人性、废弃学校；批判理学教育，内容上只教文字，方法上只教“习静”，道德上书本至上、不教授实用技艺。颜元的思想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战斗性。他从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他认为几百年以至二千年来，教育都只是在文字书本上做功夫，为害甚大。他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概括起来总共有三大祸害：A“毁坏人才”，他认为培养出来的人才多不学无术。B“灭绝圣学”，是指训诂、禅宗教育日盛，二孔门实事实理得学术便日见衰竭。C“败坏社会风气”，是说理学教育主静、读书，造成社会道德、经济和人才的衰败。

其次是包容广大。早期启蒙思想家都很博学，对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都采取容忍和接纳的态度，把“西法”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方。

其三是务实致用。提出“实德实才”的人格理想和教育目标，讲究治学必须“经世致用”；提出“当务之急，俱宜练习”的社会实用标准，将“役夫之道”列为学校教育的内容；讲究学必著行，把知识转化为行动，反对空谈道德。

其四黄宗羲的“公其是非于学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关于学校改革的主张，表达了他对当时学校的不满和改革学校的思想。他指出，学校已成为“科举器争，富贵熏心”的势利之场。学校应该成为民主议政的场所，变“是非以出于朝廷”为“公其是非于学校”；学官不由政府委派，而由地方公议；从学官讲学，从皇帝到地方官都要处于学生地位听讲；政治上有缺失，学官有权提出批评。这些主张，反映了初步民主思想的萌芽，在教育史上有重大意义。

第二节 颜元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

颜元出身贫寒，青年时期，曾“耕田灌园”，还行过医以养家。19岁中秀才，但随后却绝意科举，开设家塾，教授生徒。这时，他笃信程朱理学，将自己的学舍称为“思古斋”。35岁时，认识到理学空虚无用，开始崇尚“习行”，把“思古斋”改为“习斋”，订“习斋教条”二十则，其中提出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经世治国的政务。晚年，颜元主持漳南书院，实行分斋教学，设置“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帖括”六斋。后因漳水泛滥，书院被淹而停办。颜元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弟子满天下，现有记录可查者，有一百多人。颜元的著作，最主要的是《四存编》，其中《存学编》是他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此外，还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

二、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 揭露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实际。

(二) 批判传统教育的义、利对立观。他认为“利”和“义”两者并非绝然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其中“利”是“义”的基础，但同时“利”也不能离开“义”，而且“利”必须符合“义”，颜元的思想冲破了传统的禁锢，使中国古代对“利”“义”关系的问题的认识接近科学化。

(三) 抨击八股取士制度。抨击了八股取士的制度。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主项，源于宋代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所采用的经义。八股文亦称时文，都是俗称，它的正式称谓是制义或制艺，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的文字，是阐述命题义理的作文，又简称《四书》（《五经》）义或文。八股文的写作宗旨是“代圣贤立言”，即必须以圣人的口气训释，而不得以作者的身份去发挥。因此作者必须“依经按传”，用“古人语气”。八股文有极其严格的文体要求，文章从破题、承题、起讲、开始，正文部分分为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两两对偶，构成八股，最后以大结为全文的结束语。

八股文是封建时代科举考试内容发展到顶点的产物，它既能考察士人的儒家经学理论造诣，又能考察其思维能力和文笔水平，它的标准化程度也完全适应考试和客观评定等次的操作需要，这是八股文能够占据科举考场 600 多年主导地位的原因所在。但是，八股文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到如此极端，加上它又是关系到士人前途命运的考试作文，也就完全死板僵化了，特别是不准谈个人的思想观点，成为束缚士人思想的专制工具，也考察不出真才实学来。

八股文取士对教育影响巨大。士人将主要精力用在作八股文上，学校也变成了八股文的训练基地。不要说其他各种学术、技能很少有人问津，即便是儒家经典本身，都可以不必用功去学了。最便捷的手段是学历届科举考试的范文，时人称为“程墨”、“房稿”。由于《四书》内容有限，能作为八股文命题的更有限，所以只要记熟相当数量的范文，就很有可能撞上考试题目，而照葫芦画瓢，求得侥幸取中。至于那些连应试本领都没有的人，还可以通过考场作弊来蒙混功名。私带“小抄”进考场的手段到明清也发展到十分高超的程度。更有效、更保险的办法是串通考官舞弊。尽管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惩治严厉，但追求的利益太大，还是不断有人铤而走险。可见科举制度到明清已发展到顶峰，也走到了穷途末路。八股文取士的方法不断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明末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甚至认为八股取士的危害要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要真正改革科举的话，必须等到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

三、“实德实才”的教育目标

颜元十分重视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把人才视为是治国安民的根本。

颜元不仅重视人才，而且进一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朝廷，政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矣”，正确地揭示了学校、人才、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颜元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主张学校应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即是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

教育目标的评价：颜元的这种主张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这是颜元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重视人材对治国的重要作用，强调人材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这些都是正确的，同时他提出的“实才实德之士”的目标，显然已冲破了理学教育的桎梏，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性，反映了社会要求新型的人材，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四、“实行”的教学方法

强调“实行”教学法，这是颜元关于教学方法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主张。

他所说的“习行”教学法，就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实际，要坚持练习和躬行实践。

颜元重视“习行”教学法，一方面同他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反对理学。

但是，颜元强调“习行”，并非排斥通过读和讲学习书本知识。

颜元所说的“习行”，虽然忽视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但他强调接触实际，重视练习，是教学法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具有进步意义。

五、“实学”教育内容

在教育内容上，颜元提倡以“六艺”为中心的“三事”、“六府”、“三物”为教育内容。“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三物”指六德、六行、六艺。“六德”为智、仁、圣、义、忠、和；“六行”为孝、友、睦、姻、任、恤；“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这三事、六府、三物，就是颜元所谓的“实学”。

六、颜元的“六斋”教学

晚年，颜元曾按自己的教育思想规划漳南书院，

书院的六斋及各斋的教育内容为：

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

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浩制、章奏、诗文等科；

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

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

帖括斋：课八股举业。

颜元思想总体评价：颜元思想的进步主要是体现在，分斋教学，这种教育方法不同于“理学”，内容也大大超出了“六艺”，把许多自然科学的知识提到了封建教育的内容当中，已经蕴含着近代课程设置的萌芽，这是颜元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最大的贡献。

第七章 洋务教育的兴起与近代教育的起步

第一节 封建教育的衰败与改革派的教育主张

一、封建教育的衰败

（一）官学教育有名无实

鸦片战争时期的教育制度，与清朝前期一脉相承，在形式上相当完备，但是，在这些学校中，除初等教育和部分私学进行正常教学外，其余的学校特别是官学已徒具虚名，甚至很少从事教学活动。

（二）教育内容不切实用

当时人们热衷的学问是义理、辞章、考据等，实际上都没有超出传统入学范畴。问在封建统治面临“内忧外患”之际，日益暴露出陈腐和无用。

（三）科举考试弊病丛生

第一，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整个封建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 with 科举紧密相连，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完全以科举考试为依归，学校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

第二，科举考试内容空疏、形式专制，考试过程中出现种种作弊行为。

二、改革派的教育主张

面对日益衰败的封建教育，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一批先行觉醒分子，从训诂考据的圈子中挣脱出来，提出了许多新主张：

- (一) “不拘一格降人才”
- (二) 复兴“经世致用”学风
- (三) “师夷长技以制夷”

第二节 教会学校的举办

教会学校的举办是外国资本主义列强进入中国后利用不平等条约，侵犯我国教育主权的显著标志。早在 1839 年 11 月，美国基督教徒布朗，为纪念英国传教士马利逊在马六甲开设英华学校，以传基督教，在澳门创办一所小学叫马利逊学堂。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最早学校。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传教士大量进入，开始兴办教会学校。1844 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会员，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这是外国人在华设立的最早的教会女校。从 1842-1877 年，基督教共创办学校 350 所，5975 人。

早期教会有以下特点：A 不受中国人欢迎。B 规模小，级别低。C 重视女子教育。D 讲西学，用新法。E 传播福音，保存中学。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文化侵略的性质，但在办学方式、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都突破了封建传统教育的模式，培养了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才，客观上给中国教育带来新的因素。教会学校对中国传统教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它全新的办学形式，新颖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等，都包含着反映近代社会教育的某些特点。

第三节 洋务学堂的兴办

一、洋务学堂的举办与类别

洋务学堂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①在于培养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路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②以所谓“西文”与“西艺”为主。洋务学堂的举办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而开始的，从 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约有 30 余所，其主要类型包括：

(一) 外国语（“方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等；

(二) 军事（“武备”）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

广东实学馆及广东水陆师学堂等；

(三) 技术实业学堂，如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等。

二、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最初是作为外语学校设立的，是近代中国被动开放的产物。迫于外交需要，1862年6月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是第一所洋务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创立之初，是专修外国语的学校，学生都是从满族亲贵中选取的十三、四岁的少年。初创时只有英文馆，1866年增加天文算学馆，讲习天文、算学，自此，同文馆变为综合性学校，学习年限为八年。在同文馆的课程中，外语居于首位，汉文经学贯穿始终，特别重视对学生封建道德习惯的培养，还向学生灌输殖民主义思想，帝国主义以宗教麻痹学生。在学校管理上，因经费由英国操纵的海关拨款，管理权由外国控制。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停办。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开创的意义：同文馆既有封建性又有殖民性，是清政府在教育上和外国资本主义结合的产物，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育的开端，具有新的办学形式，而且使科学教育正式列入中国教育之中，教育向前迈了一步。

三、福建船政学堂

福建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或“福州船政学堂”，是福建船政局的组成部分。1866年底，左宗堂在《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里确定学校的名称为“求是堂艺局”，并拟定《艺局章程》八条，对有关假日制度、生活待遇等都作了详细规定。

1867年1月6日，开始正式上课。学堂有前学堂和后学堂之分。前学堂学习制造技术，又称造船学堂；后学堂学习驾驶和轮机技术。1868年2月，前学堂内添设“绘事院”和“艺圃”。

1872年前后，船政学堂达到兴盛期。1913年从船政局中析出，改组为三个独立的学校；前学堂改组为福州制造学校；后学堂改组为福州海军学校，直属民国政府海军部；“艺圃”改组为艺术学校。

福建船政学堂从开办到改组，历时半个世纪，是洋务学堂中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所。它在我国近代海军事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海军人才的摇篮。

四、评价洋务学堂

洋务派办的这些新式学堂打破了传统儒学教育一统天下的格局，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科的教学，培养出中国自己的第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新型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如严复、鲁迅、张伯苓等近代史上的巨匠，都是出自于这类学堂。

洋务派办的新教育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一，它在国家教育体制中尚无一席之地。这些新式学校都是申报朝廷批准后兴办的，不是私学。但又都是以个案处理，零星举办，也不隶属于当时的教育管理系统，它的经费多靠自筹，学生毕业后没有官方提供的出路保障，所以严格说也不是官学，只能算做是封建传统教育之外的点缀和补充而已。特别是缺乏基础教育的根基，必然影响教育效益和质量。

第二，其范围局限在外语和军事两个方面，其他学科多为这两个方面的延伸。如机械专业主要是为军工服务，电报、医务专业也首先着眼于军用。当局也不愿扩大新教育的领域。丁日昌说：“除船械一切必须效法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矩，察以实意”。体现的是狭窄的实用性，实际上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原则的具体运用而已。

第三，从教学到管理，大权多被外国人所把持。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自1869-1894年，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达25年之久。福建船政学堂由法国军官日意格、德克碑任正、副总监，中国当局只管投资拨款、提供设备原材料及对学生的日常管教，至于指导和教授学生，“乃洋人之责任”。“洋教习”通常享有极高的薪俸和待遇，而养尊处优、不用心教学的却大有人在。总之，中国新式学堂一开始就带有半殖民地的强烈色彩。

第四，仍保留着封建教育的主要阵地。首先必须是具有一定的旧学基础的人才能入学，学校均有中国教习负责传统儒家经学的教学和考核，仍有祭孔典礼，讲究礼制，月课季考，学规繁苛，厉行惩戒，等等，都是旧官学的传统，新教育其实仅仅表现在教学内容方面。

第四节 留学教育的起步

一、幼童留美

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活动是由教会学校组织的。1847年，马礼逊学堂选派6名学童赴美国读中学，其中就有近代留学活动的倡导者容闳（1828-1912年）。清政府组织的幼童留美始于1872年，最早提出建议的是容宏。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等在容宏“教育计划”的基础上，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拟选送幼童，每年30名，4年计划120名赴美留学，15年后每年回华30名。经清政府批准，命候补知府刘翰清总理沪局事宜，并在沿海各地挑选聪颖幼童。1872年8月11日，第一期30名幼童经上海预备学校培训后，在监督容宏、陈兰彬带

领下赴美，1873年6月、1874年11月、1875年10月第二、三、四期各30名幼童也按计划出发。然而，由于诸多矛盾，这些幼童并没有按计划完成学业，而是在1881年下半年分三批被撤回。但这些回国留学生个人的发展还是不错的，据高宗鲁《中国幼童留美史》的统计，第一批留美学生中，后来担任总理、外长及各级军政官员占53%，作教师、工程师、技师、医生、律师等专业工作的占44%。

意义：这些青年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成为一批新型知识分子。

二、派遣留欧

留欧学生的派遣始于船政大臣沈葆楨的建议，并以船政学堂的学生居多。1873年12月，由于外国技术人员和教师按合同期满即将回国，福建船政局就面临如何发展的问题，沈葆楨建议选派优秀学生留欧，获得同意，但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实施。

1876年，魏瀚、陈兆翱随法国工程师日意格赴法，并留在法国学习，他们实际上是我国近代官派留欧的前导。1876年，沈葆贞、李鸿章又建议派留学生到欧洲学习造船和航海技术。计划共派30人，从福建船政局选派学生14人、艺徒4人赴法国学习制造，派学生12人赴英国学习驾驶兵船。限为3年，学成回国叙用。李鸿章还派出武弁7人，赴德国学习兵技。

1877年1月，李鸿章等奏请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并将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附呈朝廷照准执行。依据此章程，1877年3月31日，中国近代第一批正式派遣的留欧学生出发赴欧。

第一届留欧学生经过三年的学习，于1880年左右先后回国。在他们即将回国之前的1879年11月，沈葆楨领衔奏请续派，1881年底，第二届留欧学生由香港出发分赴英、法、德三国。1886年，因船政大臣裴荫森奏请，清政府又派遣了33（其中1名未能成行）名学生赴欧留学，是为第三届留欧学生。这三届学生从1879年陆续回国。1890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出使英、美、法、德、俄五国的大臣，每届可带学生数人，一边在使馆工作，一边向驻在国学习。

意义：规模虽小，但它却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教育中最名副其实的一步，就引进西学而言，没有比这更彻底的途径了。

第五节 “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与张之洞的《劝学篇》

一、“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这是我国近代一种重要的思想思潮。在鸦片战争时期也有萌芽，如林则徐《四洲志》中反映出来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思想，魏源在《海国图志》里突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后，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本”与“辅”已包含了中体西用的中心含义。19世纪70年代以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对此都有进一步的表述，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提出“中学其体也，西学为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896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京师大学堂立学宗旨“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这一切都说明，鸦片战争以来，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引进西学是必须的，但又不能失去传统的中学，人们对中学与西学关系的看法，比较一致地用“中体西用”加以概括。

到张之洞写《劝学篇》的时候，西学的引入已经大大突破了洋务派所规定的范畴。实际上，洋务派只承认西方某些器物，即物质文明的东西高于中国，可以为用，但西方的精神文明，万万不可取。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要用民权、女权等攻击皇权、夫权，要以君主立宪制代替君主专制。这时，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依然要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维护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便成了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对立面，阻碍了社会的变革。

二、张之洞与《劝学篇》

张之洞，清末维持封建的重臣，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

他的教育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整顿封建传统教育；二是兴办洋务教育；三是制定和推行新教育制度。1898年，发表《劝学篇》，全面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观点。

《劝学篇》分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通篇主旨归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也称旧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其中最注重的是三纲名教。西学也称新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中西学的关系：“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用偏废。”“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三、“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和局限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对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创立和发展近代学校教育，改革了传统教育只重儒学的教育内容，增加了自然科学知识，发展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的一代新人，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阻抑了维新思想更广泛的传播，不利于近代刚刚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对清末教育宗旨的影响更为深刻。清末的学制的颁行，就是在这一思想下产生的，而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办学宗旨和1906年学部颁发的教育宗旨，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能把发展西学同作为办学宗旨，在封建主义的儒学占传统地位的时代，自然是不小的进步，是中西文化在当时的一种特殊的结合方式，在客观上对封建教育制度的解体起了某些促进作用。但其根本仍在维护中学，在这种宗旨的支配下，清末学校，仍然要在尊孔读经的笼罩下，无法摆脱封建教育的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阻碍了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的进展。

(三)中体西用是在没有克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的情况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排异性反应。中学和西学具有完全不同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中学是小农经济和封建制度的产物，西学是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各自还有不同的民族和历史文化背景，二者是不可能并行不悖的。随着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危机的深化，中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也就发生动摇，它的“体”的地位也就难以维持下去。教育领域也是如此，既然人们“应世事”主要靠的是西学，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的身心仍由中学来支配呢？何况西学与中学又是两种不同的学术，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衔接关系，硬行规定讲西学必先通中学，终究也是行不通的。

第三篇中国近代教育

第八章 普及教育思想的提出与近代学制的建立

第一节 早期改良派的教育主张

早期改良派是 19 世纪末 70 年代后逐渐形成的一个思想群体。他们都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危机和洋务运动的局限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意识，他们把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制度，培养新型人才作为实现整体改革方案的基础。代表人物有：王韬、容闲、郑观应等等。

一、全面学习西方

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夷制夷”的口号，后来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模式，既是对魏源思想的继承，也是对魏源思想的限定。早期改良派则将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推进了一步，认为西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要求扩大向西方学习的规模和领域，深化学习的层次，全面学习西学。

二、改革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阻碍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发展，主要表现在中国近代化的主旋律是学习西学，而科举考试重经史，尤重八股文，近代教育应以培养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的人才为目标，而科举考试以选取单一的政治人才为目的。正是由于这诸多弊端，早期改良派对科举考试进行了的猛烈抨击，并要求改革科举。

三、建立近代学制

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郑观应，提出仿照西方学制设立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级学制系统，大、中、小学均采用班级授课的形式，规定学习年限为三年，以考试的结果为升学的标准。郑观应是国内最早倡导改书院为学堂的人。

四、倡导女子教育

在近代西方男女平权观念的影响下，早期改良派开始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

到甲午战争前夕，他们普遍发出了重视女子教育的呼声。

第二节 维新派的教育实践

一、兴办学堂

维新性质的学堂包括两类：

一类是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培养维新骨干、传播维新思想而设立的学堂。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1897年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创办湖南时务学堂。1894年严复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

另一类是在办学类型与模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等某个或某些方面对洋务办学观念有所突破，领风气之先的学堂。1895年，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奏请设立天津西学学堂，又称中西学堂，聘请美国副领事丁家立为总教习。学生毕业后，或从事洋务，或出洋留学。1902年改建成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前身）。1897年，盛宣怀在调任两江海关道后，又在上海筹办起南洋公学。先是设师范院一所，聘任梅溪书院主讲张焕纶为总教习，考选成才之士40人，兼习中西学术，这是中国有师范教育的开始。民国时改建为上海交通大学。

第一所国人自办的正规女子学校：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学，又称“中国女学堂”。

二、兴办学会与发行报刊

1895年，康有为《中外纪闻报》；1896年，梁启超《时务报》；1897年，严复《国闻报》；此外，还有《蒙学报》、《湘学报》、《求是报》、《实学报》等。这些报纸的出版，冲破了封建专制主义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教育，使人们看到了除了“天朝帝国”还有其他更美好的世界，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宣传了变法思想，促进更多人同情变法维新，甚至直接参加了变法运动。

1895年，北京强学会成立。该会以康梁为核心，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思想，集聚变法力量的重要阵地。年末，康有为又发起上海强学会。1898年，北京保国会成立。各省维新人士纷纷成立学会，其中以湖南的南学会最为活跃。还出现了各种专业和团体的学会，比如冬学会。苏学会、医学善会等。

1895年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同年末北京强学会和上海强学会相继成立，《中外纪闻》改名为《万国公报》与上海创办的《强学报》分别作为两会的会报。之后，各种学会、报刊如雨后春笋，如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严复在天津办《国闻报》等。各地的学会通过集会、演讲、出版书刊等形式宣传维新思想。民众性学会报刊的创办，不仅利于宣传变法，尤其意味着新思想、新文化开始向民众传播普及，与开办新式学堂相辅相成。

三、创办京师大学堂

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严令督促下，总理衙门委托由梁启超起草了《京师

大学堂章程》，并于7月3日上报，光绪皇帝当即批准。1898年百日维新时，京师大学堂正式建立，成为戊戌变法的重要成果之一。由梁启超参照日本学规起草学堂章程，规定除大学外，兼有中学堂、小学堂，分别班次，循级而升。同时副设师范斋。戊戌变法被扼杀后，唯一得以保存的是京师大学堂，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被迫停办，1902年初恢复，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掌管，建立了师范馆，这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后又建立了医学、法政学堂等专门学院，遂真正成为综合大学。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设立的意义：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早在百日维新前就有议论，后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的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以“培养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为宗旨，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他不仅要管理自身还要成为各省学堂的表率，而且还有统辖各省学堂的大权。

四、改革科举制度

1898年6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废除八股，此后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学问，客观上促进了西学的传播。不久，光绪皇帝再次下诏催立经济特科（法律、财政、外交、物理学），以选拔维新人才。

第四节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一、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主张

（一）废八股考试，改试策论，等学校普遍开设后，再废科举

康有为认为八股取士，导致读书人不研究现实，不研究各国情形，也放弃了真正的中国传统学问。指出清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源于八股。

（二）大力创办学校，改变传统的教育内容，传授科学技术，培养新型人才。

此外，为了更好更快地学习西学，康有为还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等建议。

二、《大同书》中的教育思想

主张废除私有制和等级制，论述了他所理想的学制体系，包括人本院、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一是人本院和育婴院，属于学前教育。妇女怀孕后入人本院实施“胎教”，儿童出生后转入育婴院，脱离母亲实施“公育”。二是小学院，儿童6岁入学，“养体为主，而开智次之”，所以功课宜少，而游戏宜多，同时又要“以德育为先”。三是中学院，学生11岁入学，康有为认为中学为“一生之学根本”，学问之通否，德行之成否，全在这个时期定型，所以体育、智育、德育均不可偏废，但仍以德育为重。四是大学院，招收16岁以上中学毕业生。大学是专门之学，故“于育德强体之后，专以开智为主”，学习什么专业，可由

个人自由选择，人尽其材。大学应特别重视实验，因此必须有自己的工厂、农场、商店、医院等。康有为倡导“公养”、“公教”，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享受教育，皆为公费。重视学龄前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指出对儿童应实行德、智、体、美诸方面的教育等，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传统封建教育是一很大的冲击。《大同书》中的教育体制是儒家教育理想与借鉴西方学制结合的产物。

第四节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一、“开民智”、“伸民权”与教育作用

梁启超认为国势的强弱随着人民的受教育程度而转移，并明确地将“开民智”与“伸民权”联系起来，揭示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他的“开民智”实具有科学与民主启蒙的内涵。后来梁启超觉察到“民智”和“民权”并不能划等号，因此他提出教育应该有宗旨。

二、培养“新民”的教育目的

梁启超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可以看出这种新民正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知识技能的新国民。

三、论废八股、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者能够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他认为行上策国强，行中策国安，行下策国存，如果仍一成不变的话，国将不保。

四、论学制

梁启超借鉴西方心理学研究成果，列出了一份《教育期区分表》，将受教育

者划分为5岁以下（幼儿期——家庭教育与幼稚园期），6-13岁（儿童期——小学校期），14-21岁（少年期——中学校期），22-25岁（成人期——大学校期）四个年龄阶段，分别介绍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学生在身体、智、情、意、自观力（自我意识）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和基本特征。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确定学制的不同阶段和年限是近代西方教育心理研究的成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介绍和倡导这一理论的人。

五、论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和儿童教育

梁启超于1896年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次以专文论述师范教育。在文章中，梁启超对新旧学堂中的教师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当时，中国急需普遍设立中、西学兼习的新式学堂，但不能依靠这些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设立师范学校，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教师。

在师范学堂的具体设置方法和课程安排上，他主张参照日本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同时设立小学和师范学堂，师范学堂的学生同时兼任小学堂的教学，以后逐步提高师范生的程度。课程包括“六经”大义、历朝掌故、文字源流、列国情状、格致专门等基础学科。

重视女子教育也是梁启超维新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从女子自养自立、成才成德、教育子女、实施文明胎教等方面揭示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指出接受教育是女子的天赋权利，也是男女平等的保障。还指出女子教育的发展水平反映了国势的强弱。

梁启超，倡导对中国儿童教育进行改革。他指出西人强调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而在中国则与之反；西人重视理解，而在中国注重识记；西人注意直观教学，实物教学，而在中国只注重言语文字。他建议中国应从编写儿童教学用书入手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

第五节 严复的教育思想

一、“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的“三育论”

严复是中国近代从德智体三要素出发构建教育目标模式的第一人，他在《原强》中首次阐发了他的“三育论”。

严复是中国最早论述三育并重的教育家。他说：“讲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其中体育是国民素质的基础，近世中国民力孱弱，被外人讥为“病夫”，因此必须加强体格训练，以“鼓民力”。国民才智是国家“富强之源”，智育包括学问和事功两个方面，不能只在书斋里作学问，要“观物察变”，运用于实际，以“开民智”，其核心是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和训话辞章之学，讲求西学。德育在三育中最重要，但不能再因袭封建的人伦纲常，要树立国家观念和社会公德，以“新民德”，即改变传统德育内容，用

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取代封建伦理道德，培养人民忠爱国家的观念意识

二、“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

(一) 倡导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要一体学习，但走了“全盘西化”的激进道路。

(二) 对西学的整体性和发展性的认识。他把近代科学按从基础到应用的层次划分为三类：玄学、玄著学、著学，认为这三类学科连成一体。还认为西学是一个发展的体系。

(三) 后来严复改变了以前“全盘西化”的倾向，提出了要构建一种融会中西，兼备体用的新文化体系的设想。

设想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应该是：

小学阶段以十分之九的时间学习“中学”，**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能粗通经义史事。**教学法**应“减其记诵之功，益以讲解之业”。

中学阶段主要教授西学，并且一切功课皆用洋文授课。

高等学堂，只设西学教习，不设中学教习。

第六节 清末教育新政与近代学制的初步建立

一、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颁布

1902年，在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主持下拟定了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8月15日奏呈颁布，通称《钦定学堂章程》因该年为壬寅年，又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制定的全国性学制系统——最早颁布，具体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的相互衔接关系。

壬寅学制虽经正式公布，但并未实行，第二年，光绪《奏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颁布执行，该学制称癸卯学制。——“最早被实施”

癸卯学制纵的方面把整个学程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共三级十三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仅设中学堂一级，五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年到四年，通儒院五年，共三级十一年到十二年。儿童从七岁入学，到通儒院毕业，共计二十六年。横的方面除直系各学堂外，另有师范教育及实业教育两个系统。

癸卯学制的特点

癸卯学制由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制定，必然带有明显的封建教育的烙印：

第一，从学制看，延续时间过长。

第二，从课程设置看，传统的中国经学教育内容仍占很大比重。读经讲经课，初等小学堂占总课时的40%（还不算每天半小时的温经），高等小学堂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加上与之密切相关的修身课，仍占40%。小学不设外语，也是要保证学生打下坚实的传统中学根基。中学堂的读经讲经和修身课也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高等学堂政科（即文科），经学、伦理仍为必修课，艺科（即理科）也设有伦理课。

第三，从学校设置看，按地方行政级别规定办学级别，如初小由乡镇设立，高小由州县（及大镇）设立，中学由府（大州）设立，高等学校在省城设立，最高学府设在京城，同时鼓励私人办学（限于小学），也是套用了传统的办学体制。

第四，从学校管理看，保留旧学校每月朔日（初一）的祭孔、宣读《圣谕广训》的典礼，及月课、岁考、以学业成绩奖惩学生的各项制度。毕业考试由地方官会同学堂监督（校长）和教员主持，各类毕业生分别赋予相应的科举出身，如通儒院毕业生按翰林升阶，大学本科毕业生作为进士出身，高等学堂毕业生作为举人出身，中学毕业生奖以（国子监）拔贡、优贡、岁贡，高小毕业生作为（府、州、县学）生员，即秀才出身。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比照同级普通学堂给予毕业生科举出身。

第五，仍没有女子教育的位置。章程以中国男女之辨甚谨为理由，规定“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不过在西方男女平权主张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加上蒙养院的设立要求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师资，所以女子入学受教育已是不可遏制。1907年，清政府正式批准设立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女子初小和高小的学制均比男子初小和高小少一年，课程也少一些，可见其地位仍低于男校，而且女校的防范制度措施极其严格，以保持“男女大防”的封建礼教。尽管如此，女校的设立，毕竟开创了女子教育发展的历程。

评价：

尽管癸卯学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从性质上说，它毕竟属于近代新学制的范畴：它具有完整的、上下衔接的学校体系，学习近代自然、社会和人文学科，规定统一的学习年限，实施班级授课制，编制了专门的教科书这些都与封建传统教育有本质区别。癸卯学制的颁布结束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教育体制，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废科举，兴学堂

科举制度从改革到废除共经历了改革科举内容、递减科举中额、到完全废止三个步骤。终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乡试、会试一律停考，各省岁科考试也随即停考，至此，共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的

科举考试，终告废除。

三、建立行政体制

为保障学制的实施和兴学政策的落实，1904年政府规定专设总理学务大臣。废除科举制后，为适应形势，1905年底批准成立统辖全国教育的中央政府主管机构——学部，以后将国子监并入学部。与此同时，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1906年令各省设提学使司专管各省教育事务，长官为提学使；同年在府、厅、州、县设劝学所，为各地教育行政机构。又制定视学规程，将全国划为12个视学区，以三年为一视学周期。由此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四、制定教育宗旨

张之洞主持修订的构成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办学宗旨上明确指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然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人成材，各适实用。”这是中国近代最早规定的教育宗旨。

中国近代教育宗旨的正式颁布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1906年3月，根据学部的建议，清帝下谕，正式确定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宗旨的前两项强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礼教，体现封建教育的根本性质。后三项分别与德育、体育和智育对应，但出发点都是国家本位的。“尚公”强调国家利益和公民道德，“尚武”的目的是强兵，“尚实”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至于对个人品质健全发展及个人生活改善的需求，这个教育宗旨根本就没有顾及到，这也是中国传统专制社会教育的基本特点所在。

五、留学教育

这一时期因新政的实施，留学教育再掀热潮，以日本和美国为主。

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的强盛震惊了中国，其改革成功的经验更被重视。加上距离近，费用省，留学更有便利之处。1896年，首批13名官派留学生赴日本，后清政府将各省选派学生赴日本留学作为一项固定的事务。私人自费留学也多是去日本。到1907年，赴日留学生达到1万5千人，远超过赴欧美留学生的总和。留日热潮形成的原因：A 清朝政府政策上的提倡与鼓励；B 日本政府推行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C 中国民族危亡的强烈刺激；D 中日两国地理、文化上接近。

清末留日特点：A 留学生生源广泛，成分多样；B 研习科目多种多样；C 爱国热情高涨。

留日热潮的消退：A 清政府政策的改变，对留学生的程度提出严格的要求；B 日本政策的改变，在留日学生日益高涨的爱国活动的形势下，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予以压制。C 另外，国内新学制的事实，科举的废除，新教育迅速发展，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小学教育的要求。

“庚款兴学”与留美教育

1908 年，美国政府决定将应得的赔款的一半，即 1078 万多美元“退还”中国，作为派遣留学生赴美之用，并在北京创办了一所留学预备学校，即清华学堂。经费使用由美国派员监督。随后其他列强也退还部分赔款，以这笔资金建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用于给在华文化团体开展活动的资助。“庚款兴学”反映了列强在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浪潮下，更加重视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影响渗透的趋向。

第九章 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的建立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一、制定教育方针

1912 年 1 月 9 日，成立中央教育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立即着手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1912 年 7 月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谈论并通过了新的教育方针，9 月 2 日，正式公布实行。**新教育方针**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个教育方针，体现了资产阶级关于人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思想，否定了清政府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否定了君权的绝对权威和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进步，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旧教育的一个重大胜利。

二、壬子癸丑学制

在 1912 年 7 月 10 日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讨论了学制改革的问题。会议决定改革旧学制，并拟定了一个《学制系统案》。9 月 3 日，教育部正式颁布《学校系统令》，即“壬子学制”。到 1913 年 8 月，又陆续公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小学教则及课程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公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大学规程》、《实业学校令》等法令，形成一个新的学制系统，统称“壬子·癸丑学制”。

从学制纵向构成来看，初等小学校 4 年，高等小学校 3 年，均设补习科。中学校 4 年。大学预科 3 年（副设于大学，不得独立设立），本科 3 年，法科和

医科4年。小学之下有蒙养园，大学之上有大学院。

从学制横向构成来看，除普通教育外，还有师范教育与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二级，相当于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实业教育分乙种实业学校和甲种实业学校，相当于高小和中等教育阶段。还有专门学校，相当于高等教育阶段，本科3-4年，预科1年。

壬子癸丑学制与清末癸卯学制相比，有明显进步，其特点主要有：其一，缩短了学制期限，较之“癸卯学制”，共缩短3-4年，有利于增加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机会。其二，取消了专门为贵族设立的各类学校，废除了封建特权和等级限制。其三，女子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初等小学已可以男女同学，普通中学、甲级实业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都设立了女校。其四，从课程改革与教学方法看，取消了忠君尊孔的课程，增加了自然科学课程和劳动生活技能的训练，反对体罚，要求教育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但总的看来，毕竟只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推动，教育改革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一学制在基本结构上与清末学制仍大体相同，改革只是零星的、局部的。即便如此，这些改革成果到后来也被袁世凯所推翻。

三、颁布课程标准

在颁布学制的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课程标准。废止了癸卯学制中的“读经讲经”课，突出近代学科和资本主义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但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关注对学生的美感和情感教育，注意课程的应用性、平民化和首脑协调发展的特色。

第二节 蔡元培与近代资产阶级教育

一、“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蔡元培受康德二元论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世界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为现象世界，就是客观的现实世界。二为实体世界，是高于现实、超越现实的，它不可直接体验，全靠感悟。人既要立足于现象世界，又要向实体世界迈进，这才是完全人格，也正是教育的目标。从这一理论基础出发，完全人格教育可以分为五项，属于现象世界的有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分别相当于体育、智育和德育。属于实体世界的有世界观教育，而美育则是联系二者的桥梁。“五育并举”的教育实施结构图。蔡元培在《世界观与人生观》、《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两文中对此作了详细阐明。

军国民教育，其社会意义是“强兵”。因为当前国势衰弱，屡丧国土与国权，国内的军阀也凭借武力实施专政，民权得不到保障，所以必须提倡军国民教育。军国民教育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说就是体育。他强调要改变旧文人孱弱的形象，因

为“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所以体育是养成完全人格的基础。

实利主义教育，其社会意义是“富国”。蔡元培指出当今世界的竞争，不仅在武力，尤其在财力方面。所以就必须提倡实利主义教育，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经济。实利主义教育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说就是智育。在普通教育中，他把物理、化学、博物学、算学、历史、地理、金工、木工等科都列入实利主义的范围。

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认为，实施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虽可以富国强兵，但兵强则可能借以欺凌他人，国富则可能助长腐化堕落。所以必须提倡公民道德教育。从个人而言，蔡元培认为在人的知、情、意中，意志是人生的主题，而德育正是决定人的意志的，辨明善恶决定了人们行善的意志。他指出：“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

世界观教育，这是培养人超乎现世之观念的最高层次的教育。由于实体世界“无以名之”，所以世界观教育也不是通过一般说教可以完成的，只能是一种超越型的精神境界的修养。按蔡元培的话：“消极方面，使对现实世界，无厌弃亦无执着；积极方面，使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可见世界观教育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说不出具体的方法和内容来。最好的途径是通过美育来达到世界观教育的目的。所以五育中可以具体实施的只有德、智、体、美四育。

美育，即“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蔡元培指出，美的特点，一是具有普遍性，任何人都可以认同并共享，无法歪曲或独占。二是具有超越性，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能使人得到精神境界的超脱，从而向实体世界过渡。蔡元培说：“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美育是引导人由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的桥梁。

蔡元培将五育视为完整的有机整体。他打比方说：“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用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完全人格的教育思想实际上就是蔡元培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二、改革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

（一）抱定宗旨、改变校风

蔡元培改革北大的第一步就是明确大学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第一，改变学生的观念：（1）抱定宗旨：学校及研究高深学问之地；（2）砥砺德行；（3）敬爱师长。

第二，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学诣”第一的原则。

第三，发展研究，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且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进步的场所。他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并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书。

第四，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要求学生砥砺德行，敬爱师长，并成立了各种学生组织以培养学生兴趣。

（二）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原则

蔡元培认为，大学之大，就体现在“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上。他主张，无论何种学派，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即使观点彼此相反，也应让他们并存发展。他提出以“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为办学方针。为此，他一方面重视图书馆建设，广泛收集各学派文献资料，使北大图书馆藏书之丰在全国高校首屈一指。另一方面就是网罗各方面人才来北大执教。聘用教员的惟一标准就是学术造诣，其他如思想倾向、学术派别、年龄资历、个性特征等等都是次要的，甚至可以根本不顾。反之，对于学术水平不够的，不论名望有多高，背景有多大，一律裁减。这一原则体现了蔡元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冲破封建专制思想的作用，是积极进步的。

经过蔡元培的努力，北大教师队伍焕然一新。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但并不是研究某一家或者某一派的学问，更不是研究某些人指定的学问。这一原则在教师的聘用上得到充分体现。教师中，既有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也有实用主义者胡适，既有主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钱玄同、刘半农、鲁迅，也有反对革新的复古主义者黄侃、刘师培、辜鸿铭。此外还有章士钊、马寅初、马叙伦、任鸿隽、李四光等各学科名流。当时北大教员 217 人，教授 90 人，35 岁以下的有 43 人，50 岁以上的仅 6 人。

（三）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蔡元培从思想上是推崇民主办校的，同时他也知道在军阀统治的黑暗政治下，他恐怕难以长久任职，因此也想打下一个不易变更的基础。他主张学习德国大学的管理方法，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不因校长一人去留而引起动荡。他首先建立了评议会，每 5 名教授选举评议员一人，全校共 19 位，校长担任评议长，凡涉及校务全局的兴废举措，均需经评议会审核通过。随之又设立了教授会，各系共 11 个学科教授会，系主任由各学科教授公举，任期三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科的教务和教学工作。由各学科教授会主任组成教务处，教务长由主任们推选，任期一年。这样一来，学校的决策权和人事安排权都掌握在教授手里，即使校长换人，办学方针也难以改变。

第一，成立全校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评议会

第二，成立全校最高行政执行机构：行政会议

第三，建立全校教务传导机构：教务会议及教务处

第四，建立主管全校人事和事务工作的机构：总务处

第五，成立各学门教务管理机构：教授会

（四）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

在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上，蔡元培采取了以下措施：

1. 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蔡元培认为，学与术是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学为理，术为用。学与术的关系，从次序来看，术是第一性的，在应用中才能产生理论；从重要性看，则学更重要，理论高度不够，应用技术的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所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按学科划分，文、理科是学，法、商、医、工、农皆属于术，教学的目的和方式各有不同。一所高校既搞理论又搞应用是难以搞好的，他主张仿效德、法等国的制度，“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

2. 沟通文理，废科设系。蔡元培进行了学科调整，将北大原有的文、理、法、商、工等多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商归入法科，工科并入北洋大学。1919年，又取消三科界限，在全校设立11个系，要求文理兼习，均实行选科制。

3. 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课程分为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三大类，课程量按单位计算，也就是学分。

4. 变革考试制度，即只有学科的课程考试，而没有传统的班级课程考试。学生可能提前毕业，也可以滞后毕业，大大增加了教学的灵活性。

5. 蔡元培还建立了旁听制度，课堂向社会开放。规定必须用本国语言讲课，积极应用白话文教材。将体育定为正式课程，每周3小时。同时大力提倡美育，设美学课和美育室，蔡元培亲自讲课。北大的教学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

三、教育独立思想

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完全隶属于封建政治，近代以来这种格局依然维系下来。特别是军阀政府把经费都用于打仗，使教育经费极其短缺。当时各政党的政客又都是为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经营，从私利出发去干预教育。帝国主义在华办的学校则由基督教会控制，侵害中国的教育权。在这样的局势下，教育很难办好。教育独立论的主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1922年3月，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一是要独立于政党，二是要独立于宗教，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去办，保有独立的地位。他认为教育以人为本，而政党以事业为本；教育求远效，而政党求近功，二者在方向上就有矛盾。再加上执政党的更换以及党内政策的变换不定，教育不得不跟着变来变去，是无法办出成效的，所以教育应摆脱政党的控制。教育讲究尊重个性，而宗教总是要人盲从；教育追求前进，而宗教趋于保守，尤其是教会学校借办学诱使青年信奉基督教，更是害人不浅，所以教育要摆脱宗教的影响。

教育独立应该包括：第一，经费独立，要求政府划出某项固定收入，专作教育经费，不能挪用。第二，行政独立，专管教育的机构不能附属于政府部门之下，要由懂得教育的人充任，不能因政局而变动。第三，思想独立，不必依从某种信仰或观念。第四，内容独立，能自由编辑、自由出版、自由采用教科书。第五，以传教为主的人，不得参与教育事业。

蔡元培提出教育独立的思想，主张教育脱离政党、教会而独立，要求把教育交给教育家办理，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要求摆脱军阀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侵略，在中国独立、自由地发展教育事业的愿望。无疑，在当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然而，主张教育独立，在理论上是有片面性的，在实践中毕竟也是行不通的。

第五节 新文化运动与教育变革

一、新文化运动与教育观念变革

新文化运动促进教育观念的转变，在思想观念层面上自觉接受西方教育、跟上西方教育，主要表现在：

（一）教育的个性化

强调在教育上“使个人享自由平等之机会而不为政府、社会、家庭所抑制”；要求在教育中尊重个人，从尊重儿童开始，教师必须懂得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从而选择适当的方法。

（二）教育的平民化

教育关注点的下移和重民是当时普遍可见的现象。提出必须坚持教育的“庶民”方向，打破以往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差别的阶级教育。

（三）教育的实用化

一方面认识到教育对个人生活能力的培养、对社会生产发展的适应的重要意义，从观念上解决了改革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的问题；另一方面认识到学校内部须进行全面改革，沟通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强调学生主动、创造的学习和实际能力的培养，要求课程内容和教学组织形式均须适应生产和生活发展的需要，以求普通学校教育摆脱传统的束缚。

（四）教育的科学化

民主主义者开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中国教育现状，指出要让科学内容和方法渗入到社会各项事业，渗入到教育，改变人民的态度和观念。

二、新文化运动与教育改革

第一，废除读经，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即：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

第二，教育普及有所发展。

第三，学校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

学校教育中开始推行白话文和国语，中等教育开始注意科学和实用。为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方法的研究与改革首先在小学开展起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

第四，师范教育和大学的改革。

1913 年教育部调整全国师范教育布局，筹划直隶、东三省、湖北、四创、广东、江苏六大师范区，每区设一所高等师范学校。大学的改革首先发生在北大，1917 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

第四节 新文化运动时期和 20 年代的教育思潮与教育改革运动

一、平民教育运动

由于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等的不同，平民教育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部分：

（一）一部分以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代表。

他们认为平民教育必须符合劳动人民谋求自身解放的根本利益，应该与破除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同时进行。要真正解决平民教育问题，必须先解决经济和政治制度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工农劳苦大众才能获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为此，1919 年邓中夏发起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及负责筹备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这些都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实践。

（二）另一部分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

他们在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把平民教育视为救国和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希望通过平民教育来实现平民（民主）政治。

为此，北高师师生于 1919 年组织了平民教育社；朱其慧、陶行知、晏阳初于 1923 年组织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

二、工读主义教育运动

以工兼学、勤工俭学、工人求学、学生做工、工学结合、工学并进，培养朴素工作和艰苦求学的精神，以求消除体脑差别。

（1）北高师学生 1919 年发起组织工学会。

基本观点：倡导工学主义

（2）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王光沂发起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无政府主义者）将工读视为实现新组织、新生活、新社会的有效手段。本着互助合作的精神，实

行半工半读，将工读互助团办成。

(3)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提出了工人和农民的工读问题，同时也支持青年学生的工读互助实验，尤其号召知识青年到工农中去，初步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思想。

(4) 纯粹的工读主义者，他们把工读单纯看作是解决青年失学问题的好方法。

三、职业教育思潮

起源于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后广发传播，并正式形成，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潮，30年代中期趋于消沉。呼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解决社会严重缺少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实用技术的新式人才，大批中小學生毕业后却成为失业者的问题。是由清末民初的实利主义和早期实用主义等教育思想演变发展而来。1917年中国成立第一个研究、推广职业教育的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并形成了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

沟通教育与实际生活、学校与社会百业的联系；强调学校教育应授予学生从事某种职业所必须的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对个人而言，可以解决生计问题，对国家来说，可以增进生产力，发展经济，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它影响了“壬戌学制”的改革，不仅使职业教育在学制上正式确立并加强，而且注意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沟通，体现了中学教育兼顾升学和就业的双重职能；在教育实践上，极大推动了职业教育活动的发展；它所体现的平民化、实用化、科学化、社会化特征，是对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充实和丰富。

四、实用主义教育思潮

民国初年，经蔡元培介绍而为中国教育界所了解，其广泛传播并在中国形成一种思潮是在五四前后，尤其是在杜威来华讲学后。那时大量的讲演、杂志甚至专号、书等大量出版。“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等口号一时间大量传播。这一思潮所以能在中国兴起，一方面由于此思潮宣扬教育对改造社会的作用远比政治、经济、法律等有成效，而这正符合中国资产阶级试图以教育手段进行社会改良，避免发生社会革命的思想。另一方面，他的教育思想以现实生活组织教学内容，使学生“做中学”等主张，很适合中国教育并改造传统教育脱离社会需要，脱离儿童生活和发展的弊端。实用主义思潮意味着中国教育观念的很大改变，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有着明显的反映，1922年新学制中的标准带有很大这一思潮的烙印。

五、勤工俭学运动

1912年吴稚晖、蔡元培等在北京发起“留法俭学会”并设预备学校。1915年蔡元培等人在法国创立“勤工俭学会”，明确提出“勤于工作，俭于求学，以

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在华工教育中创造了半工半读的教育形式，产生最初的工读主义教育思想。1919年至1920年底，留法勤工俭学达到高潮。早期共产主义者是此阶段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发起组织和参加者。至此，勤工俭学运动的内容与性质都发生了变化，从通过勤工与俭学以维持学业，提高到以俭学与勤工相结合，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出路的认识高度。

六、科学教育思潮

(一) 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

认为科学教育的基本内涵是物质上之知识的传授以及应用科学方法于教育研究和对人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训练。

(二)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通过文化反思倡导科学启蒙，主张以理性态度看待中国传统教育，建设未来教育。

(三) 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将科学的方法理解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之为解决一切学术和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是一种较为具体的科学教育主张。

七、国家主义教育思潮

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兴起，其内涵为：① 以教育为国家的工具；② 教育是国家的任务。其主旨在于以国家为中心，反对社会革命，通过加强国家观念的教育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独立。1923年曾琦李璜在法成立“国家主义青年团”，余家菊和李璜合著《国家主义的教育》，标志着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重振。

八、学校教学改革与实验

受实用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等教育思想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在西方国家流行的以反传统为旗号，以儿童活动为中心的各种教学法相继传入中国，并都有热衷者尝试作引进课堂的实验。最为流行的是席勒的“五段教学法”。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美国新教育运动的影响，以凡传统和儿童为中心的各种教学法相继传入，如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葛雷制等，曾在各地中小学开展了广泛的实验研究。这些改革法有共同的追求即：打破班级授课制和学科课程，从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出发组织教学。实验大多逐渐停废，但给教育者的观念冲击很大。

九、收回教育权运动

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杂志》第四卷第3期上发表《教育独立议》，极力主张教育脱离政党与宗教而独立，率先举起反基督教教育的大旗。

1923年9月，余家菊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一文，率先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要求对教会学校“施行学校注册法”。在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和学生界引起强烈反响。

1924年6月，“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告成立。

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讨论外人在华设学和收回教育权问题。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开封召开年会，通过《教育实行与宗教分离》和《请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

1924年，收回教育权运动达到高潮，全国各地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教会学生纷纷退学，一些知名学者也振臂呐喊，声援学生运动。政府迫于压力，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1925年5月，浙江省发出通令，禁止全省所有学校宣传宗教。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这个文件的颁布与执行是收回教育权运动最大的实际性成果

第五节 1922年新学制

七项标准：

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这七项标准实际上就是新学制的教育宗旨，或者成为教育标准。体现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民主和科学的时代精神，明显受到了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思想影响。

学制体系与特点

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令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这就是1922年的“新学制”，或称“壬戌学制”。“壬戌学制”，或称“六三三学制”，主要采用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单轨制）。学制系统分为三段：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各段的划分，大致以儿童身心发展时期为依据；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地方情形各异，而社会要求也很复杂，故于设校分科，注重灵活性；教育以儿童为中心，学制系统宜顾及其个性发展，故于高校及中等教育之编课，采用选科制，于初等教育之升级采用弹性制等。

对各级学校修业年限作了规定：①初等教育6年。其中初级小学4年（可单设），高级小学2年。②中等教育6年，分初高两级，各为3年。初级中学施行普通教育，可单设，亦可根据地方需要，兼设各种职业科。高级中学分为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师范学校修业年限为6年。③高等教育3~6年，其中大学4~6年，专门学校3年以上。大学院为大学毕业及具有同等程度者研究之所，年限不定。

特点：1. 新学制采用六三三四制，是明确以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作为划分学校教育阶段的依据，这在中国现代学制史上是第一次，从而理顺了普通教育在整体上的衔接关系。2. 缩短了初等教育年限而趋向合理。把小学从原来

的7年缩短为6年，有利于初等教育的普及。幼稚园也纳入初等教育阶段，使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得以衔接，确立了幼儿教育的地位。3. 加强了中等教育。是这次改革最大、最成功、最具特色之处。中学年限从4年延长到6年，极大提高了中学教育程度，便于中学与大学的衔接；把中学分成初中、高中两级，既增加了地方办学的灵活性，也照顾到学生的选择余地；中学开始实行选科制和分科制，既有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也有助于扩大课程的种类，促进新科学的发展。4. 在高等教育上的改革，一是根据中学修业年限的加强，中学水平的提高，取消了大学预科，使高等教育不再担任普通教育的任务，而集中力量进行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从而有利于提高高等教育的水平；二是大学采用选科制，适应了发展学生个性的需要。5. 兼顾了升学与就业两者的关系。用职业教育代替事业教育，设置了从初级到高级的职业教育系统。适应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对培养具有初中级劳动技能和一定文化知识的人才的要求。6. 在师范教育上的改革，一是师范教育类型增多，二是程度相应提高。7. 女子获得了平等受教育的权利。8. 在课程改革上，小学国文改为国语，修身改为公民，并加强了手工、图画课。中学加强了人文科学和理科的课程。

1922年制定的新学制，主要是采取当时美国一些州已经实行了10多年的“六三三制”，表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从效法日本转向了效法美国，由军国民主义教育转向了平民主义教育。新学制的缺点是过度模仿美国学制，在一些方面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总的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式的成果。

第三篇 中国现代教育

第十章 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建设

第一节 教育宗旨与教育方针的变迁

一、“党化主义”教育

1924年，模仿苏俄“以党治国”模式，强调政治上一切举措都以党纲为依据，教育也不例外。1926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阐述了“党化教育”的涵义，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求得教育的“革命化”、“民众化”、“科学化”、“社会化”，即把教育方针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下，按国民党的“党义”和政策的精神重新改组学

校课程，不仅造就各种专门人才，尤其要使学生走出学校后都能做党的工作。

二、“三民主义”教育宗旨

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次全国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说明书》，解释三民主义教育“就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就是各级教育行政设施的设施，各种教育机关的设备和各种教学科目，都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并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之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至此，“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终告形成。

三、“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来“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遵循这一方针，一方面采取了一些战时的教育应急措施，在日寇大举进犯的关键时刻，为保存实力，将一批重点高校迁往西南西北，调整重组，坚持教学，为中国教育保存了精英力量。另一方面强调维持正常的教育和管理秩序。

“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是一项并不短视的教育决策，是中国的教育事业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得以保存，在西南西北地区还有所发展。具有爱国心的教育工作者在及其艰辛的岁月里，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自强不息，弦歌不辍，取得了相当不易的教育成就。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战时教育房展仍然强调“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教育同样是作为国民党“以党治国”、控制思想、压制民主的工具。

第二节 教育制度改革

一、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试行

1927年6月，国民党教育行政委员会，仿照法国教育行政制度，中央设中华民国大学院主管全国教育，地方试行大学区，取代民国以来中央政府设教育部、各省设教育厅的教育行政制度。任命蔡元培为大学学院院长，公布了《中华民国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隶属国民政府，管理全国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宜。

同时，通过了《大学区组织条例》，次年公布。规定全国各地按教育、经济、交通等状况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大学1所，大学设校长1人负责大学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大学区下设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扩充教育处等。大学区的最高审议机构是评议会。

二、“戊辰学制”的颁布

1922年新学制颁布不久，出于推行“三民主义”的教育需要，主张修订学制系统。1928年提出《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即“戊辰学制”，分原则、学校系统及说明三部分。第一部分提出7项原则：（1）根据本国国情；（2）适应民生需要；（3）增高教育效率；（4）提高学科标准；（5）谋个性之发展；（6）使教育易于普及；（7）留地方伸缩之可能。废除综合制度，分设中学、师范、职业三种学校。“戊辰学制”只是在1922年新学制基础上，根据时局需要做出局部变通而已。

“戊辰学制”与“壬戌学制”的主要变化是：在师范教育方面，改六年制师范为六年或三年，取消师范专修学科及师范讲习所等名目，增设了乡村师范学校；在职业教育方面，除在高级中学设职业科外，可单独设立高级职业学校及初级职业学校，与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相对应，并在小学中设职业科；大学采取多院制，取消单科大学（称为学院）。

第六节 学校教育发展

一、初等教育

三个阶段：1927-1937年是初等教育的稳定和发展时期，教育建设实行法制化；抗日战争时期，时局动荡中仍能维持一定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把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合流，实施国民教育制度。1940年制定《国民教育实施纲要》。

二、中等教育

三个发展阶段：在统治的最初十年里，通过一系列中等教育法规的颁布，保证了中等教育的发展。抗战时期由于采取“抗战救国”方针，中学数量增长较快。抗战胜利后，全国中学的数量达到最高点。

三、高等教育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前十年可以说是稳步发展，逐步定型。1929年公布《大学组织法》及《大学规程》，设校分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组织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院，三院以上称大学，否则为独立学院，大学设研究院，学制医科五年，其余四年。1931年通令采用学年兼学分制。除医科外，其他院校各科学生，从第二年应认定某系为主系，并选定另一学系为辅系。不准提前毕业。除了设立校长或院长综理校务外，大学设校务委员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所选出的代表若干人，以及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组成，即校长（或独立学院院长）负责制，以专家（教授）治校为原则。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般时期里开始下挫，但到抗战胜利后，大学学校和学生数量都达到最

高点。

四、抗战时期的学校西迁

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存国家教育实力，国民政府将沿海地区不少著名大学西迁，高等教育的基本不仅得以保存，还获得了一定发展。使抗战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呈发展态势，学校和学生数比战前有较大增长。

第四节 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加强

一、中小学校的童子军训练

童子军是一种使儿童少年接受军事化教育训练的组织形式，于民国初年传入我国。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由中央青年部组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统辖广州革命政府区域内的童子军组织和教育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青年部撤销，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下设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1928年5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总章》，规定凡12-18岁之青少年皆须入伍受童子军训练。1933年10月，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公布《中国童子军总章》，其中规定：中国童子军“以忠孝仁爱和平为训练之最高原则”，以“智、仁、勇”为教育目标。1934年11月1日，中国童子军总会正式成立，蒋介石为会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31日，中国童子军总部颁布《童子军战时服务大纲》，对童子军的组织和训练更为加强。同年11月，教育部公布《中国童子军战时后方服务训练办法大纲》，强调童子军活动为战时需要服务。

二、高中以上学生的军训

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的《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提出了“各学校要增设军事训练”。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炮轰济南，制造了“五册”惨案。基于民族义愤，大学院下令全国专门学校一律增加军事教育课程，1929年1月，教育部颁发《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规定高中以上学校军事科每学年三学分两年共六学分，1933年3月，蒋介石下令国民政府军政部、教育部、训练总监部：凡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军训不合格者，不得补考、投考大学。这就将军训作为完成学业和升学的必要条件。

三、中学毕业会考

1933年公布《中学毕业会考规程》和《中学毕业会考委员会规程》，废除小学毕业会考，制定中学毕业会考委员会组织细则，统一会考时间，严格会考程序，对会考科目、命题及计分方法做了新的规定等。各科成绩及格才准予毕业和参加升学考试。因此，毕业会考时毕业考和升学考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

双重目的：一是为了督促学校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二是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控制，抑制学潮、整顿学风。它使考试过于频繁，迫使师生穷于应付，反而影响了学生打好学业基础，学校难以提高教学质量。遭到多方反对。1935年，教育部公布《修正中学学生毕业会考规程》，修改考试科目、改革考试，参加会考的学校不再进行毕业考。各学年的评价你成绩为学生的毕业成绩，学生成绩核算由毕业成绩和会考成绩合并计算，前占40%后占60%；三科以上不合格者留级，一二科不合格可参加下届该科会考，及格方可毕业。

第十一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教育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形成

一、苏维埃教育文化总方针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明确提出了苏维埃政权的教育方针：“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育”。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更具体、明确地表述了苏区教育的根本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的劳苦群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一）“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

随着战争形式的发展深入，一方面要面对日寇疯狂进攻，另一方面要考虑未来的发展，需要团结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到抗战中来，尤其需要依靠知识分子的力量，通过文化教育工作开展支援战争。1939年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战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化为文化教育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党的群众公众路线具体化为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吸引了大批知识青年、著名文化学术界人士，具体反映了在教育工作中坚持统一战线的影响。

（二）“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政策

1941年，**林伯渠**明确提出“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政策。“干部教育第一”政策的提出是出于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实际状况和党的未来事业发展的准备。

（三）“实行生产劳动”的教育政策

抗日根据地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实行生产劳动”的政策，一方面是出于抗战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出于对青年教育的需要。

（四）“民办公助”的政策

“民办公助”就要充分发挥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充分尊重民众对学校学制、教育内容的需求，同时，也强调通过公助的形式加强对学校的指导和管理。

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

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既是文化的方针，也是教育的方针。

所谓“**民族的**”，是指新民主主义教育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带有民族特性的教育。它不一概排除外国教育，也不“全盘西化”，而是取其精华，弃之糟粕。具有民族的形式和特点而与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相结合，即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

所谓“**科学的**”，是指新民主主义教育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统一。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对中国古代和近代教育既不一概否定，也不因循守旧，而是剔除封建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

所谓“**大众的**”，是指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教育，因而又是民主的。它把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教育互相区别和联系，把普及和提高互相区别和联系，是人民大众的有力武器，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第二节 干部教育

一、干部在职培训

这种教育形式开展得最早，目的在于提高在职干部水平或训练某种专业人员，主要通过干部训练班、在职干部学校实施。

二、干部学校教育

（一）高级干部学校

高级干部学校主要是培养党政高级干部，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干部学校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等。

（二）中层干部学校

中层干部学校是为各个部门培养中层干部，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干部学校有中央农业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

三、“抗大”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一所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是抗日根据地干部学校的典型。

（一）抗大概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决定续办红军大学，1936年6月，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成立，1937年1月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迁延安。从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到抗大，总校先后办了8期，同时还办了12所抗大分校，培养了20多万军政干部。

（二）抗大的教育方针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第三期同学会成立的题词，即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所谓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战争的形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所谓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指生活上的艰苦朴素，工作中的刻苦勤奋，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

所谓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指掌握和运用游击战的方法，与侵略者展开持久战。

（三）抗大的政治思想教育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是学习理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其次，学习中共党内斗争的文件，提高党性意识；其三，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其四，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

（四）抗大学风

最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

陕北公学：成立于1937年，在延安。对青年进行抗战必要理论和实践的学

习和训练。宗旨：三分政治七分军事。

第三节 群众教育

群众教育的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尤其是经过整风运动和整学，社会教育纠正了以往脱离边区实际的倾向，取得很大发展。其组织形式主要有冬学、民校（民众学校）、夜校、半日校、识字班（组）、读报组，以及剧团、俱乐部、救亡室等，其中冬校和民校适应分散的农村群众和生活实际，是最受欢迎、最普遍、最广泛的社会教育形式。在兴办冬学、培养师资的同时，各根据地还积极组织编印了课本，如《识字课本》、《日用杂志》、《庄稼杂字》等。

第四节 普通教育

一、根据地的小学教育

（一）发展历程

抗日根据地的小学教育基本延续苏区的制度，学制五年，前三年为初小，后两年为高小。抗战初期，各根据地初小较多，高小较少。民主政权建立后，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陕甘宁边区还废除了国民党的42种税捐，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在文化上翻身有了要求，也有了条件。在陕甘宁边区大力发展教育，且成绩斐然。

1946年，陕甘宁边区召开中等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使中等教育逐步正规化的要求。文化基础较好的苏皖边区召开宣教会议，拟定了各级学校的教育方针、学制、课程、教法等方案，规定小学学制实行四二制，小学与中学相衔接。山东也召开第二次全省教育会议，讨论教育上实施的新型正规化。但随着内战全面爆发，教育正规化进程难以进行。随着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教育正规化问题又重新提上日程。1948年7-9月，各解放区分别召开会议，制订了适应不同地区特点的中小学教育学制。后期，对中小学进行正规化改造和建设，既包括了建设正规化的制度和加强文化课的学习，更包括了机型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内容。

（二）办学形式

“游击小学”、“两面小学”、“联合小学”等形式。

（三）教育内容

抗日根据地小学教育内容十分注意适应战争的需要。边区小学的课程，初小设国语、算术、常识、美术、音乐、劳作、体育。高小增加政治、自然、历史、地理、。劳作以生产劳动为主，体育以军事训练为主。在《边区小学教育实施纲要》中，社会活动、生产劳动均为正式课程。有些条件差的根据地，初小只设国语、算术两门。

二、解放区高等教育的整顿与建设

中共中央在解放战争时期非常重视通过高等教育机构进行高级干部的培养与教育，为此采取措施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整顿和建设。具体措施包括：A 办抗大式训练班，进行整治思想教育。B 解放区原有大学进一步正规化。C 创办新大学，最早从东北开始。并同时对各类高校的学制年限、招生办法、教师聘任与待遇、行政管理、教学制度、整治教育、课程标准、收费制度等作了具体规定。

第五节 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基本经验

一、教育为政治服务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如何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投入革命，并最大程度提高人民军队干部战士的觉悟，是中共面临的中心任务。根据地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开展，使教育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首先，在安排各类教育时，正确处理了在特定环境下的轻重缓急，保证了最迫切需要的满足。由于物质力量缺乏，加上当时斗争的需要，成人是革命战争和生产建设的承担者，必须首先加以培养。认清这种形势，在决定教育优先发展的部门时，在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之间，首先注重成人教育，成人教育首先注重干部教育，做出“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重要选择。其次，在教育内容上，始终服从战争需要。以武装斗争抗击敌对势力，捍卫根据地人民政权和群众安全，是斗争的中心任务。教育的内容就必须反映这一需要。再次，在教育教学的组织安排上，也充分考虑到战争条件和政治需要，一切因时、因地制宜、不拘一格。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抗战时期，延安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视为培养新人民和新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根据地也积极发展生产，以保证前线 and 后方基本物质需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特定的历史意义。

第一，教育内容紧密联系当时当地的生产和生活实际，进行劳动习惯和观点、劳动知识和技能的教育。

第二，教育教学的组织形式和时间安排注意适应生产需要，不仅具有教育意义，也具有经济意义。

第三，要求学生参加实际的生产劳动。

三、依靠群众办学

一方面当时经济基础差，学校、师资、设备都十分缺乏，政府有限的物力、人才难以大量投入教育；另一方面，群众又有极大的受教育的愿望。在这种条件下，只能采取依靠群众办学，发掘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能量。依据群众需要，出于群众自愿，并实行民办公助的政策，成为根据地教育的巨大动力。

第十二章 现在教育家的教育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杨贤江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思想

（一）李大钊教育思想

第一，论教育本质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说明教育的本质问题，揭示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认为教育决定于经济基础且受政治制约，改造中国社会光靠教育本身的努力不行。

第二，倡导工农大众的教育

平民教育只有在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权后才能最终获得。但是根据现状，必须先面对实际，去争取劳工的受教育机会。

第三，倡导青年教育

（二）恽代英的教育思想

第一，论教育与社会改造

教育要引起社会的改变，就须将其影响力施予政治和经济，把教育办成有计划、有目的的社会改造运动。

第二，论教育的改造：以社会改造为其教育改造的根本目的和依据

儿童教育的改造：主张实行儿童公育；中等教育的改造：理想的中学教育是使毕业生升学就业两均便利。

二、杨贤江的教育思想

杨贤江(1895-1931)著名教育家，南高师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著有《教育史 ABC》、《新教育大纲》等著作。《新教育大纲》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阐述教育理论的书籍。《教育史 ABC》第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世界教育史的著作。

（一）论教育本质

《新教育大纲》明确提出“教育”为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即社会的上

层建筑之一，它与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观念形态的领域一样，取决于经济基础，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教育有特殊性，A教育是使劳动者获得知识与才能，把单纯的劳动力变成特殊的劳动力。他认为学校教育都是为社会培养各种人才，这是教育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最根本的特点。B教育以别的精神生产的内容为内容。他认为教育的内容与方法，都受到其他各项精神生产的制约。C论述了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他批判了“教育万能”、“教育救国说”、“教育独立说”、“先教育后革命说”等观点。但他认为教育不是无能的，而是革命力量的一个方面军。

（二）“全人生指导”与青年教育

1. 对青年问题的分析

产生青年问题的原因：一是青年期是身心发生显著而重要变化的时期；二是社会动荡剧变更易导致青年问题。

2. 全人生的指导

全人生指导是指对青年进行全面关心、教育和引导，既要关心他们的文化知识，又要对他们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进行正确的指点和疏导，使之德、智、体诸方面都能得以健康成长，成为一个“完成的人”，以适应社会的改进。

指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杨贤江青年教育思想的**核心**。

主张青年要干预政治，投身革命。

强调青年必须学习，学习是青年的权利与义务。

杨贤江对青年生活的指导性意见——完满的青年生活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第一，健康生活（体育生活）

第二，劳动生活（职业生活）

第三，公民生活（社会生活）

第四，文化生活（学艺生活）

具有正确生活态度的青年所应有的**特征**是：活动性、奋斗性、多趣性、认真性。

宗旨是：要有强健的体魄和精神，要有工作的知识的技能，要有服务人群的理想和才干，要有丰富的风尚和习惯。

第二节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一、职业教育的探索

(一) 癸卯学制颁行后，普通教育发展速度远高于实业教育，二者比例极不相称。

(二) 一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各种技术和管理人员严重短缺。

(三) 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发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标志着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思潮的形成。

(四) 黄炎培早期职业教育思想更多以解决个人生计问题为重，认为职业教育的要旨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五) 20年代起提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目的。20年代中后期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观念。认为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和沟通所有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更多地探寻了职业教育外部环境的适应问题。

二、职业教育思想体系

(一) 职业教育的作用和地位

第一，职业教育的理论价值：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第二，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作用：有助于解决中国最大最急需解决的生计问题。

第三，在整个教育体制中的地位：一贯的、整个的、正统的

(二) 职业教育的目的：

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他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包括为个人谋生和为社会服务。

(三) 职业教育的方针

职业教育的方针是社会化和科学化的思想。他明确把职业教育社会化思想概括为“大职业教育主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不能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只从教育界做工夫，必须联系社会，走职业教育社会化道路。另一方面，办职业教育不能只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着眼，必须顾及到广大民众的利益、需要，谋求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幸福。他提出办学宗旨、培养目标、学制、办学方式、过程等都要社会化。职业教育科学化，是指必须以科学为基础来行使对职业教育主体与客体的管理。他试图把职业教育建立在职业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基础上。

（四）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

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

（五）职业道德教育：

职业道德教育的原则：“敬业乐群”，即热爱自己的职业和专业，对学业和工作都尽职尽责，有优美和乐之青草及共同协作精神。

第七节 晏阳初的教育思想

一、“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

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家庭式、学校式、社会式三大方式

晏阳初认识到，中国以农立国。文盲集中在农村，要普及平民教育就必须到农村去。1926年，他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始了河北定县乡村教育实验，在此基础上形成教育和社会改造的方案，即“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他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可概括为愚、穷、弱、私四个字。“愚”指大多数人不仅缺乏知识，简直就是目不识丁；“穷”指大多数农民生活十分贫困；“弱”指大多数人是“无庸讳变的病夫”；“私”指大多数人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和公民训练。解决这四大问题必须借助于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穷，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四者以公民教育最为根本。推行四大教育要依靠三大方式：学校式教育，主要以青少年为对象，包括初级平民学校（初步的识字、读、写、说教育）、高级平民学校（培养村长和干部）和生计巡回学校（传授生产技术）；社会式教育，主要以一般群众为对象，通过读书会、演讲比赛、演剧、写稿投稿、成立自助社和合作社、办农业展览等形式；家庭式教育，家庭成员间开展公民道德、卫生习惯、儿童保护、家庭预算、家庭管理、妇女保健、生育节制等方面的教育和训练。

二、化农民与农民化

他认为中国的基本，不在城市而在农村。中国广大人口是农民，中国经济基础在农村，改造中国就是从改造农村、建设农村做起。因此他积极倡导乡村教育建设。1929年，开始定县实验，大力提倡知识分子“与村民一起劳动和生活”，“给广大乡下老办教育”。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民科学化，科学简单化”的平民教育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我们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他了解农民生活一切，努力“在农村做学徒”，他们未受过书本式教育，却有实际生活的知识和技术，因此值得学习。彻底与他们打成一片才能了解他们，才能进行乡村改造。可以说“化农民”与“农民化”是他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目标与途径。

评价：他所提出的四大基本问题看到了社会现象的表层，没认识到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否认了旧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是阶级压迫与剥削。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所采用的方法是改良主义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乡村建设作为一种社会改革运动，其实上是一个不彻底的资本主义运动，结果以失败告终。但其可取之处在于其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理论有中国特色，确实给实验区人民带来了一定的实惠。四大教育、三大方式打破了狭隘的教育观念。

第四节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建设

一、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理论

所谓**乡村建设**，是一种力图在保存既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乡村教育的方法，由乡村建设引发社会工商业发展，实现经济改造和社会改造。

（一）中国问题的症结

中国社会自始至终走着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表现为遇事安分、知足、寡欲、摄生，取一种向自身内求“调和持中”的有理智、有意识的态度。中国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失调。

（二）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乡村建设

第一，从社会历史看，中国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对立，不会产生阶级对抗。因此社会革命在中国已不可能，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乡村建设。

第二，从社会现状看，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中国如要从头建设，必须一点一滴从乡村建设起。

（三）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

乡村建设就以乡村教育为方法，而乡村教育以乡村建设为目标。

一方面，解决中国文化失调的主要手段是教育。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改造其实是个教育的过程。所以乡村建设是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以教育完成社会改造。

二、乡村教育的实施

实施乡村教育必须借助于乡农学校。乡农学校有学长、学董、教员和学众组成。以“乡村领袖”为学董，众学董组成学董会，其最富德望者为学长，是乡农学校的领导；教员为受过训练的乡村建设者；学众为乡村中一切人。乡农学校分村学和乡学两级，兼为教育和行政组织，其组织原则是：“政教养卫合一”，“以教统政”，一切政治、经济、武装自卫措施都通过乡农学校贯彻。乡村教育的开展必须通过学校式教育与社会式教育的合一，学校设儿童部、成人部、妇女部和高级部。乡农学校注重通过“精神讲话”巩固“旧道德”，接受“新知识道理”。

评价：这一理论的本质是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改造农村来改良中国社会的理想，是在探索拯救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无视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对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持反对态度，是一场不成功的实践。但他认识到中国问题是农村问题，并立足于文化传统来思考中国社会的改造，是有识之见。将科学思想和方法带入落后的农村，对农村教育的提高，生产技术的改良，社会风俗的改善做出了贡献。

第五节 陈鹤琴的“活教育”探索

一、儿童教育和“活教育”实验

陈鹤琴，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开拓者，一生致力于从中国国情出发，学习和引进西方教育思想和方法，建设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化的儿童教育，提倡“活教育”，为改革传统教育，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思路。1919年开始任教，教授教育学、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之后的八年里，是他奠定事业基础和形成教育思想的时期。期间，他投身教育改革，翻译西方教育理论方法，并通过对长子陈一鸣追踪研究，力行观察、试验方法，探索儿童心理发展及教育规律，写成了《儿童心理研究》和《家庭教育》两部系统论述儿童教育思想的著作。同时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实验幼稚园——鼓楼幼稚园。进行中国化、科学化幼儿园实验，总结并形成了系统的、有民族特色的学前教育思想。1940年，陈鹤琴来到江西泰和，筹建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并附设小学和幼稚园以及校办农场，开展“活教育”实验。1941年1月创办《活教育》杂志，标志着有全国影响的“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和“活教育”运动的开始。1942年初，幼师附设婴儿园，1943年春，幼师改为国立幼稚师范学校，并增设专科部，至此，“活教育”实验形成了包括专科部、幼师部、小学部、幼稚园、婴儿园五个部门的幼儿教育体系。

二、“活教育”思想体系

（一）“活教育”的目的论

“活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其中，“做人”是“活教育”最为一般意义的目的，是人区别于动物所在。

“做中国人”意味着要爱护这块生养自己的土地，爱自己国家长期延续的光荣历史，爱与自己共命运的同胞，体现了“活教育”的民族特征。

对于“做现代中国人”，则使“活教育”目的进而体现时代精神，更为具体。陈鹤琴则赋予它五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有健全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第四，“要能够合作”；第五，“要有服务精神”。

（二）“活教育”的课程论

书本知识是间接知识，是死的知识；大自然、大社会才是直接的知识来源，是活的知识。因此，教育的任务就是要“让学生直接向大自然、大社会去学习”。

活教育的课程本质是活动课程。他反对在幼稚园和小学实行分科教育。陈鹤琴又具体将活教育课程分为五类：儿童健康活动、儿童社会活动、儿童自然活动、儿童艺术活动、儿童文学活动。

（三）“活教育”的教学论

“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是“活教育”教学方法的基本原则。

依据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原理及自己的经验，提出了 17 条“活教育”的教学原则

此外，陈鹤琴还归纳出“活教育”教学的四个步骤，即：实验观察、阅读思考、创作发表和批评研讨。教育的方法论重视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主义发挥儿童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它的优点；另一方面，它忽视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忽视了知识的系统性，这是它的缺点。

第六节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

一、“生活教育”实践

晓庄学校：

1927 年，创办晓庄中心小学，改为晓庄学校。总目标是“培养乡村人民所敬爱的导师”。提出了 5 项具体培养目标：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健康的体魄；艺术的兴趣。1930 年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强行封闭，被迫停止乡村生活教育实验。

“山海工学团”：

1932 年筹办了山海工学团。包括青年工学团（青年夜校后改为共和茶园）、儿童工学团（儿童识字班）、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育工学团和山海木工场等。工学团还修路、筑鱼池的堤、办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1934 年天灾时，组织救济旱灾委员会，帮助农民抗旱等。1939 年后，日本发动对上海地区的侵略战争，山海工学团的实验活动被迫停止。

“小先生制”

在儿童工学团采取“小先生制”——“即知即传”，还把失学儿童组织起来，采取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办法，称自动工学团。学习内容是陶行知的《老少通千字课》。

育才学校

1937 年，为了收容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苦心兴学。

二、“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一）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

受启发于裴斯泰洛齐，直接影响于杜威教育思想。1927年在晓庄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内涵为：“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

（二）生活即教育：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

其内涵为：①是人类本来就有的，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②现实生活是教育的中心。生活和教育是一回事，是同一个过程。③是与人生共始终的教育。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④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教育的目的、内容、原则、方法都是为生活所决定。而教育通过改造人发挥其改造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功能。

（三）“社会即学校”是“生活即教育”思想在学校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具体论述。

其内涵为：①把社会与学校打成一片，“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或“以社会为学校”。一方面，传统教育与社会隔绝，是“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学校即社会”虽使社会生活进入学校，但仍不够。不如让学校延伸到社会与自然。②对传统的学校施加改造，让“学校含有进步的意味”。一方面运用社会力量使学校进步，另一方面运用学校的力量使社会进步，改造的依据是社会的需要。

评价：社会即学校扩大了学校的内涵和作用，对传统的学校观、教育观有所改变，使劳苦大众能够受到起码的教育，渗透普及民众教育的苦心。

（四）“教学做合一”是“生活即教育”的教学论

其内涵为：因为“行是知之始”，教与学都必须以“做”为中心；是对注入式教学法的否定，反对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提出教学合一思想。要求学生“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破除传统教育下劳心与劳力的分离现象，教劳心者劳力——读书的人做工，教劳力者劳心——做工的人读书。“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认为行才是知识的来源，也是创造的基础。要求“有教先学”和“有学有教”。即：教人者先教自己，有学到知识就要去教别人。

评价：在教学做合一方法论原则下，相应对课程教材也提出改造意见，以培植学生的生活能力为追求，遵循学生的需要和可能，由此破除以学科知识为原则的课程传统，谈到了实践的重要性，但却忽似了间接知识的积累。